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ISSN 1000—7326

总第101期

1990 ·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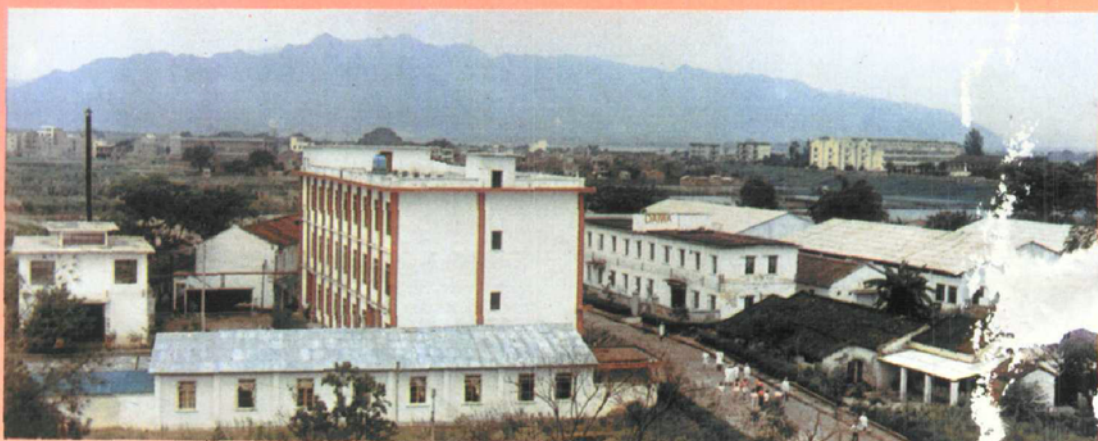


汕头经济特区发展总公司
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具有直接对外贸易的权
限,也是汕头特区唯一的国家经贸部批准的对
台贸易经营单位。被评为省外贸行业先进单位,
省百家明星企业之一。

总经理:张声直 副总经理:吴金生
电话:260423 260626 262706 260431
电挂:8734 图文传真:260424
地址:汕头经济特区经济综合楼北侧

肇庆市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在崛起

▷ 肇庆市商办工业开发区首期建设规范整齐、设施配套，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



▷ 500千伏安的配电中心保障了开发区的生产用电。



▽ 南方糖果厂负责人(左二)与外商洽谈产品出口业务。



△ 1989年5月，省委副书记郭荣昌(右二)视察开发区，与台和电子有限公司中外双方人员畅谈合作前景。

▷当年进设备，当年试产，当年获省优的南方糖果厂。



△南方糖果厂生产的七星果冰系列，糖体晶莹、夹心鲜艳、口感清香、营养丰富，连获国家和省级多项奖励。



△从英国引进的具有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高级水果糖生产线主机。



△台和电位器厂生产的电位器全部返销国际市场。



△生产硅整流二极管的台和电子有限公司装配车间烧结炉主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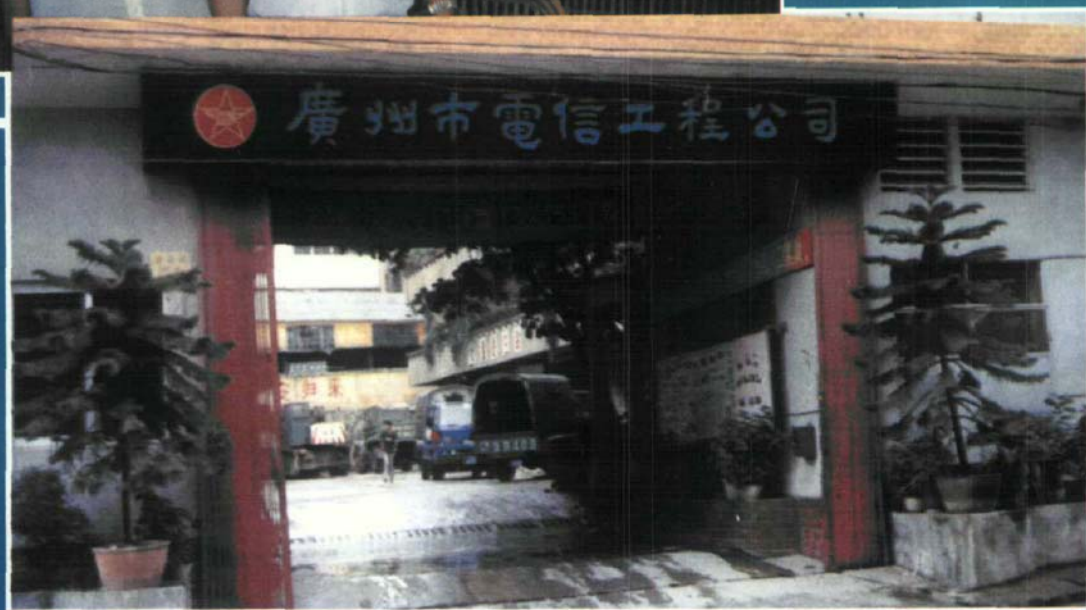


广州市电信工程公司

国家二级施工企业



◀ 公司经理陈念思(左)
和副经理黄培基。



本公司成立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多年来主要承担的工程有广州市市话三分局、四分局、七分局、八分局4000门至8000门的纵横制交换机及万门程控交换机设备安装工程，通信线路工程（包括光缆、PCM电缆及全塑电缆等）施工及通信电源设备安装以及通信管线敷设工程。一九八四年以来，年平均完成100项工程以上，年施工能力1000万元以上，去年已达到1850万元。

在承担的各项工程中，质量均达到部颁指标要求，天河体育中心等通信工程还被评为省优质工程。本公司还兼营各种通信器材。

经理：陈念思 副经理：黄培基、孙炳南、钟焕文

地址：广州市先烈南路青龙坊55号 电话总机：751199 电挂：4594 邮政编码：510060



天河牌

广州人民机器厂

GUANGZHOU REN MIN MACHINERY FACTORY



产品图片说明：1. HF100型河粉生产线 2. SDN-1000型豆奶生产线成套设备

广州人民机器厂原是军工企业，八十年代初停军转民后，致力发展食品机械成套设备生产，现已发展成为中国电子机械工业部生产食品机械重点骨干企业。

该厂生产设备齐全，工程技术人员充足，有较强的机械加工能力和较完善的检测手段。近年坚持消化吸收改造国外先进技术，走国产化的道路，制造出来的产品性能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目前，该厂拥有方便波纹面生产线、方便米粉生产线、河粉生产线、龙须挂面生产线和豆奶生产线等产品，其中方便波纹面生产线1987年被国家列为首批可替代进口的产品，荣获市、部优质产品称号和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该厂产品行销全国26个省市并出口到南美洲、非洲诸国，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较高信誉。

广州市穗华房产开发公司

(简称穗华公司)



◁ 图为由该公司建设的住宅区楼宇。

公司简介

穗华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二年六月，现拥有一定的技术力量，管理经验丰富，资本雄厚，1987年经市建委资质审查，被批准为一级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是经营房地产综合开发业务，为中外客户服务。该公司通过“外引内联”，多方集资，用于改造旧城和开发新区，总建筑面积达五十多万 m^2 ，完成投资总额约2.5亿元。已开发的小区有昌乐园、晓园新村、穗花邨（即：花园新村）等小区。曾无偿投资五百多万元建设晓港中学和花园新村小学。无偿投资一百多万元对各新村进行绿化美化建设，使得各新村环境优美安静，居民安居乐业。晓园新村、昌乐园被广州市绿化委员会评为“园林式单位”。

穗华公司还引进外资1.15亿港元，1985年曾获市政府授予的引进外资建设住宅二等奖。建设富丽华大酒店、挹翠园、晓港城等工程。由于该公司信守合同，深受外商信赖。

公司经理：陈泽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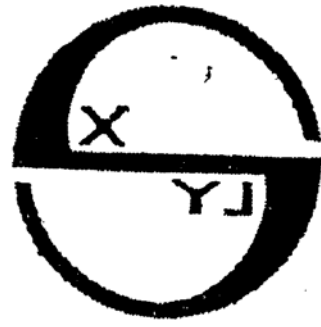
地址：广州市越华路43号

电话：330738

电挂：4415 邮政编码：510030



△引进外资合作建设与经营的广州富丽华大酒店。



学术研究



主 编：梁 钊

副主编：张硕城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5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东 省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 外 总 发 行 中 国 国 际 图 书 贸 易 总 公 司
国 外 代 号：BN268 北 京 2820 信 箱

代 号：46—64 国 内 定 价：每 册 1.50 元

国 内 统 一 刊 号：CN44—1070

ISSN1000—73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粤 工 商 广 字 01044 号

本 刊 每 逢 双 月 25 日 出 版

学术研究(双月刊)一九九〇年第四期(总101期) 目 录

· 经济特区十年 ·

- 特区十年回顾和今后发展路向丁励松(6)
外向型经济的衡量尺度与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向发展
.....石祖培 王 瑛(10)

·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

也谈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

- 与王坛浦、张政同志商榷张江明(15)

· 精神文明建设 ·

-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江 流(20)
如何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研究吴建国(23)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主体素质的提高章岳云 王悦华(27)
论健康人格梁世红(29)

· 经 济 ·

- 试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严闻广(33)
特殊所有制·所有制形式·公有制优越性郑福明(38)
略论广东机械工业发展速度与效益的关系陈应求(42)
论优化产品结构在微观经济整治中的意义
——湛江机械行业的实践与思考魏剑辉(46)

· 历 史 ·

-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解沈茂骏(49)
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郭润涛(53)
历史真实度的系统观郑宏卫(57)
广东近代金融的发展及其基本特征曾 涛(61)

· 语言文学 ·

-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述评王运熙(65)

责任编辑 黄荣显

数百年来粤方言韵母的发展李新魁(70)

一块闽方言的沃土

——从1988年泰华短篇小说金牌奖征文看到的.....陈晓锦(76)

文艺学方法成系统:多样而统一

——访著名文艺学家胡经之.....本刊记者 关 仪(79)

寻找中西文学的交汇点

——访饶芃子教授.....本刊记者 刘斯翰(81)

· 国情·省情·县(市)情·

高要县河台镇治理山区“四大隐患”调查.....范步遥(84)

商办工业是发展经济的一条成功之路

——肇庆市商办工业开发区的情况调查.....梁志强(87)

· 政 治·

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到新水平.....周燎刚(91)

简谈人事管理公开化.....黄庆明(94)

· 争 鸣·

“应用哲学”是哲学吗?

——与程家明同志商榷.....吴 忠(96)

· 书 评·

《胡汉民评传》读后.....火 木(98)

美学大厦的两块坚厚基石

——两种关汉卿全集的比较杂议.....笃青梅(99)

· 书海酌蠹·

《乡村四月》作者是谁(房日晰·19)

《鹿菴集》作者王磐辨正

(丰家骅·32)

为《长江集》补校一字(周凤章·41)

ACADEMIC RESEARCH

No.4,1990

CONTENTS

- The Last Decade of the Special Zones in Retrospect and Those Ways
and Directions AheadDing Lisong (6)
- The Measure of External-style Economy and the External
Development of Shenzhen Economic Special Zones
..... Shi Zupei & Wang Jun (10)
- Talk about the Dialectics of Positiveness and Negativeness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Discuss with Wang Tanpu and Zhang Zheng
.....Zhang Jiangming (15)
-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s a Strategic Task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an All-round WayJiang Liu (20)
- How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Wu Jianguo (23)
- Promot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ies of Subje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Zhang Yueyun & Wang Yuehua (27)
- On Healthful PersonalitiesLiang Shixiong (29)
- A Tentative Approach to Perfect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Ownerships in Our Country.....Yan Wenguang (33)
- Special Ownership, Forms of Ownership, and the Superiority of
Public OwnershipZheng Fuming (38)
- A Cursory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al
Speed and Beneficial Results of Guangdong's Machine-building In-
dustry Chen Yingqiu (42)
- On the Significance of Perfectizing Product Structure in Renova-
ting Micro-economy—Practice of and meditation on the ma-
chine-building of Zhanjiang dlistrict..... Wei Jianhui (46)
- A New Explanation of the Failure Causes of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Shen Maojun (49)

- A Tentative Approach to the Causes that Qing Dynasty Set up "Mufu"
Organ within the Yamens of Prefecture and County at That Time
..... Guo Runtao (53)
- A Systematic View on Historic Reality..... Zheng Hongwei (57)
-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Modern Finance and Its Basic
Features.....Zeng Tao (61)
- A Commentary of Gao Zhongwu's "Zhong Xing Jian Qi Poetry
Anthology".....Wang Yunxi (65)
-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zhou Dialect Rhymes in the Last Centuries
..... Li Xinkui (70)
- A Fertile Land of Fujian Dialect—It's found in the solicit
Tai-Hua short stories awarded golden medals in 1988
..... Chen Xiaojin (76)
- The Method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Research Develop System:
Variety and Unity—Interviewing Mr. Hu Jingzhi a famous Theo-
retician of Literature and Art
.....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Guan Yi (79)
- Seeking the Meeting Point of Sino-Western Literature—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iao Pengzi Liu Sihan (81)
-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at Hetai Town of Gaoyao County Harnessed
Four Hidden Dangers of the Mountain Areas..... Fan Buyao (84)
- That Commercial Departments Run Industry Is a Successful Way—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commercial departments of
Zhaoqing City run industry.....Liang Zhiqiang (87)
- Enhance Persisting in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to a
New LevelZhou Liaogang (91)
- A Brief Talk about Personel Management Comes Out into the Open
.....Huang Qingming (94)
- Is "Applied Philosophy" a Philosophy? —Discussing with comm-
rade Cheng Jiaming..... Wu Zhong (96)
- The Impressions of "Critical Biography of Mr. Hu Hanmin"
.....Huo Mo (98)
- Tow Hard and Big Cornerstones of the Discipline Researching Guan-
Hanqing—A comparison of two complete works of Guan Han-
qing.....Du Qingmei (99)

特区十年回顾和今后发展路向

丁励松

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兴办以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经过十年的建设，已成为我省参与国际市场角逐最富有活力的经济区域。

——至1989年底止，三个特区共完成基建投资220亿元，已经建设起一个对外资具有吸引力并使之生存、增殖的投资环境。

——1980—1989年，实际利用外资已达35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约104亿美元的33.6%。

——特区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办起三资企业3000多家；同国内28个省、市和国家27个部委合作，办起内联企业近4000家。在这些内联企业中，又有1/3引进了外资，形成了把外引与内联结合在一起的独特引进方式。

——三个特区的工业总产值，1989年达到了150亿元，占全省1198亿元的13%。特区产品外销比例增长幅度较大，深圳特区出口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8年的51%增至60%；汕头特区占78%；珠海特区产品出口比例小一些，但是也高于全省25%的水平。

——特区的进出口贸易在省内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1989年，三个特区出口总额28亿美元，占全省外贸出口80亿美元的35%。

——特区的投入开始进入回收阶段。1989年三个特区预算内财政收入为25亿元，比1988年的17亿元增长47%，大大超过了全省平均增长幅度。

——建立特区以来，三个特区都注意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意了在对外交往中做到有所引进、有所抵制。又由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处于“试验区”的地位，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较好的体现。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总之，三个特区的经济建设不但走在省内各地区的前列，同时从发展速度来说，与国外相类似的经济性特区相比较，也毫不逊色。更重要的是，特区工作的成绩，还应该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中所承担的“试验区”的责任来考察。特区在诸多方面的辐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反映出具体效果：

——特区成立以来，从国外引进的一批科学有用的经营管理经验，例如珠海的酒店管理、深圳的建筑和设计招标承包管理、蛇口的劳动用工制度和住房商品化等，不但为广东全省所接受，也已经成为

全国经济建设中的共同财富。

——特区的实践证明，在全国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有可能选择局部地区实行特殊政策，推动全局的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1984年2月，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视察特区，充分肯定了中央试办特区的正确决策，从而促成了沿海14个城市和3个三角洲的开放。

——1986年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上，总结特区工作的实践，明确提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求。此后几年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当前，着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广东全省以及整个沿海开放地带共同的奋斗目标。

——我省三个特区内1000多家内联外引企业，经常不断地将在特区接受到的信息和经验传递到内地，加上伴随特区与内地之间日益频繁的商品交换以及人才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流，使特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窗口”的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挥。

以上事实说明，特区的建设是成功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按照中央关于特区工作的历次指示，把特区进一步办好，登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进行治理整顿以来，三个特区同全省一样，基建规模和信贷规模得到控制，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现象开始扭转，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仍主要是经济生活中多年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所造成的。当然特区与省内其他地区比较，由于与国际市场联系较紧密、外向型经济基础较好，克服困难的回旋余地相对大一些。抓住治理整顿的机遇，在深化改革中实现新的发展，无疑是国家和

特区的共同要求。

二

特区自创立以来，自始至终都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当前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有多方面原因，既有客观条件的变化，也有主观努力的不足；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特区自身工作的某些不足，也即仍需继续苦练“内功”。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治理整顿中理出清晰的思路，找到积极的办法，为特区的新发展开辟道路。

特区的发展历程表明，特区事业的前途在于深化改革和发展外向型经济。1985年中央也曾对当时过热的经济进行了调整，有一些整顿措施，如严格限制特区向内地转卖进口商品，紧缩银根、压缩基建等，对特区的牵动也较大。当时特区的经济实力还较薄弱，面临的困难与今天的状况有相似之处。国务院相继召开两次特区工作会议，由于我省三个特区坚决贯彻了国家关于特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针，在困难的情况下，奋力向外向型“爬坡”，并借助于国外产业结构调整、外资大量涌入的机遇，最终渡过了难关，实现了“更上一层楼”。

这一阶段实践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在创办特区时确定的方针，牢牢把握住特区发展的根本方向，就一定能够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提高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完成中央赋予特区的各项任务。

根据中央的要求，广东三个特区自创办开始，就把探索体制改革放到了重要位置，并且做了大量工作，一批改革成果已

经辐射到了内地。但是应该承认，特区的改革与中央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能不能在治理整顿当中，使特区的深化改革方面也先走一步，是继续发挥特区的“窗口”和“试验区”作用的重要课题。在这里，有必要对国家创办经济特区的宗旨作一回顾。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过，如果仅仅为了发展生产，赚取外汇，并不一定要专门划出几块地方来搞特区。中央确定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接合部兴办特区，确定特区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运行机制在计划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方针，是期望特区能够通过“观察、学习、试验”，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拿出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重温中央举办特区的战略意图，对于当前我们增加对深化改革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从广东几个特区的实际来看，不能不说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还要作艰苦的努力。例如：

——如何在坚持我国社会制度和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采用国际经济活动的通行办法建设特区，还需经过不断实践，才能形成比较完整、成熟的经验；

——如何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便使特区能够率先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也还有待于摸索出一条卓有成效的路子；

——如何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更好地吸收、消化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财富，借鉴和利用现代发达工业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还只是做了初步的尝试；

——特区的投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还不那么理想，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和

管理也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政治体制改革在特区仍处于构想阶段，在特区政府机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的管理方面，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上述情况，既反映了我省特区工作中的不足，也为我们今后的深化改革提出了任务和要求。中央提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和改革试验区的基本政策不变，根据我们的理解，主要是指特区的对外开放窗口和改革试验基地的地位和作用不变，“四个为主”的基本方针不变，鼓励利用外资的优惠待遇不变。这些基本政策不变，也就为特区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基本条件。因此，可以说，特区的改革在今后继续先走一步，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

要继续努力发展特区的外向型经济。1989年，三个特区都在努力挤向国际市场，工业产值外销比例都有所提高，这表明发展外向型不但与国家的治理整顿不相矛盾，还可以缓解当前遇到的困难。特区乃至整个广东省的重大优势，就在于发展外向型经济。

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外向型经济？自从1986年特区工作会议以后，理论界从多方面加以论证，有人提出可以用60%至70%产品销往国际市场作为衡量标准。目前，广东三个特区中有两个外销比例超过60%，其中一个已经接近80%，但是仍很难说已经实现了外向型经济的要求。特区实践说明，出口比例大小是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表征，但更重要的应是内在素质。大概包括以下四个内容：第一，产业和产品结构主要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标准符合国际市场的需要；第二，企

业经营机制能够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第三，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原材料、劳动、知识产权、信息等）的流转实现国际化；第四，特区的行政管理和法制能为以上三点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从这些标准来衡量，三个特区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同时也说明，特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与特区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中央领导同志曾提出：要造几个“香港”。这当然不是指在中国大陆上“造”几个香港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指要在若干局部地区借鉴香港某些行之有效的经验，试验和发展符合国际经济运行的通行准则，具备与国际市场作充分交流、能够广泛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外向型经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路，这个任务首先责无旁贷地要落在业已建立起来的经济特区肩上。弄清楚这一点，对于明确特区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明确国家对特区的要求和政策上的支持，都将是有利的。

三

经过十年的建设，经济特区已经从一种构想变成了现实。但是，特区对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促进作用，还未能得到充分的显示和发挥。因此，在今后的阶段中，特区应该遵照中央举办特区的方针和战略意图，实现经济增长与深化改革的统一，推动整个特区经济迈向国际化。内容包括：提高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基础产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人力素质，增强企业的竞争生存能力；充分利用国际信息、知识资源，发展高科技产业；吸收先进经营管理经验，提

高经济效益；开辟国际新市场，建立国际销售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特区多年为之奋战的。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步步接近中央创办特区的既定目标，特区才能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省特区今后的发展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央对特区、对整个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十年来已给了巨大的支持。现在，根据大局的需要，适当调整国家与特区、国家与广东省的某些利益关系，是理所应当的。这与保持特区基本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并不矛盾。同时，国家及其各有关部门亦应就如何进一步支持特区深化改革、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并支持解决与此相关的一些政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保障特区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运行机制。实行这一运行机制，是特区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处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接合部，经济特区实际上承担了在两种不同经济运行机制之间“接轨”的任务。为执行这一任务创造充分的条件，将使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二）在加强对特区的宏观指导和管理的同时，保持特区必要的相对独立的特殊地位。特区的这种特殊地位，同样是由于它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承担任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要求特区事事服从于全国统一的体制和划一的政策，特区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的意义了。根据当前的情况，为了使特区能在深化改革方面迈进一步，同时又有利于全国的稳定，继续推行和完善计划、外贸、金

融、财政等方面的切块管理，可能是一个比较积极稳定的选择。

(三) 在适当调整特区与国家的某些利益关系的同时，也要考虑怎样才能保持和加强特区自我发展和“向外挤”的能力。有些方面的政策(如进出口管理等)，既涉及到内部利益关系，也涉及到特区参与国际竞争所必要的整个运转机制。处理这方面问题，应更多地着眼于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全局的长远利益。此外，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不要过于频繁，应增加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以便特区能对自己的发展作出较长远的安排。

(四) 为特区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央领导同志提出造几个“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有利于这个构想的实现。在特区这样一些局部地区试行政治体制改革，既可以减少震动，也可以为全局提供借鉴。当然，特

区改革的经验并非都可以套用于全国。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让其先走一步，起到探路的作用。

(五) 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稳定的特区法律体系。中央对特区的战略意图和施行的特殊政策应该逐步以法律的形式稳定下来。实践表明，目前迫切的问题不在于授予某个特区以制定法规的权限，而是首先要由国家制订一部经济特区法。建议尽快重新开展特区法的研究和起草工作，争取早日审议公布。在当前形势下，公布这样一部法律，对于表明我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增强外商投资的信心，改善投资环境和推动开放，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广东省政府办公厅

责任编辑：郑英隆

· 经济特区十年 ·

外向型经济的衡量尺度与 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向发展

石祖培 王 瑛

一、问题的提出

1986年初国务院特区工作会议确定的特区经济建设重心的转变，是深圳特区由“铺摊子、打基础”阶段转向“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建立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从此，外向型经济成为特区经济发展的明确的目标模式。与此相联，准确地界定外向型经济的判断标准和实现外向型经济的基本途径问题一时成为理论界和

实际部门所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时至今日，特区的外向型经济已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理论界对外向型经济的本质规定性的认识仍停留在阶段转变初期讨论的水平上。代表这种认识的基本观点形成于1984年，刘国光同志在他主编的《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战略》一书中明确提出的实现外向型经济的基本标志，即特区经济的资金来源以外资为主；在整个工业投资中，外资所占比重达

到50%~60%，产品以外销为主，自产产品出口占特区企业生产的商品销售总值的60%以上；进出口贸易的外汇收支应有顺差。在深圳经济特区确定1981~1989年期间的“工作纲要”中，这种看法成为建立外向型经济目标模式的指导思想，即“建立的外向型经济应是……生产性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企业所有制结构以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企业产品以外销为主……对外贸易要出口大于进口，外汇收支平衡、略有节余。”^①

实际上，这种观点已经遇到了来自特区实践发展的挑战：第一，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经常性外汇顺差和逆差相互转换不可能总是顺差或总是逆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逆差的年份要比顺差的年份多一些。台湾省从1931年开始推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但是1971年以后，才出现连续两年的外贸顺差。在经过了“石油危机”造成的逆差以后，外贸顺差的局面才逐步稳定下来。南朝鲜从1934年开始转向外向型经济，但到80年代中期，外贸才逐步转为顺差。因此，不能因为外汇有逆差而否认台湾和南朝鲜不是外向型经济。在发展初期，如果人为地限定外贸必须出口大于进口，是否会束缚特区应有的发展规模和机会？第二，“生产性建设基金以引进外资为主和企业所有制结构中以外商投资经营的企业为主”的规定都是以国际资本流动存在买方市场为前提的，一方面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另一方面内地资金也不断涌向特区。在特区的资金需求低于资金供给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规定是容易的，相反，若不具备这样的前提，实现这个规定则是困难的。10年来，特区中的外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80年—1989年分别为46%、49%、36%、26%、29%、15%、20%、16.2%、11.9%和11.2%，这说明现阶段的特区并不具备资金供给大于需求从而优先选择外商资本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要体现上述的规定，那只有极大地紧缩特区建设规模。然而，特区现实的选择是：没有因为要维持“以引进外资为主”而放弃使用内资的机会。假如在短期内不能做到“以引进外资为主”，那么，深圳特区是否就不能算是外向型经济呢？换句话说，特区能不能靠“内资”来建成外向型经济呢？

显然，原有的对外向型经济本质规定的理论

已无法解释实践中提出的上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衡量外向型经济尺度的确定和特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的选择，这就需要重新认识外向型经济的本质规定。

二、理论尺度

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是贸易战略中的不同类型。判断两种不同贸易战略类型的标志应是进口1美元所支付的本国货币量是否与出口1美元所得到的本国货币量相同，换句话说，替代进口节约一美元与增加出口而多收入一美元所得到的利益是否相等。如果前者大于后者，这意味着出口一美元所带来的收益无法抵偿进口一美元所支付的成本，那么，企业愿意内销而不愿意外销，这种类型被看成是内向型经济。比如，1964年，巴西进口一美元所支付的本国货币量是2253克鲁塞罗，出口一美元商品所得到的货币量只是1874克鲁塞罗。1966年，印度进口一美元需支付9.23卢比，出口一美元所得为6.79卢比。如果后者大于前者，这就是说，出口一美元所得到的收入扣除了进口一美元所支付的成本以外还有剩余，这被看成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1934年，南朝鲜出口一美元所得到的是281圆，进口一美元所支付的是247圆。如果两者相等，这被认为是不偏不倚的中性发展战略，1962年的埃及就被划在这种战略之中，进口一美元所支付的是42.9英镑，这基本上与出口一美元所得到的43.5英镑相同。目前，这种衡量尺度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决策部门和理论界所认可。值得强调的是，国际上许多发展经济学家都把不偏不倚的中性发展战略算在外向型经济范围之内。^②在他们看来，没有反出口偏向的经济就属于外向型经济。这样，中性发展战略在现实的贸易战略类型中就消失了。

从这个衡量尺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贸易战略的实质是形成什么样的市场经营环境的问题。在内向型经济中，国内的经济环境比国际市场环境要有利得多；在外向型经济中，国际市场环境的获利机会和风险起码与国内的市场环境相同，甚至更加有利。对于企业来说，产品流向取决于它对两个市场经营环境的比较。政府要引导企业改变产品流向，唯一的手段是调整国内市场经营环境，因为一国政府难以操纵国际市场经营环境。

要使国内市场环境的调整达到成本低收益大的目标，这必须以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为转移。在国际市场环境有利时，花费较少的调整成本就很容易造成外销有利于内销的局面。保护政策减少得愈多，体制愈开放，愈能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相反，保护政策削减的程度愈低，体制的开放愈有限，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利用就愈受到限制。在国际市场环境不利时，政府需要付出较大的调整成本才能造就外销有利于内销的市场环境。一般来说，政府不愿意作出这样的选择，他所愿意做的是降低外向化的程度，减少来自不利的国际市场的冲击。由此可见，国内市场环境是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的。

这种调整手段主要体现在不同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上。具体包括三方面：关税、进出口数量管制程度和汇率水平。假设考察的对象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一国内的某个地区，使用汇率水平进行调整就受到限制，因为一国只有在一种官方汇率，不会因为局部与全局的贸易战略不同而再增加一种官方汇率。当然，使用汇率的调整限制可以通过关税和进出口数量管制的差异得到弥补。许多国家设立的出口加工区，就是通过减免关税和取消进出口数量管制等方面的优惠，形成与国内不同的吸引外资、推动出口的小环境。

总之，一国贸易战略的选择体现了一定时期内一国政府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是通过具体的贸易政策和体制表现出来的，因此，外向型经济的本质规定应直接从一国经济贸易政策和体制中去寻找。而进口一美元所支付的本国货币量是否与出口一美元所得到的本国货币量相等，就是在政策和体制中寻找的结果。“几个为主”实际上是外向型经济政策和体制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由于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用不变的某几个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外向型经济的标志是否全面？

三、特区实践

经过不断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场环境明显比内地优越：第一，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更加优惠。比如，曾实行100%的外汇留成，率先被批准建立外汇调剂中心以及由较宽的贷款条件和较低的贷款利率等优惠政策形成的宽松的财政环境。第二，与亚洲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加工区相比，税收、土地使用费、厂

房出售、租金和公共设施的收费标准更加优惠。除了对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免税以外，企业所得税为15%，利息率税为10%，分别低于南朝鲜和台湾出口加工区的税收水平。第三，与内地相比，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更加广泛，更接近于国际市场的运行机制。目前，物资供应市场已全部放开，除了邮票、飞机票、船票和火车票为国家规定的指令性计划价格以外，其余的都是指导性计划价格和浮动价格，其中后者占90%左右。此外，金融体制的率先改革，为企业提供了与国际市场运行规则大致相同的经营环境。

这些优惠政策和体制改革，削弱了原有体制和政策中的反出口偏向，使特区的外向型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这表现在，（1）1987年，进出口贸易结构中首次出现顺差，改变了以前的以进口为主的不平衡状况。1938年的贸易顺差余额是2.4亿美元，1939年达到5.7亿美元。（2）出口产品结构已由以农副产品为主转为以工矿产品为主。1979年，特区工业产值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2%，大宗的出口主要是蔬菜、水果和砂石。1938年，工矿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达到69.2%，而农副产品比重下降为21.6%。（3）1936年，工业品出口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开始占据主要份额，1987年~1939年期间，这个份额分别是53.3%、53.5%和58.4%。（4）由以代理出口和转口贸易为主转向以自产产品出口为主。③特区自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1937年是58%，1938年是52.9%，1939年是63.4%。④

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尽管特区的经营环境比内地有较大的改善，但是否达到了外销与内销收益相同，甚至外销有利于内销的程度呢？由于缺乏进出口有效汇率的指标统计，我们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但是，这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统计数据得到说明。

1938年，特区商业企业商品供给总额为177.4亿元，其中直接进口占26.4%，本地生产者提供的产品占27.5%，来自内地产品占40.1%。同年，商品销售总额为193.1亿元，其中直接出口占17.7%，本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购买量占33.7%，流向内地的产品份额占48.6%。⑤从这个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产品销售的市场结构，还是产品来源构成，特区与内地的贸易份额都大于特区对外贸易份额，这意味着在本地需求一定条件下，通过进口，经过加工，一部分

产品流向内地，来自内地的零部件，经过加工，一部分也返回内地。

自1935年以来，以进口为主的转口贸易在国家各项政策限制下，受到极大的约束。与此同时，出口得到各种优惠政策的鼓励，出口收益亦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这并没有完全扭转直接出口所得到的收入小于或等于流向内地所得到的收入的情况。仅以深圳某外贸企业来说，1985年换汇成本为每美元换4.24元人民币，1986年为4.68元，1987年为5.31元，1988年为5.69元，1989年8月底已升至6.58元，平均每年递增11.66%，^①这说明特区现阶段的出口增长仍以财政的巨大补贴为代价。即使如此，1988年内销的是直接出口的2.8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国内物价指数不断上升、国际价格有所下降和各种进口产品差价及优惠政策差别产生的吸引力以外，出口许可证管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自1985年以来，外贸部对我国出口产品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许可证管理的有235种产品，其中148种是全面执行许可证管理。1986年以后，曾不受限制的“三来一补”和一些外资项目也必须要取得配额后，才能立项。这种管理办法，对于特区也不例外。尤其是对港澳地区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1985年87种产品列在这个范围内，1986年为127种，1988年增到257种。由于对港澳地区出口商品逐步实行全面配额加许可证管制，使到许多企业难以适应，比如，一些企业来料时，无须用证，经过加工则无证不能出口；利用国产原料、零部件也往往因没有许可证而出口受阻。由于经常出现有证的无货出口、有货出口的没有证的情况，解决的办法，对于企业来说，就是无证的一方拿钱向有证的一方买批文。某家外贸企业1988年自营出口创汇892万美元，其中有证商品674万美元。在有证商品中99%都是靠买批文实现的，花在买证上的费用达91万元，换汇成本增大了0.20元。这种许可证管理不仅增加了管理许可证的各种费用，最终变为出口成本的一部分，而且，特区也失去了对港澳地区出口的优势，比如，交通方便、信息快捷、市场关系密切等，导致企业宁愿内销而不愿外销的选择。

总之，对于特区来说，创造一个“外销有利于内销”的经营环境，不仅要按照国际惯例减免税收，降低公共设施的收费标准和缩小行政干预

的范围，提高行政办事效率，而且也要消除许可证管制，这是建立发展外向型经济环境所必需的。

四、模式选择

要形成外销收入与内销收入平等或外销有利于内销的市场经营环境，需要在以下两方面进行相应调整：一是改革现行的许可证分配体制；二是严格限制特区产品内销、削弱企业选择内销的吸引力，而调整 and 改革的程度取决于对特区外向发展模式的不同选择。

第一种可能选择的模式是自由贸易区。这种模式的特征是对内增加封闭性，对外减少限制性。这实际上是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延伸。按照这种模式，特区与内地的贸易往来，包括产品的内销和内地原材料的采购都要按照进出口对待，这会进一步增加内销的难度和成本，进而削弱内销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可以取消对特区的出口许可证管制，使特区在进出口审批权和许可证的管理验收方面推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体制，从而，减少特区产品外销的难度。通过“双管齐下”，纠正特区目前存在的“内销有利于外销”的市场经营环境。然而，在现阶段特区对内经济联系大于对外贸易往来的情况下，推行这种模式会使特区与内地的许多联系受到限制，如果对外贸易往来的增加不能迅速弥补减少了的对内经济联系，那么，特区经济萎缩不可避免。这是推行这种模式所要付出的一种代价。

第二种模式是综合试验区。在特区创办初期，正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初期，中央赋予特区的功能之一就是充当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综合试验区的角色，为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闯出一条新路子来。10年来，特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起到了改革示范作用。现阶段，外向型经济已作为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究竟如何发展仍需要首先在有限的区域内进行试验，因为在全国仍处于进口替代环境的情况下，许多贸易政策，包括关税，许可证管理等等，都具有较强的反出口偏向。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某些区域内形成“外销有利于内销”的出口导向的市场环境仍是需要探索的一个新课题。由于特区已具备的经济条件相对优势于其它地区，比如，相对完善的投资环境，不断发展的市场条件等。所以，它再次被赋予外向经

挤发展试验的历史任务。按照这个模式，特区与其它沿海地区的体制应是相同的，特区不需要割断与内地的许多经济联系，中央在进出口审批权限和许可证管理及发放形式的规定方面对特区不能例外。与其它沿海城市不同的是，特殊政策更加优惠一些，在进出口管理和减免关税方面更加宽松一些，归根到底，这种差别体现在优惠政策的数量上。在这种模式中，特区产品内销吸引力因政策限制会有所削弱，但不象第一种模式那样彻底，在出口许可证管理方面特区可能得到的审批权限大一些，但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执行全国的统一规定。这对出口的刺激也不会象第一种模式一样有效。由此也不会形成“外销有利于内销”的市场经营环境。由于这种模式在两方面的调整程度上存在一定的限制，无法实现外销有利于内销的市场环境，这就需要增加对特区出口的补贴和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这种补偿手段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支出为代价。

上述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如果从可操作角度衡量，第二种模式变动较小，易于推行，关键是特区能否获得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第一种模式可能对特区现行的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冲击，由于对外联系程度的限制，在现阶段，推行的难度较大。

五、结论

无论外向型经济还是内向型经济都是一国政策调整和体制变动的结果，判断的标准应从一国的贸易政策和体制中去寻找。不同的贸易政策和

体制导致不同的市场偏向，企业的产品流向取决于市场偏向，因此，要鼓励企业产品外销，其基本前提是要形成有利于外销的市场经营环境。就特区而言，目前的市场环境仍然有利于内销，要发展特区的外向型经济，首先要纠正现行市场偏向。这种调整涉及到特区与中央、特区与省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关系有不同的外向发展模式的选择，所以，深圳经济特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程度实际上是中央、省和特区经济利益协调的结果。

- ① 参见《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工作纲要(1987—1989)》，《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新阶段》深圳市委政研室编，1987年出版第175页。
- ② 这里主要指耶鲁大学的T·N·斯里尼瓦桑、世界银行的B·巴拉萨和A·O·克鲁格。
- ③ 根据规定，在特区内经过加工增殖20%以上的产品都属于自产产品。
- ④ 参见《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各年份)深圳统计局出版。
- ⑤ 参见《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88年深圳市统计局出版。
- ⑥ 参见《深圳特区报》1990年2月27日《换汇成本逐年上升的因素》一文。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郑英隆

也谈社会主义社会肯定 与否定的辩证法

——与王坛浦、张政同志商榷

张江明

王坛浦和张政两同志（简称王、张）在《论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与否定的辩证法》一文中（见《学术研究》1986年第3期），对我先发表于《哲学研究》，后收入《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一书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之否定问题》（简称《问题》）一文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同我商榷，对我很有启发和教益。我在该文中对某些问题的论证不够充分，未有展开，确实需要补充。但是，我对王、张的一些论点仍持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再作商榷，并就教于王、张和哲学界同仁，以便进一步探讨。

一

王、张在写的文章中，不同意我所说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否定和阶级社会自我否定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不同意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是由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工人阶级创造条件自觉地进行自我否定”；“阶级社会的自我否定不是由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自我否定，而是由和它相对立的阶级，由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来否定它”。认为“这样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同阶级社会的否定，……是不妥当的。”这样，“难免有外因论之嫌”，也“难以区别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与形而上学的否定的界限了”（凡引自该文的均不注明出处，下同）。他们的根据是：自我否定都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反动阶级不愿意自己否定自己，同客观上自己创造条件否定自己，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等等。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否定，都是客观的自我否定，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也无论是阶级社会还是正在消灭阶级或已经消灭阶级的社会，都是这样的，概莫能外。这在我写的《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问题研究》一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观点是

很明确的。在这一点上，我同王、张是没有分歧的。问题在于：自我否定除了有共性普遍性之外，是否还有个性、特殊性？能否说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否定和阶级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有不同特点和性质？这些特点和性质究竟是怎样的？分歧的焦点是在这里，其他问题的不同看法，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也是值得深入研究。

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如同各个阶级社会一样，也是自我否定，即自己创造条件否定自己，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有它的特点。它创造自我否定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条件或叫物质武器，即生产力的发展以至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相容；另一面是精神条件或叫精神武器，即能够使用武器的人——无产阶级。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

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很明确的，而且作了反复的论证。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这个无产者，是资产阶级“自身的掘墓人”，是“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所形成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那么，资产阶级的统治怎样被否定、改变为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这就是说，不是资产阶级自动取消统治地位，让无产阶

级来统治自己，而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来否定资产阶级统治的。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的必然过程。

为什么资产阶级创造了自我否定的条件，却由无产阶级担任“掘墓人”，去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呢？这因为：对剥削阶级的否定，即推翻它的统治，是“痛苦的”，关系到本阶级的根本利害和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它必然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武力镇压、流血斗争，反对对它的否定，竭力保持既得的肯定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被统治的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这由于：无产阶级同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在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它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否定，是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把它之所以称为无产阶级也予以否定。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肯定，上升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这是过去任何阶级社会都不可能出现与存在的。

二

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否定和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从社会主义辩证法来看，主要是：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处在统治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主动地自觉地进行自我否定，不是由另一个相对抗的被统治阶级，经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来进行否定。因为，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把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社会主体才不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对抗。社会主义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还存在利益集团和群体利益的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不属于根本的阶级利害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范围还长期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体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大量存在的是先进和落后、革新和保守、新和旧的矛盾。一般上都不属于如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那样对抗性矛

盾。因此，可以由社会主义社会主体中起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调整、自我发展来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仅创造了自我否定的物质条件、物质武器，而且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使用这个物质武器来实现自我否定（工人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主观世界）。这是从进入阶级社会的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是由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造了自我否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它创造了“掘墓人”，但它自己不担当“掘墓人”，只好由无产阶级来肩负。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历史使命、社会经济发展、利害关系和社会功能来决定的。无论农民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都不能胜任。这是已经为历史实践证明了的。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从低级阶段公有制到高级阶段公有制，以及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自我否定。在公有制和公有制之间，就它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本质来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发展阶段、所有制形式、公有化程度、所有制规模等方面，又有层次上、水平上、程式上、隶属关系上等等的质的不同。要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否定，才能到达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从初级阶段公有制到高级阶段公有制的自我否定完成以后，便进入更高级的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自我否定。这是一个向上的、前进的、永无止的自我完善、自我否定的过程。不会如同原始共产社会后期那样出现由私有制来否定公有制。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私有制对原始公有制的否定，是第一个否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这里所谓“个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等属于“共同占有”，劳动所得的报酬、生活资料的消费品归个人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公有制把

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在发展公有制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满足和改善个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把马克思向上的、前进的否定之否定观点，曲解为倒退的、向下的重新回到私有制去，这是颠倒了马克思的原意，是根本错误的。而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是从私有制到私有制的自我否定，以及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自我否定，这是必然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这是从私有制到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得到解决，而是引起它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和激化，更没有挽救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自我否定，是在帝国主义时期取得以公有制来否定私有制的伟大胜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复杂的曲折的过程，甚至会出现某些反复。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是暂时现象、是一个“小插曲”，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主义中来的。帝国主义必然垂死、没落的总趋势不可能根本改变，但却出现新的特点，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采取适合于新时代要求的方式方法，以实现和完成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自我否定，这是很必要的。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否定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不仅积极创造自我否定的条件，而且在条件具备和成熟时，主动地逐步地实现自我否定，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消灭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失去存在条件，没有需要，逐渐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进入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过程。而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主观和客观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资产阶级不自觉地、“无意中造成”自我否定的条件，这是客观的必然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阻止是不可能的。但是，资产阶级主观上决不愿意否定自己——即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埋葬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包括军事机器，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反对和镇压进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否定行动。它创造了“掘墓人”，但它自己不是“掘墓人”，而是由和它同时产生、与

它相对立，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无产阶级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的。

在这里一再强调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特点，是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会不会陷于外因论呢？是否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呢？看来，不会变成外因论，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自我否定，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和发展的，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和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基础，而资产阶级则占居统治地位和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中作了详细分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了深刻论述，他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生的双生子。”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在这对矛盾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同样，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它们互相联结、互相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各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或向着它相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种转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转化，不能说是外因论。

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有不同性质与特点是很重要的。这可以明确分清自我否定的不同性质，避免由于性质的混淆造成失误；可以根据不同性质自我否定的不同特点、条件和情况，提出指导自我否定的理论、方针、政策、措施、办法，取得良好效果；可以充分调动被剥削阶级——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否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照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掌握最适宜的时机和条件来实现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自我否定。

抹煞和取消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有不同性质和特点，是很不妥当的，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自我否定的。这就会如同前面所说，容易出现混淆两种不同性质自我否定，在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在行动上造成失误；就会忽视被剥削阶级即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关键性作用，陷于无所作为，消极等待的状态；甚至会片面地认为只要发展生产，无须经过任何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便自然而然地被消灭，资产阶级能够自动地取消剥削，主动地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这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这个历史使命。

三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以及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有正确的辩证的认识，既要有全面性观点，不能陷于主观片面；又有所侧重，应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对象、不同需要来确定着重点，而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实践的发展，着重点也会发生转变，不能把着重点固定化和绝对化。王、张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研究至少应该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应当偏重于它的肯定因素的研究，同时也必须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辩证关系。”而“《问题》在谈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巨大优越性时也都部分地谈到了，但是该文的重点是论社会主义否定的新特点，因而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我认为这些看法不符合于《问题》这本书的基本精神，其原因在于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自我否定新特点和自我肯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尤其是没有正确认识通过新特点的阐述明确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认识通过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论述，对社会主义社会肯定方面作了深刻分析和树立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强信念，等等，怎能说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没有“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怎能把社会主义自我否定新特点和自我肯定分割开来呢？本来这些不是“争鸣”的问题，只要认真地查对原文、掌握基本精神，它的孰是孰非就会一清二白的。为了更好地用事实来弄清问题，这里从《问题》这本书中引用一些必要的原文，以作说明。

首先，《问题》一书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肯定方面是作了鲜明有力的集中概括的，明确指出，“在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否定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

社会主义社会的肯定的重大意义。”既然它的否定是自己创造条件否定自己，“在条件还未具备时，就不能否定，而是应该坚决地予以肯定。”对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事事否定、时时否定，“只能否定所应该否定的东西”，“必须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所应该肯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坚定地肯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肯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肯定四项基本原则，肯定社会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胜利的光明前途，肯定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二大提出的纲领、任务，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之中，那一方面属于主要方面呢？《问题》是作了明确回答的，指出，“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肯定方面仍然处在上升时期，同现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合理的，必然的，是有巨大的优越性的。”我们有一个习惯，对肯定的东西要写得比较长，否则，就肯定得不够。其实“话不在多”，而在于是否说到点子上。如果是画龙点睛，几句话就够了。有的文章拖泥带水，面面俱到，模棱两可，字数很长，但中心不突出，观点不明确，即使是长文，也是作用不大的。

其次，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新特点和社会主义社会自我肯定的辩证关系，既看到两者的区别，又承认两者的联系，及其互相连结、互相推动、互相转化的作用。不能用旧社会的否定观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否定的特点，主要是：（1）正如前面所说，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取得统治地位、占居矛盾主导方面的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自觉地创造条件进行自我否定，即自我完善，逐步地由低级阶段前进到高级阶段，不是由别的阶级来否定，也不是经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来进行否定。（2）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能够这样进行自我否定，这是由于它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成为主导形式，这就决定了在条件具备时，社会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到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即自我否定来实现。这种自我否定同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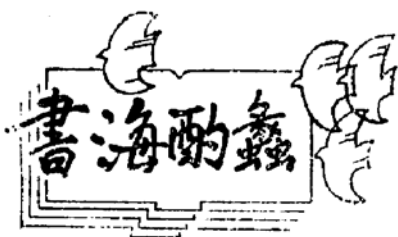
全一致的，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因而得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3) 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否定是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和特点，认真走群众路线，循序渐进地进行自我否定，同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必能获得优良成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例如，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不断地由新变旧、又由旧变新，即是由肯定到否定，又由旧的否定到新的肯定。当这种新体制建立时，处在肯定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体制就从新变旧，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即是否定旧体制，建立适应于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这就又从否定到新的肯定。因此，不能说否定就是不好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否定旧的，新的就不能向前发展。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仍然存在两种否定：一种代表着新的先进的向上发展的否定因素，这是先进的

否定因素，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前进到共产主义去的；另一种在一定时期还存在的旧社会残余的否定因素，引导到复辟资本主义去的。我们是要大力支持、促进前一种否定因素，反对和防止后一种否定因素的。从总的来看，前一种否定因素代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流和必然趋势，即使出现后一种否定因素及其实现，也是暂时的，必然会改变过来的。

再次，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可战胜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新的自我肯定，或共产主义社会自我肯定，都是不可战胜的，必然能够冲破种种阻力，克服无数困难，在曲折中前进，取得最后胜利的。这是大家都已懂得的一个原理，也是《问题》中作了比较详细说明的，不再重复。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范英



《乡村四月》作者是谁

房日晰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作者一般都认为是南宋四灵之一的翁卷。然就阅读所及，这首诗的作者还有两人：一是范成大，见南宋谢枋得《千家诗》，题为《村居即事》，诗的字句悉同。检《范石湖诗集》，未收此诗，也另无佐证，故难动摇翁卷的著作权。二是谢完璧，见厉鹗《宋诗纪事》卷五十二，注明据《西溪丛语》，题作《村景即事》，诗的字句悉同。这条材料，却足以剥夺翁卷的著作权。

《西溪丛语》的作者姚宽，其生平事迹见王清明《挥麈后录·秦会之以姚宏不签名卒以祈雨死大理狱中》条及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十八《姚宽》条，从两书记载可以确切地推算出他的生卒年为（1105—1162）。翁卷的生平事迹，见《乐清县志·本传》，他的生卒年难以确考，约为（1160—1221），虽不能说死，但不会有很大出入。如此，姚宽卒时，翁卷不过是呀呀学语的小孩儿，这时《乡村四月》已以《村景即事》为题载入姚著《西溪丛语》。又检杜信孚等《同名异书通检》，未见《西溪丛语》，可见另无同名异书流传者。据此，这首诗作者不是翁卷，而是谢完璧。考谢仕历不详，亦别无他诗传世。又细检《西溪丛语》，未见此条。或厉鹗所据之版本今不存，或所记有误。在未查出有记载这条材料的《西溪丛语》的版本以前，这首诗的归属又只能存疑了。

编者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的重要的课题。自开设这一研究专栏以来，我们发表了一些有理论见解的文章。本期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流同志和《求是》杂志副总编吴建国同志的文章（本刊有删节），从宏观的理论层次上对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希望能推动这一研究的发展、深化。同时，我们还发表两篇关于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问题的研究文章，这也是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的新路子之一。欢迎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参与到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来。

· 精神文明建设 ·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战略性任务

江 流

一、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经验的总结。

为了提高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仅仅从感性经验上总结是不够的，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五十年代毛泽东曾经就高层领导干部犯错误的情况讲过：你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你缺乏观察一切的东西，也就是缺乏世界观。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理论上的清醒是最根本的清醒。理论上失之毫厘，在实践上很可能差之千里。有的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年代都是表现不错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关头却犯了错误，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根本思想体系的问题和世界观的问题。要掌握无产阶级思想理论体系，应该从总结经验当中，特别是对经验作科学的分析，联系实际来研究理论，可以说这是一个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我们党现阶段的思想指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从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角度来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全体上提高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认识，也是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觉性的一个重要步骤。再一点，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除了提高认识、摆正方位、下定决心，还需要具体地探索它的规律性。从这方面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摸清了规律，就能避免精神文明建设中发生的曲折。这一方面的理论探索，过去做了一些，但还跟不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有待于深化。

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理论去总结的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用什么样的世界观观察有关国家和社会命运的问题。我们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

具，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性胜利重要的思想资本。我们不能让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渗透、毒化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这方面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使马克思主义与新的世界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和说明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的成绩和经验。如果我们以资产阶级的眼光、观点来观察解释，那就会把我们引向资本主义，污染和败坏社会风气，使人民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企图改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发展资产阶级的文化，因此更需要我们依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辨别真善美和假丑恶，以保持共产党人的清醒头脑，不作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俘虏。

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

为了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不应该局限于精神文明本身的研究，而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才可能概括和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研究。第一，大家知道，列宁有一个重要的命题，真理是全面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全面性，全面性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身之所以是科学的根据。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要求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谈到人类社会由低向高发展的过程，说明人类社会是从片面性社会到全面性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生产能力总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固定的地点上发展的，在这里个人和社会都不具有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随

着生产力发展，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为造成社会联系的普遍性和发展的全面性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发展归根结蒂要服从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需要。由物的关系为重点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操纵一切的盲目力量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台围绕它转的机器，每一个社会的元素，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阶级都在为钱的挣取而奋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物的不断增值的同时，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贫困以至于堕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尽管为社会的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私有制的局限，社会化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全面性的调节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社会还是向着片面性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否定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形成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劳动活动和全民自觉活动的协调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打开了大门，社会不再把片面的经济增加作为自己的目标，使经济的增长服从人的需要。社会不再把人的发展限制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达到全面发展的社会和全面发展的人的境界。第三，要建设全面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全面的发展。目标的全面性要求途径的全面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步步地引导我们沿着这样的途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叶剑英建国三十九周年的讲话当中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方面，但不是全部，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应该

包括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全面性认识的一个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抓住这两个文明的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单纯的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是单纯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然后再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必须同时建设、同步发展，否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是完全的，而是缺乏吸引力的。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的国庆讲话中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的飞跃，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大局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后来召开的五中全会又总结了**我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了**经济建设秩序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中央领导的这些讲话可以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大的角度帮助我们明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三、关于把握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需要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当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如果不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就会阻碍社会主义内在优越性的发挥。许多事实说明，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两种不同的方向，当然它带来的也必然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看，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都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

经济体制改革尝试的时候，他就明确提出两种不同的改革方向的存在和斗争。当时列宁说过，共和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群众跟着工人阶级走、争取与工人阶级联盟，还是让资产阶级使农民群众与工人阶级分裂。对这样的结局看得越清楚，我们避免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可能性就越大。七十年以后，情况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列宁的这些话还是不可少的，在那个时候就敲起了警钟。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探索性的试验，如何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以致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当然首先取决于政治领导的正确。为了赢得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的胜利，应当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共同努力。如何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关系大局的根本利害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方面，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首要的课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这应该是义不容辞的。从这一特别的角度来总结研究既有的经验教训，可以肯定只有抓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才能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真正成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可靠保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范英

如何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研究

吴建国

关于文明问题，从理论上看我党有重大的发展，就是把社会主义本身的主要实践归结为两个最基本的建设，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个问题上，前几年有不少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观点。如：我们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贫穷落后，全部的问题就是把生产力搞上去，只要把生产力搞上去，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这就排除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有一种说法，生产力决定一切，“衣食足而知荣辱，仓禀实而知礼仪”。其实，这是用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果真如此，那精神文明建设就的确不需花工夫了。从历史上看，管仲的这一观点显然不能绝对化。大量史实证明，衣食足不一定就知荣辱，仓禀实不一定知礼仪。当然，作为社会生活来说，首先是物质资料的丰富，满足人们的需要。但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精神需要也是很重要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都是很基本的、不可或缺，更不能相互取代。所以，研究这个问题，基本理论上还有一个正本清源的问题，要排除“精神至上论”，也要排除机械唯物论。小平同志总结前几年的教训时说：“归根到底是忽视了教育，首先是思想政治教育”，这就是放松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它的核心建

设的问题。

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辩证地看两个文明的关系，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的人却将它们简单地等同了，将精神文明等同于意识、将物质文明等同于物质。实际上，两个文明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任务的角度提出来的，它与哲学上的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关系不是同一个序列的概念。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它为人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和反映，这一概念的涵盖面是相当广泛的。物质文明则是物质存在的一个非常具体而特殊的形式，是人类改造客观外部世界时所创造的，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成果。凡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有物质载体的，都可称之为物质文明。可见，物质与物质文明两个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都很不一样。社会存在与物质文明的关系也不是相互等同的关系。社会存在是人们赖以生存在其中的物质条件的总和，它是物质的又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它与人类的诞生而同时诞生。通常，人口、资源等也属社会存在范畴，而人口和资源是未经专门改造的，不能纳入物质文明之中。所以，社会存在与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小概念之间的关系。可见，物质文明概念是一个

很具体的概念，不可随意扩展。物质文明与社会存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生产方式实现的，而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关系不能纳入物质文明之中，而生产力要素中，劳动对象开始未经人类开发，亦不能纳入物质文明之中，劳动者——人，更不能说就是物质文明，它是创造两个文明的主体。所以，不能作一个简单的归结，说生产方式就是物质文明，也不能说物质文明就是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它们在逻辑上来说，是不相称相应的。显然，一方面，物质文明与物质、社会存在、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有不可抹煞的区别；另一方面，它们之间又有着内在的联系，物质文明是物质、社会存在的特殊形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种表现，而且物质文明的创造总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创造的，它们也有重要的联系。所有这些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搞清楚，正确认识物质文明的特殊规定性，才能从总体上把对它的研究深入下去。

我们的社会主义实践，曾有一度忽视物质文明建设，强调“精神至上”，似乎主观能动性发挥得好就能创造和改变一切。实际上，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但缺乏起码的物质条件，精神也会萎缩，人们的精神不会在长期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永远保持高涨振作，这是我们从大量教训中得到的一个结论。但近几年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和思潮，生产力的自发决定论又抬头了，似乎什么都由生产力决定，甚至干部任用也用这个标准，这就将生产力标准引申到了荒唐的地步。把发展生产力等同于物质文明建设，认为发展生产力就是一切，是错误的，把发展生产力等同或取代精神文明

建设就更加错误了。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两个文明要同步，要两手齐抓，这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左”和右的错误造成的危害都是沉痛重大的。

其次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是不能分割开来的。人类的实践过程不外归结为对自然和社会及人本身进行改造的几个大类，两个建设，都同时贯穿其中，创造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在同一个人类实践过程中，即精神文明不是从自己头脑中生出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靠“吾日三省吾身”的内在反省活动来实现，它是在人类改造客观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的，它伴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过程同时进行。离开了物质文明建设来谈精神文明建设，根本不可思议。过去，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经常是两张皮、两个序列、各不相通、各工作部门互不相干，殊不知，这两个过程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见，两个文明一齐抓是它们的内部本质的规定。只有这样看，两张皮才能从根本上融为一体。

精神文明与哲学上的精神、社会意识能否等同呢？这是前述问题在另一角度的提出，很相似。我看，它们也是不能等同的。精神现象是很复杂的现象，人们的意志、观念、思想、包括情绪和心理，都属这一范围。但精神文明，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把它与一般的观念、思想等思维活动和观念框架区分开来。不是一切属于精神现象的，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不管任何条件下和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社会关系很复杂，思想观念和心态就自然复杂，就会有各种体系，但它们并不都属精神文明范畴。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

外部世界时的一种精神成果，它体现了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崇高追求和向往。精神文明必须与一般观念意识有所区别。研究精神文明，应看到它与社会意识的概念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精神文明首先是文明，它与野蛮、愚昧、落后、颓废、腐朽的东西相对立，它是能激励人奋发向上的积极的精神成果，不是所有的精神成果都能纳入精神文明范畴。可见，文明是标志人类进步状态的，精神文明就从精神生活角度来标示人类的进步状态，这种功能，是社会意识的一般规定中不具备的，这是精神文明的一个特殊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不过是精神文明加上了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限制而已，是对精神文明的特指和性质标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不同，物质文明不具有阶级性，精神文明则打着很深的阶级痕迹和烙印。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精神文明的原则和要求。对社会形态发展序列中的任何一个形态来说，后一个总比前一个处在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上，它的精神文明总是较之更先进些。人们的观念在不同的历史状态里，有不同的表现，但各个发展水平，都完全有理由占据人类历史长河中——应有地位。可见，物质文明可以不加社会主义的限制词，精神文明则必须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制来表明它的性质及体系特征。

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标志，涉及到精神文明两个组成部分，即知识和思想的内容。这两方面内容中，后者起着主导的作用，占据支配的地位，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与我们的区别，不在于它的知识文化部分，而在于它的意识形态，即思想意识、观念伦理、觉悟理

想等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应注意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中的思想成份，以确保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作用，从政治上来说，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从伦理观念来说，是集体主义的观念和意识；从思想体系来说，则是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根本不同的。这些方面，标志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性质，是我们精神文明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原因所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成份既然决定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那这性质又是哪来的？这也牵涉到两个文明的关系了。精神文明中知识成份与物质文明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的技术和设施，都与物质文明发展程度有直接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精神文明中的思想成份，即道德情操、精神状态、觉悟水平则很难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建立一种直接的勾通。它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和微妙，两者可呈同步状态，但又可能互相背离成反比关系。所以说思想成份不完全取决、不直接取决于物质文明的积累水平和发展程度，如果要划等号的话，就变得很荒唐了。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很高，物质文明水平很高，但它在政治上的反动性虚伪性就很明显。精神文明中带有共性的、浅层的，如卫生等等，也不决定精神文明的性质，只有深层的思想觉悟方面才决定它的性质。而深层思想觉悟的现实基础在于现实的、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生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精神文明中第二方面内容的要求和原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就决定了我们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意识必须是集体主义和四项坚持的。有些人曾说，现阶段不能提共产主义道

德教育,那什么时候提呢?到共产主义时,提这教育就已经毫无意义了、很滑稽了。只有它还不是的时候,你鼓励它、追求它,就会产生一种动力,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才需要不断的提倡和推动。推动的客观基础在于它原来就代表着工人阶级推翻旧制度,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工人建立了自己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面领导地位,就会自然提出在思想意识上相应的要求,这就是它推动的依据。现存的、已完成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就是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础,集体主义观念和原则都由此生发出来,这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基础和根据。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知识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共产主义本身是一种科学,它比任何科学都更复杂和艰深,在它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含糊,否则,理论上的失误必然带来实践上的巨大灾难。历史多次证明了这点。这等于说,我们应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看成是一个体系,是包括知识和思想两个方面的,不能相互截然割裂。思想的成份不能靠直感,要靠科学,真正理解和把握它,没有文化知识的准备和教育基础是不行的。一个文盲,可以产生出一种朴素的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但他不能形成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意识。因

此,我们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不能忽视知识的成份,只不过,单纯的知识成份本身不足以标志精神文明的性质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而已,而且,知识成份如果脱离了思想成份,它就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思想体系服务的东西。所以说,精神文明中的知识、文化、设施和传播手段等等,不与思想意识的要求协调起来,就不能为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服务了。可见,实现知识与思想两者的统一是极其重要的。从人类社会的总体现象看,它可以划分为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但并不等于人类文明建设就可以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的建设来涵盖所有的人类实践。例如,国家机器的建立,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就不属于精神文明或物质文明建设的内容,它们属于组织人们进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的管理机构,这是社会的需要,是组织人们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管理机构。这里面有一种交叉状态,有些可划入物质文明建设范畴,有些可划入精神文明建设范畴,如民主观念,属精神文明建设,但人大常委会建立,作为管理机构就不属了。可见,在两个文明之间,还有中介,有中间环节。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

责任编辑:范英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 推进主体素质的提高

章岳云 王悦华

一、提高人的素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物质文明建设是以物为对象，是依靠人对物、对自然进行改造，精神文明建设则主要是以人为对象，是引导人对自己主观世界自觉进行改造，并从而提高人改造物、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始终要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作为目标和归宿。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主体建设的一致性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一种主体性建设，它和主体自身的建设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是因为，首先，主体自身的建设既是现代化建设的手段，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目的和手段在主体价值中的这种内在统一性，使主体发展成为社会个人都自觉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素质的提高就成为社会和个人自觉的建设和创造活动，社会主体建设因而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种高度自觉性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主体建设的内在统一性，还表现为主体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客体，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象、客体来看，这种对象、客体是人，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精神文明建设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促使人的全面发展。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来看，它又是通过人来自觉进行的，人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和客体是一致的，这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主体的自我建设。

（二）在我国提高主体建设的客观必然性

在我国，社会主体的基本形态是人民，它是指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个体、团体和阶层，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历史传统的特征和某些局限性必然在主体身上体现出来，主体就既具有先进性特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和落后性。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把个人和集体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私有制下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个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加强，主体力量的发展，只有在集体、社会之中才是现实的。而集体、社会作为主体，乃是个人主体力量的有机集合。集体、社会只有使每个人得到发展，才有其作为主体的发展。其次，人民既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又是社会的主人。这种统一消除了私有制下主体与主人的分裂，使主体能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发挥其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使主体能够真正占有自己的实践及其成果，满足主体的各种需要，发展主体的各种素质能力，实现主体的目的、理想和价值。因此，人民的主体和主人地位的统一，既给主体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内在动力，又给主体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形式。

但是，社会实践主体又会受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历史制约性和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生产社会化、商品化水平低下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从而造成主体的需要和满足程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上，主体素质、能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在一定时间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

要求。

第二，由于官僚主义、封建宗法关系和特权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健全等，影响了主体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等政治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制约了主体个体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

第三，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滞后，文盲和半文盲占全国总人口的1/4，这就直接影响了主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与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极不相适应。

第四，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影响，带来某些消极的因素。使主体在心理特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与改革开放都存在着冲突和对立。

我们正面临当代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全球性变革和发展，它把人的发展推向社会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许多事实说明，一个国家无论引进多么先进的科学技术，无论采用多么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或者无论实行多么现代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如果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动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只能是徒有虚名。因此，对人才和智力资源的开发，全面提高主体的素质，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功地接受这场科技革命的竞争和挑战，实现民族和社会腾飞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二、提高人的素质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结合点

人的素质的提高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内容，而且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结合点和转换点。抓住这个结合点，就等于抓住“两个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就可以把“两个文明”建设都带动起来。

(一) 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历史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的历史。社会历史实践是人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客观的对象性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自身之间发生和发展着主客体的辩证关系。

社会的文明进步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社会文明不仅表现在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的

和精神的积极成果上，而且还体现在人的发展上。这是因为，物的形态只有在蕴含着人的创造性之后，才具有文明的含义而区别于其它自然存在物，也只有人的使用和享受中才真正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因此，主体——人的发展水平，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本质的深刻的内涵，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的价值尺度。事实上，文明进步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本身就包含了人和人类的发展这一价值内容。文明进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本身，就包含了人类自身开化进步状态，一种文明进步最有生命力的标志是人的发展。

其次，社会文明进步又规定了人的发展的具体内容和形态。人的发展，从一般意义上是指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的素质和能力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它具体表现为文明发展不同阶段上主体的实践内容和方式，表现为主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内容和方式，表现为人的解放和自由的程度。而这一切，又取决于这个阶段物质和精神成果的状况。人的发展，只能在社会文明进步的具体形态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即获得具体的实践和生活的内容、条件。也就是说，人的发展，只能在社会文明的成果和对这种成果的享用中得到度量 and 说明。例如，与封建社会农业的文明进步相应的是农民和封建地主，大机器工业则相应地造就了现代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社会主义文明进步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高级形态，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成长。社会主义文明进步使人从私有制的异化形态中解放出来，以社会主义主人的身份，自觉地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使这种文明成果回到人自身，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我”。因此，社会主义文明进步不是通过对抗的形式，而是以和谐方式实现同社会主义新人发展的内在统一。

(二) “两个文明”建设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高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都不能离开人的素质的提高。首先，从“两个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其结合点是人。“两个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精神成果。人类历史就是人们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历史。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的影响。人类的发展、人类素质的提高，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决定着“两个文明”

的发展。

其次，实现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任务，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高。社会主义现阶段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是社会生产力的最基本要素，要不断提高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的质量，就需要不断地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第三，“两个文明”建设都离不开具有较高素质的人，精神文明主要有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在思想道德方面，包括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风貌，社会风尚和人们的世界观、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组织纪律性的状况；在科学文化方面，包括社会的文化知识状况，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项事业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设施。这两方面的建设都集中体现在人的素质的提高。同样，物质文明建设也离不开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越高，人们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数量就越多，质量就越高，物质文明的建设就发展得越快越好。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现代化，除了物质现代化以外，必须在精神文明方面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即思想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

达，教育事业的普及，文化知识的提高，文学艺术等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这就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因为人的现代化，与整个国家、民族在精神方面的现代化是直接联系着的。

一个社会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要通过提高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来获取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一个没有革命理想、没有革命精神、价值观念陈旧，没有高尚道德、没有严明纪律的民族；一个文盲充斥、科学技术落后、野蛮愚昧的国家，是不可能建设起现代化的物质生活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上落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精神生产、精神生活上的落后，即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落后，也即没有现代化的人。精神萎靡、工作懒惰、文化水准低、科学技术落后、缺乏现代化观念意识，是经济上落后、物质文明水平低的国家、民族的共同特征。

总之，现代化的关键是人，是人的素质问题，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着力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始终要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中心，把培养一代新人作为根本性、长期性的历史任务。

作者单位：广州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
责任编辑：范英

· 精神文明建设 ·

论 健 康 人 格

梁世红

人的素质是有结构的，它是多方面、多层次素质的有机组合。其中最基本的是两类素质：表层素质和深层素质。表层素质是个人接受社会的科学文化教育、道德教育所形成的素质。表层素质是变动的、不稳定的、外露的、较易把握的素质。深层素质则是表层素质中最精华的部分与人的潜能和人的心态的揉合。深层素质是内在的、稳定的、不易改变的、难以把握的素质。深层素

质内最重要、最深刻的要素是“健康人格”，它隐没于人的精神底层，影响、决定和牵制着人的其他素质的生成和发展。引致人的精神境界跃升的不仅是表层素质的作用，更要紧的是深层素质的充分发挥，是健康人格的铸造。可以说，中国的文明，应该伴随着中国人人格的健康发展而不断向前。人格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机体正常运转的参照系。如果一个社会忽视了理想人格的追求，那么，它在某种意义上就去失了精神

支柱。忽视了人格发展的社会，只能是不健全的社会。

健康人格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

每个人都有内在行为的倾向性，这就是人格。人格是人的信仰、情操、价值观、态度、意志力、习惯、兴趣和气质的总和。人格要从历史的、文化的、生物的、心理的多种取向来解释。人格形象犹如自我与世界之间的一幅“面具”。当人格能有效地维持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与周围社会环境和谐一致，也维持个体与自身的和谐一致，从而保证个人身心舒适，顺利发挥个人的潜能，实现其奋斗目标时，就是一种健康人格。人格健康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人的大致生活方向和基本成就，影响着人的表层素质的运用和发挥。因此，健康人格也就成为人精神上的燃料库和发动机。

健康人格带有强烈的价值取向，它以价值观念的更新，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为前提。它的主要之点是对于理想人格的设计。理想人格设计的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最高目标与过程目标。所谓最高目标，是指健康人格要求人们达到的最高境界和状态。过程目标，是指通向人格的最高境界对人们所要采取的行为步骤。过程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完全是为了最高目标的实现，最高目标指导着过程目标的选择和执行。当今的理想人格设计最需要突出的是人的自主精神，它包括自尊、自爱、自信、自强和自立等精神。

自尊是自主精神中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品格。自尊需要既是人类共有的基本需要，也是人的深层动力之所在。影响自尊需要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结构，是一定社会结构能否提供给人们均等的竞争机会，如果社会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人们的自尊需要就会以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来；如果社会结构没有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人们的自尊需要就有可能以一种消极甚至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可喜的是，改革的大潮以勇猛之势向中国依附人格展开挑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公平竞争，使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表现自己的个性，争取自己的权利，证实自己的实力，以自尊的主旋律拉开了人格重构的序幕，我们即可看到，以自尊为支柱的自主精神，将演出一幕幕生动的健康人格的场面。

以自主精神为核心的健康人格，用独特的能力展示其在精神领域中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并

证实自身有足够的理由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指向。

健康人格注意延伸自己的各种能力，主张积极接受新的有益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未曾尝试过的新工作里造就自己的多种能力。

健康人格认为广泛的社会交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人的素质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具有健康人格的人相信人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赤诚相见的可能性，主张人与人之间开展平等、互惠、亲密和宽容的交往，不强求他人必须同自己的看法一致，即使身居要职，也待人热情、直爽。

健康人格正视人生的曲折和艰难，强调人应该经受住生活和工作中不可避免的挫折，谨防把不良情绪带入角色。并主张要善于把握自己的情绪，有目的地、自觉地塑造各类有朝气的新角色。

健康人格主张要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自己对待事物的态度，反对凭主观愿望盲目行事。他们相信人能被环境改变，更坚信人有干预和改造社会弊端的力量。他们不是把适应社会现状当作目的，而是把它当作向更高级、更完善的社会过渡的中介。为了不停留现状而积极适应现状，就是他们积极的人生态度。

健康人格认为，对人们来说，探索自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自我向较高层梯跃进，超出旧有的自我，以便与发展的世界及发展的群体相融合。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自我新形象的推出是成正比的。因此，健康人格主张要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特长和弱点，刻意在工作中展示自己的特长，克服自己的弱点，以加倍努力塑造自我的新形象。

健康人格的此类素质能力，使人在同一文化层面上，坦露不同的个性，显现出差异甚远的工作能力。不少成功者的经历反复证实，一个具有健康人格素质的人，他的社会工作适应力较强，取得成功的机会较大。反之，一个缺乏健康人格素质的人，尽管学识不浅，社会地位不低，其成功的可能性却不大。

就人格理论而言，健康人格是智慧力量、意志力量、道德力量三位一体的理想人格。如果片面强调某种人格力量，忽视其他人格因素，就会造成畸型人格。

我们人格的缺失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

机制的健全中得到补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强化公平竞争，必然导致主体的意识觉醒和触及人格改造的神经。商品经济的核心是建立公正、平等、自由竞争的运行机制，这就为健康人格的发展创造了宏观的社会条件。自由平等、自强自立精神的导扬，又为健康人格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条件。

构建健康人格，不是简单的将智慧力量、意志力量和道德力量相加，也不仅仅是人的潜能的开发，而是要在更深层次中解脱人的思想束缚，开发人的创造性思维，保持人的精神健康。从这个意义说，健康人格的培养应该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指向。因为健康人格的高扬，已经意味着精神文明将人的表层素质培植和深层素质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精神文明在人的素质发展上的具体化、深入化。我们相信，只有当人们广泛地拥有自尊自强的健康人格时，人对自己命运主宰的历史才会真正地开始。

二

新的时代需要人的新素质。如果说，人的智力、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社会教育、培训等手段来实现，那末，思想观念的更新，特别是深层素质——人格的改造却不能以一般社会教育来达到。精神的底层是不易把握的，它受控于个体和环境两个方面。尽管人的素质缺陷是由环境造成的，只有在环境的改变中人的素质才能真正改变。但人的素质不提高，环境又何以改变？这一明显的悖论更增加了人的素质改造的难度。然而，社会环境改造的同时也就是人的素质改造，环境改变着人，人的被改造反过来也促进了环境的改观。

人的深层素质改造，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重构健康人格的过程。这个过程强调个体的自我改进作用，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创造健康人格生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健康人格的生成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及文化条件都是它不可缺少的。社会提倡和奖赏自主、进取的人格，既注意健康人格典型的树立，又提供健康人格生长的良好土壤，实有的国民性格就会朝这一性格方向靠拢。应该看到，一种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它需要多数人的认同与响应，而在它

产生之初却难以马上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可是，一旦理想的人格在良好的社会体制下，受到经常性的鼓励，并使人们真正感受到它的力量，人们就会群起而效法，以逐步成为一种众人乐意施行的普遍人格。如果离开社会对理想人格的倡导，再进步的人格也不会自发形成国民的实有人格。

第二，建树坚强的自信心和积极进取的品格。任何社会都不曾象今日社会这样快节奏、多样化地变动不居，哪一个时代的人也不曾象现代人这样地具有焦虑感、压力感、忧郁感和危机感等不定情绪。这些不定情绪需要人们以良好的自我调节机能将其转化为动力。而能够支配自我调节系统发挥最大功力的因素，只有人的自信力。自信力隐藏着巨大的力量和多种潜能，它是人的心灵防腐剂，使人免遭脆弱、自贱之害，坚定地走向充满希望之路。自信是通过人的进取品格来表现的。进取来自于人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新生活的执着追求，来自于人对自己生存意义的积极实现。人只有在思变——探索——进取中，才能克服惰性，闯过难关，最终到达目的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强烈的自信力和进取品格看作是健康人格的核心。

第三，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人的进取品格实现有赖于坚定的意志和毅力。人的一切有价值的活动都是创造性的活动，它既是一种开拓创新的活动，又是一种复杂艰辛的劳动。一般来说，在人的奋斗和创新活动中，失败是经常的，成功只是属于少数。这就需要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把失败引向成功。在现实中，国人求胜心切，简单地把改革理解为短期就能取胜之事，当改革出现各种逆境和挫折，人们怨声载道，牢骚满腹，甚至丧失信心。究其根源，无一不与思维方法的简单化及意志的薄弱有关。对于勇于进取的人来说，有良好的办事能力，还要具备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才会走向成功。应该说，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健康人格的重要标志。

第四，弘扬独立自主的思想品格。人的主动性集中反映在他的创新精神上。人在创新中发展，社会在创新中前进。没有创新活动，人就失去其为本人的本性。人的创新活动，有赖于他的独立思考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与人的创新能力是成正比的。然而，长期受封闭、保守观念的熏陶，有些人思想上的随从性、同调性、依赖性是非常

明显的。用他人头脑思维，盲目服从“长官意志”已成为这些人的行为定势。要形成人们独立思维的能力，不仅需要长时间的思维训练，更需要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自我发展的强烈愿望。就思维而言，他如同人的成长一样要有一个成熟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人的被动思维向主动思维转变，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转变，从众思维向自主思维转变。人们只有真正学会独立自主的思维，才有立足社会的基本思维素质，才会在变化万千的社会竞争中，表现各种心理承受力和出色的应变能力。所以，独立自主的思维品格是健康人格的内在素质。

第五，激励健康的个性发展。人的精神状态通过其个性展现出来，人总是以各种方式表露自己的个性。人们从事的每一活动都有其鲜明的个性标记。但是，人的个性发展是多方面的，有的个性使人最大程度地发展智力与才能，从而为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有的个性使人产生自卑感而毫无作为；有的个性易于引起人的情绪波动，从而影响健康并损伤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的个性使

人成长虚荣心与妒忌以致引导一个人走向歧途。在个性发展方向上，我们要注意倡导健康的个性。健康的个性，是人的体力与智力、知识与道德、性格与才能、理解与直觉、美的体验与美的表现的高度和谐统一。这种人的内部和谐，必然引致人在外部活动中，表现出巨大的创造精神与创造能力。健康的个性获得主要途径是自我修养。只有加强自我修养，人的个性才会显露积极进取的品格，避免不良品格的出现和扩展。因此，人的个性健康程度对健康人格构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实一再证明，精神文明建设应该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人的解放这一根本任务。人的解放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的自我解放，它必然是伴随个人素质的不断改造、不断提高而得以实现。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社科部

责任编辑：范英



《鹿菴集》作者王磐辨正

丰家骅

《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内，〈鹿菴集〉的作者写作“（明）王磐撰”；而至第二册〈子目〉内，〈鹿菴集〉的作者，却又写成“（元）王磐撰”。同一个王磐，一为明代人，一为元代人。那么，〈鹿菴集〉究竟是哪一位王磐所撰呢？

〈鹿菴集〉收入《元诗选》二集乙集。《元诗选》的编辑体例，每集收一百家，每家之下各存原集之名，前列作者小传。故在《元诗选·鹿菴集》前，收有作者“王内翰磐”的小传一篇。据小传云，王磐，字文炳，号鹿菴，广平永年人，生于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至大四年经义进士，中统初擢益都等路宣慰副使，不久以疾免，因乐青州风土，乃买田潞河之上，题其居曰“鹿菴”，有终焉之志。至元元年复召入翰林，兼太常少卿进拜承旨，至元三十年（1293）卒，年九十二岁。《元史》、《元名臣事略》、《道园学古录》等书中均有传。〈鹿菴集〉系这位元代的王磐所撰，当是确凿无疑的。

明代的王磐，字鸿渐，高邮人。因性好楼居，筑楼于城西，谈咏其间，又自号西楼。这位王磐是明代著名的散曲家，与金陵陈大声并为南曲之冠。他的〔朝天子〕《咏喇叭》，不仅在当世蜚声曲坛，为人称许，而且至今仍脍炙人口，传诵不衰，有《王西楼乐府》传世。编者因未检原书，散曲家的王磐又比较有名，遂至张冠李戴，把《鹿菴集》的著作权归于他的名下了。

试论我国所有制结构的优化

严闻广

近年，一种甚为流行的观点是：只要优化了产业结构，就能治愈通货膨胀。笔者认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固然重要，但它必须与所有制结构的优化相结合，才能卓有成效，达到治理通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目的。

优化所有制结构，就是根据我国现实的国情国力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有效性调整，使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趋于更为合理。

一、对我国目前的所有制结构不尽合理和缺乏有效性的分析

十年改革，我国经济在所有制上突破了传统的“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公有制模式，初步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当前整个社会的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还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中，全民所有制经济范围过广，比重过大，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现有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1.01亿人。这个数现正以每年300万左右的速度递

增。^①在我国还不很发达情况下，国家要包办这1亿多人口，实为一种严重的经济负担。

其次，私有经济（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在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中比重微弱，而私有经济构成中私营工业又远远小于私营商业。从横向比较来看，在全国工业产值构成中，1989年私有经济在整个全国工业产值中仅占3.6%，还不到5%。就从业人员构成来看，目前全国私营工业企业（不包括个体户）数为25万户，雇工人数只有400万人，这仅占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人数4229万人的8.2%，不到10%。如果国家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裁减1000万人，而将这1000万人纳入私营雇工队伍中去，形成9100万全民所有制职工同1400万私营雇工之比，这也许能为国家减轻一些经济负担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第二，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在产业分布和产业结构中也不尽合理。

应当指出，由于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和长期的“一大二公三纯”的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的全民所有制（实为国家所有制）经济包罗万象，从造导弹的军工企业到煮茶叶蛋的饮食企业，从执手术刀的医院到操剃头刀的理发馆，总之有多少

行业就有多少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足迹。有的产业部门则完全由全民所有制所垄断。目前除了轻工业、建筑工业这两个产业部门可以说集体所有制经济占“半壁江山”以外，在其他产业部门，如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制盐业以及在铁路、航空、海运、邮电等部门，大多数都是由全民所有制所垄断。近几年上述产业或部门中虽然也兴办了一大批“厂办集体企业”，但绝大多数属于安置职工家属就业的经商型、半经商型的第三产业的劳务企业。由于这些领域完全由国营企业所垄断，因而缺乏竞争机制，经济效益难以提高。

第三，在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所有制结构上也不尽合理。

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所有制形式主要是国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目前我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占64%，而集体工业产值只占32%，全国工业职工队伍构成比重亦大体如此。这种比重和相互关系是不合理的。在生产水平还不高的国情下，国有制经济的过分庞大、雍肿势必是国有制工业经济的高效动员社会资源和低效使用社会资源并存、高投入与低产出并存、高速度与低效率并存。据统计，近十年来，国有制工业年度平均亏损在70亿元左右，十年累计亏损总额达800亿元，仅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达116亿元。1989年，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占19%。其次，国有企业冗员达33%，闲置资金达2000亿元，这些每年都要靠国家财政拿出200亿元以上去补贴，这无疑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另据198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效益

数据：1元固定资产原值创造利润，在国有企业只有0.96元，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能获得2.03元。^②诚然，目前城镇集体企业虽有30%的亏损面，但集体所有制经济它毕竟是国家不负担风险的一种所有制经济，经济负担不重。因此，缩小国有制经济的比重，扩大真正能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是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重要内容，势在必行。

二、实施优化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原则

应当指出，优化所有制结构，并不是私有化论者所主张的“公有制向私有制靠拢”，也不是说要改变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是要通过对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使公有制的优越性得到更好的体现与发挥，从而进一步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优化所有制结构是繁荣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当然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客观要求和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前提下，笔者以为，优化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应贯彻下列原则：

第一，要贯彻适合国情国力的原则。

优化所有制结构，其合理性的一个主要依据是国情和国力的需要与可能。因为作为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结构，必须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性质。这就要遵循国情国力的需要和可能的原则。我国国情国力是：其一，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在总体上还是落后的，生产力性质在幅员辽阔的各个地区又极不平衡，有的地区工业发展已接近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的地区至今仍然是马拉犁或手工操

作的落后状态,不仅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在产业间、行业间也是不平衡。总之生产力水平呈现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的所有制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性质。其二,我国底子薄、财力不足,由此国家投资有限,所以国有制不宜搞得过大、过广。社会上大量的事业都应靠人民群众自己集资兴办,所以集体所有制搞得更多些、大些,这是国情国力的客观要求。其三,我们国家人口众多,11亿人口,5亿多劳力,其中有1亿人口靠国家包办(当然这1亿人口也创造着社会生产力),况且我国每年有800万人需要就业,国有制已经搞得臃肿不堪而无法容纳,要减轻社会就业压力,就需要发展集体所有制和私营经济,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四,我国资源是丰富的,但就全国人口平均拥有量而言又是严重不足的,在可供配置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需要国家从计划角度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紧缺资源实行总量平衡。因此,从事资源尤其是紧缺资源、能源开采的主导产业部门,实施国有化这是必须的。国有制不能取消,但亦不宜搞得过大。我国国情国力决定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以国有制经济为主导,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私有经济为补充,这有利于资源、资金、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第二,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有机发展的原则。

优化所有制结构,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问题。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在优化所有制结构中,国家既要以市场

竞争来确定各种经济成分的“临界点”(比重);又要以计划、行政干预(垄断措施)来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我们说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指公有制经济在范围内、数量上、功能上、作用上都应占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任何产业部门(行业除外)都不能由非公有的私有经济来占主体和占垄断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私营经济只能是一种补充型经济,而不能成为某一产业或部门的主导型经济,这应是我们优化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的政治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使各种经济成分得以有机会发展。当然,公有制为主体,并不就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当然也不是非把国有制搞得非常庞大才能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事实上,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应体现国有制占30%;集体所有制占60%;私有经济占10%。这个比重关系的特点是相对缩小国有制的范围和比重,相应扩大集体所有制的范围和比重,在公有制内部的两种所有制之间的你消我长,这并不削弱公有制在整个社会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这就是笔者多年来所主张的:“小国有、多集体、少私有”这样一种橄榄型的所有制结构,③这种轻型的所有制结构更适合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

第三,要坚持战略性产业的国家垄断与非战略性产业的非国有化相结合原则。

众所周知,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与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在商品经济中,任何经济形式的组织都要强调效益性,这对国有企业也同样。但是我们搞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不能要求国有制经济去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也不能以此来衡量国有经济成功与失败。笔者认为每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有它各自的特殊功能。国有制主要体现在非竞争性主导产业，或者说战略性产业部门中，以发挥其对国民资产合理配置的调控作用；其次是体现在其它经济成分没有能力或者不愿经营的领域，如社会公共福利的保障事业和出于社会政治、伦理需要而亏损的部门，都需要国家出钱来兴办。至于其他非战略性的竞争性产业和部门则应主要由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甚至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来经营管理。从我国集体经济的发展实践来看，集体所有制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它能适应社会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然而国有制却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它的适应性比较差。在轻工系统同样是服装、皮革、制鞋、日用五金、工艺美术、家具等手工或半机械化行业，大凡是搞国有制的，经济效率或效益普遍低于集体所有制企业。这说明缩小国有制在消费品工业产业中的比重，对提高社会效益、增强市场有效供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优化所有制结构，要坚持体现劳动者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④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某种所有制，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这种所有制更能适应或体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公有制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开创了条件，但是应该看到，现阶段的公有制采取国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是完

美无缺的，事实上它存在着一些体制上的矛盾和弊端，如存在着官僚主义、微观管理缺乏民主性等。况且我国目前的国有经济比重远远超出了生产力所能承受、或者说所能适应的程度，这就更需要对它进行缩减性的优化。当然，目前的私有经济有它存在和发展的一定余地，但私营经济毕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它的数量超出一定程度会对社会主义产生有害的影响，因而优化所有制结构应在两条战线拉开：一方面要防止私营经济的制度性弊病的滋长和蔓延；另一方面也要消除传统国有制比重过大，范围过广所带来的体制性弊端。对此，笔者认为集体所有制比国有制和私有经济都更具适应性。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职工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决分配、民主管理等体现了一种劳动自治原则，因而更能体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原则。优化所有制结构，激发劳动者的工作（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不贯彻上述原则。

最后，优化所有制结构，还要在具体操作上贯彻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

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建国40年来算是较频繁的。在“求大、求公、求纯”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大搞“升级过渡”，其办法是行政命令，一个上级电话、一个公章、一个会议、一个晚上就能解决社队（农村）“两级过渡”的所有制变更，就能使集体企业转为“全民企业”。这种长官意志的命令方法，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在今天，我们要拼弃这种行政命令方法，在优化所有制结构的进程中贯彻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和自愿自主原则。当前开

展的企业兼并和企业买卖，产权有偿转让，是优化所有制结构的调节器，应该引起各界的重视。

三、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途径和方法

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途径和方法，基本上可分为三种，即宏观优化法、中观优化法和产业行业优化法。

——宏观优化法。这是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整体，从这个全局出发，根据国力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来制定各种经济成分的适应范围、比重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准则和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呈现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新格局，基于此，优化所有制结构的主要任务在于合理地量化它们之间的比重关系，即各种经济成分在企业数、人员数、产值数、利润数以及纳税额、投资额等方面的比重关系的增减。依笔者之见，当前应将国有制的绝对优势量化为相对优势，集体所有制的劣势量化为绝对优势。这是我们今后所有制政策的基本方向 and 任务，以求在我国建立“小国有、多集体、少私有”的轻型所有制结构。以利于我国经济的振兴和起飞。

——中观优化法。这是相对于国家这个宏观和企业这种微观而言，这里的中观指县市范围内的中观层次，由此出发来优化县市的所有制结构。对县市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不应搞“一刀切”，而是要从本地区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来调整和优化。有的县市可以搞以“国有制经济为主导，集体经济为基础，私有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也有的县市可以推行“集体所有制为主导，国有制为辅佐，私营经济为补充”的所

所有制结构。但笔者不主张以私有经济为主体构造县市经济结构，当然，在国家的政治特区，即“一国两制”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地区则是例外，因为那里不存在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问题。总之，县市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应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导和为主体较为适合我国普遍的县市经济。因为集体所有制在产权上更能体现人格化、独立化、民主化、价值化和市场化等特点，更符合县市这个中观层次经济发展的需要条件。况且，国家投资地方县市经济是很有限的，而集体所有制经济应该而且完全能够成为县市经济的重要基础和砥柱。

——产业行业优化法，也称之为部门经济优化法，也就是使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同产业政策、行业政策相结合，从而优化整个产业或行业的所有制结构。例如，我国目前轻工业、建筑业的集体所有制占“半壁江山”，但进一步优化，依我之见，可以推行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导，国有制为辅佐，私营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这样更有利这些产业的发展。再例如，我国的第三产业中的一些服务性行业，如理发馆、洗澡堂、小百货店、饮食店等，我认为没有必要搞成国营单位，甚至完全可以实行全行业以私营经济为主体，集体经济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在个别行业实行私营经济为主导，这并不影响公有制在该产业部门中的主体地位。当然，涉及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产业应以国有制为主导、甚至占垄断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之，所有制结构的优化是国家政府的一个重要国策，国家要制定优化所有制结构的有关政策和法规，以促进我国所有

制结构朝着多元化、合理化、民主化和完善化方向发展。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更能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更能体现和符合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 ① 见《人民日报》1990年2月3日第1版
- ② 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87年版第72页
- ③ 拙文《论集体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学周报》1988年1月31日
- ④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集体工业》杂志社
责任编辑：郑英隆

· 经济 ·

特殊所有制·所有制形式· 公有制优越性

郑福明

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关于特殊所有制与所有制形式的关系及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发挥问题，似乎还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为此，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的研究。

特殊所有制指的是诸如小生产者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具有特定社会性质的所有制。马克思常常把它当作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总和看待。他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①这段话早为我国理论界所熟悉并广为引用。但，对于构成特殊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哪一层次的生产关系却未有深入的研究。

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社会经济的本质和现象之间，生产关系包括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

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②事物的性质决定于事物本身的特殊性，因而，作为特殊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第二级派生的和第三级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而只能是第一级原生的亦即本质层次的生产关系。这一本质层次的生产关系包含有这么两个方面的规定：一、它必须是由不同层次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产生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结构的根基；二、它必须是社会形态性质的决定者。在马克思看来，包含这两个规定的本质层次的生产关系就是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他指出，“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

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③

马克思曾把小生产者私有制高度概括为“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④由此可以看出，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的内容，应包括有：1. 生产条件归属关系，亦即生产条件的分配关系；2. 生产条件的占有关系，亦即现实生产过程中生产条件的支配和使用关系；3. 是劳动的占有关系，亦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由于生产条件的占有关系以生产条件归属关系为形成的前提，劳动的占有关系既决定于生产条件分配关系，又是生产条件归属关系的实现，这三种关系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由于历史的继承性，使具有历史相继性的两种特殊所有制之间，或一个特殊所有制否定之否定循环的各环节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或重复的因素，所以，各种特殊所有制不能在某一偏面关系上相互区别，而只能在它所包括的各种关系的体系结构上亦即总和上加以把握和区分。不同的特殊所有制首先依其总和所形成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区分为公有制与私有制两大类：一种特殊所有制所形成的利益如果与社会利益根本一致，那么，它就是公有制；相反，则为私有制。其次，同样是公有制或私有制的不同特殊所有制则必须依其所包含的各种关系的体系结构来加以判断。

与特殊所有制不同，所有制形式是指处于生产过程中生产条件结合的组织形式，它包括有生产条件的归属形式、生产条件的占有形式和劳动的占有形式。由于这些生产条件结合的组织形式，同时也就是劳动过程的组织形式，所以，“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⑤诸如古代公社所有制、家庭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等。与特殊所有制生成的生产力基础不同，所有制形式是以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即分工决定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⑥而特殊所有制则是由劳动资料性质主要是生产工具决定，在社会生产中若手工工具占统治地位，决定封建私有制占统治地位；若机器生产占统治地位，就决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虽然分工具具有决定于劳动资料的一面，但它还有受自然条件、环境和民族习惯、传统影响的一面，因此，所有制

形式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但是，一定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总是体现于和必须依存于一定的生产条件结合的组织形式之中，上升到哲学范畴上来认识，特殊所有制与所有制形式之间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者之间包含有内容与形式之间相互联系的一般规定。

二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生产资料由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国家集中统一支配来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这实际上是以形式论证内容，使人觉得不着要领。固然，国家所有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依存和体现形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所有制传统模式，正是我国传统经济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只有在她所包括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的特殊体系结构上，才能得到科学论证。

马克思指出，“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⑦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抛弃小生产者私有制中“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的消极因素的同时，继承了这种生产条件集直接生产者于一身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⑧建立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条件占有关系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条件占有关系的简单重复，它是有抛弃的发扬。它抛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中最根本的消极因素——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所有者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利益上不仅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社会利益整体性根本对立，而且与直接生产者利益根本对立。

马克思正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更高形式上重新肯定生产条件集直接生产者于一身这一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的小生产者私有制的积极成果，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抛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切消极因素而发扬其直接生产者公共占有生产条件这一积极因素，来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比以前的各种特殊所有制都更先进、更具有优越性。

当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这些优越性，只有

在社会生产中具有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时，才能存在。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我国已经具有帝国主义用于掠夺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劳动资料，虽然数量不多，但集中布局使之处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尽管历史的局限性和复杂性，使我们现在还无法概括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赖以存在的劳动资料性质，尽管在当时掠夺我国的那些国家里至今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但经济危机作为特殊所有制与生产力发展尖锐冲突的外在表现，从新中国产生时，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就已经存在，并愈演愈烈地持续一百多年。从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中，我们起码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适应我国社会生产中居主导地位的劳动资料发展的要求。可见，我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不仅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发挥其优越性的物质基础。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优越性。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多层次性所决定的多种特殊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只有以一种既能允许不同特殊所有制并存，又能凝聚它们力量的特殊所有制为主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各种特殊所有制历史作用的发挥，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小生产私有制不具有这种特性；假设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我国所有制主体，那它也不具有这种能力。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是靠排斥和吞没小生产者私有制而产生，又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根本对立的一种特殊所有制。显然，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具有这种功能。它集中并发挥前两种特殊所有制积极成果的内在联系，使它允许二者与之并存；它抛弃了前两者的消极因素，又使它具有支配两者并凝聚两者的积极因素的力量。可见，在我国现阶段，只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才有可能实现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尽可能大的发展。

三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理论界中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倾向，即把我国经济体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传统模式的弊端归结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弊端，从而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归结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头上。这种错误的归结必须运用马克思论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的方法，才能得以

较好的澄清。

首先，经济理论上常见有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借助于简单商品经济的两极分化而产生、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借助于商品经济成为典型形式而得以巩固和发展、并以我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忽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弊端等为理由，推论资本主义私有制比社会主义公有制更适应于商品经济发展。这种观点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是它不仅利用了当前理论界在特殊所有制与所有制形式关系问题上一定程度的混淆，而且利用了商品经济曾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过的历史事实。

其实，商品经济并不具有选择特殊所有制的功能，马克思指出，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过程，可以为“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⑩商品经济也并不以特定的特殊所有制为存在和发展基础，因为它的存在和发展的直接条件是所有制形式所形成的特殊社会利益构成，只要社会各劳动组合具有利益的界限，而不管这种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否一致，商品经济就可以存在。无需讳言，在我国以往的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发展步履乏力，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错。其原因在于我国传统的国家所有制模式是为适应产品经济存在而建立的，这一模式所形成的全社会利益高度集中统一，使商品经济缺乏最基本的存在和发展条件。同时，也正因为此，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改革我国现存的所有制形式不仅仅是为适应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

其次，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还常以我国传统经济体制中形成的劳动力地区所有制和部门所有制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为依据，得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扼杀人的自由个性的结论；而从资本主义的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中，又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比社会主义公有制更适合于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这种是非颠倒的理论，同样也只有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理论，才有能力重新颠倒过来。

马克思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曾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⑪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具有使人们自由个性充分发展的条件，相反，在这方面，它甚至比小生产者私有制更落后。固然，在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中，人们在自由选择职业和劳动力在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之间合理流动等方面还不尽人意，但这不仅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必然联系，相反，是因为传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所有制模式不能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展要求的结果。只要我国坚持对传统经济体制模式的改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保证社会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优越性，必将益发显示出来。

再次，对于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低效率”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理论也可得到最有力的驳斥。

经济效率从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即社会现存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合理配置的程度；二是单位资源利用的效率，即在单位时间内投入一定的劳动和其他资源所取得的成果大小。前者实际上是社会劳动量的分配问题，尽管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量的自然规律也能实现，但“这个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的从属和加入社会机构，却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冲动去摆布”，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劳动量按比例实现是以社会劳动量大

量浪费为条件的，而这并无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可言。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形成的劳动组合利益与社会利益根本一致，可以实现社会劳动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因而就其本质上说是高效率的。应当承认，我国以往的社会经济中，无论宏观效率，还是微观效率并不很高，但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依存形式上的原因，而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的必然结果，当务之急，不应是以现实存在的问题去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探索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以使社会主义公有制高效率得以实现。

①③④⑦⑧⑨⑩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2页、第25卷第891—892页、第23卷第830—831页、第23卷第830页、第23卷第832页、第23卷第193页、第23卷第649页。

②⑤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第1卷第68页、第1卷第26页。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政经教研室
责任编辑：郑英隆

書海酌蠶

为《长江集》补校一字

周凤章

李嘉言《长江集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卷一《送沈秀才下第东归》一诗，仅为校“疾”、“子不”三字。据《文苑英华》二册卷二七八第1411页原诗，尚有“室”作“堂”、“掉”作“棹”之异文，为李氏所未校出。

我以为“室”作“堂”无关紧要，不校亦可，但“掉”作“棹”对理解全诗关系甚大，决不可漏校。诗题中之沈秀才即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今属浙江）人。据李嘉言《贾岛年谱》（见《长江集新校》附录一）：元和七年壬辰（812），“秋，（岛）自范阳赴长安……既至长安，适沈亚之下第东归，有诗送之。”诗即《送沈秀才下第东归》。诗之“东归”以下四句，悬想亚之由长安返吴兴路途之遥远、舟马之劳顿，以示对亚之关切之意，而以“棹替时参差”总冒下二句。“浙云”二句具体写回南路线及可能遇到的颠簸：经汴入楚，再由楚入吴以至于浙，一路上既有旱路，又有水程，须得时而操舟，时而驾车，交替且复频频，故云“棹替时参差”。如作“掉”，则于义不通矣。

据笔者核对，《四部丛刊》之明刊本《唐文粹》及明翻宋本《贾闾仙集》、《畿辅丛书初编·贾闾仙集》（第二四四—二四九册）、涵芬楼影印本《唐人八家诗》，合《全唐诗》共五本，均作“棹”。故为之补校如上。

“书海酌蠶”责任编辑 刘斯翰

略论广东机械工业发展速度与效益的关系

陈应求

尽管人们对近几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时常提出异议，而国家宏观控制政策对经济运行的传导和调节过程，并未使政策目标和控制手段的相机抉择与搭配使用显示出应有的协同效应。国家在调节总量均衡和抑制通胀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时显得既缺乏实现目标稳定连续的长期有效性，又在实施过程中热衷于追求短期时效，易于搞一刀切，而政策目标的含糊不清和数量扩张型的惯性作用，使得本就紧运行的经济更趋紧运行，从而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原材料和能源短缺等诸多难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对此，人们一再强调：抑制过热增长的宏观政策应是财政和金融的全面紧缩，以此来对付产业结构和社会需求不相适应而引致的一系列矛盾。否则，势必会影响日后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全面高涨。如何才能处理好效益与速度的关系呢？笔者根据多年在机械行业的实践和体会，拟作一些探讨，从而寻求带有规律性的对策。

从1980年到1989年，广东机械工业是持续、高速发展的。1980年总产值只有9.8亿元，在全国机械行业排第16位。到1989年达到60亿元，排在全国的第六位。年平

均增长率约20%，是全国的第二位。1989年上半年比1988年同期增长31%，但下半年开始急剧下降，出现了负增长。1989年全年只增长14.6%，比1988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但总的来讲还是高速度，1989年的增速仍排在全国的第三位。

之所以能有这样高的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财政包干和企业及地方扩权，促进了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这是实行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结果。以“七五”计划期间技术改造为例，5年间，全省机械工业投入的资金达9个亿，其中纳入国家、机电部和省技改计划的2.14亿元，地方自筹的就有7个亿，是国家拨款的3倍强，这是其他省所不能比拟的。10年来技改投资额共完成15.2亿元，“六五”计划期间，技术改造项目达306项，涉及的企业250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46%。技术改造的效益也十分明显。据统计，投入产出之比为1:2.4，共增加产值达36亿元。可见，财政包干和扩权对广东机械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加速了发展。10年来，全行业利用外资49项，约1.2亿美元；引进技术65项，达1.12亿美

元，总投资5.6亿元。这些引进促进了60多家企业的改造和产品更新，使24.7%的产品从60年代的水平提高到80年代的水平，大大改变了工业基础技术落后的状况，加速该行业发展。

第三，卖方市场的出现，也刺激了机械工业的发展。按照分析，固定资产投资每万元有2000元至2500元是用于购买机械电器产品的，有30%转化为消费基金，而消费基金又有一部分转化为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由于前几年国内基建规模失控，就直接促进了机械工业的发展。据匡算，广东由此而得到20—30%的增速。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分析今后的发展速度就有可能出现偏差。

这样高的发展速度能不能维持？从绝对值看，“六五”期间我们平均速度是21.89%。以1980年为基数，“六五”每年增长绝对值是1.8亿左右。“七五”前4年，我们平均增长20%。以1985年的产值为基数，平均每年增长6.25亿元。按照这个绝对值算，1989年我们总产值基数为61亿元。假定“八五”平均增速20%，那么，增长绝对值年平均要12.9亿元。如果按这个速度发展，1994年的产值应该是124亿元，相当于“六五”增长值的7倍。可见，要保持这样高的速度是非常困难的。

二

怎样的发展速度才是适度的？企业在满足社会需要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同时取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经济效益，这样的生产速度就是合适的速度。1989年，原定全省计划增长指标是10%，最后超过近5个百分点。虽基本实现适当的速度，但效益

不够理想，如利税率下降，可比成本、亏损户、亏损额增多。据统计，1953年到1980年我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总值增长了20倍，流动资金增长了18倍，而总产值却只增长7.2倍，国民收入只增加4.2倍，而人民实际消费在增加20倍固定资产的前提下，只增长了1倍。我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占用的固定资产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出4倍，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净产出只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多50%，还不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一半。这就是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

过去我们一直习惯于沿用描述经济发展的价值指标及速度粗略地衡量企业、地区及全国的经济效益状况，甚至还流行“经济发展越快，经济效益越好”的论点，这是不科学的。经济效益是经济活动效果的综合反映。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不是等量的关系，二者的发展，可以互相排斥，也可以互相促进，其关键在于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应建立在最佳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过去，我们恰恰是二者互相脱节，甚至出现互相排斥。因为我们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扩大基建规模实现的，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改进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表面上看，企业大大增加了，生产规模扩大了，但这种高投入造成的投资膨胀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基建规模发展到与国力不相适应的时候，就不得不实行紧缩，放慢发展速度，全面持续的宏观紧缩，就短期而言，会使产品大量积压、企业开工率降低、亏损面扩大、利润率下降、财政收入相对减少，经济增长减慢。诚然，这是人们不愿接受的现实，孰不知，这正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盲目的经济高速增长而引起的必然

结果，其苦果不得不在紧缩情况下来品尝，个中滋味不会令人愉快。因此，机械工业必须根据合理的速度应建立在最佳经济效益基础上的原则，考虑整个发展战略。“八五”期间，国家整个工业发展速度计划安排6.5%，机械工业适当提高一些，大约7.7%到8.4%，这是适合广东的实际情况的。没有效益的速度是无效的速度，而没有速度也谈不上最佳经济效益。发展速度问题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不能走两个极端。

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研究课题。经济效益的优劣，不仅关系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然而，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不讲经济效益，高浪费、低效率，仍然是我们经济工作的严重弊端。以广东机械制造业为例，1987年每元固定资产所提供的国民收入才0.76元，为苏联的50%，与先进国家比差距更远，而广东在全国还是“先进”的。再从资金利用率看，每百元资金（包括固定资产与流动资金）提供的税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31.9元，1987年下降到15元，只相当于“一五”时期的1/2。经济效益低下，还表现为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不同步。1986年和1987年的情况是可以说明问题的。1987年工业总产值由1986年的29.09亿元增长到38.29亿元，增幅为31.63%，年平均增长14.7%；实现利税由4.9亿元增长到5.24亿元，年增长6.7%，平均3.29%。每百元平均年产利税率由16.8下降到14.49，降幅14.2%，年平均下降率6.86%。可以看出，产值增长较

快，利税增长缓慢，只是生产速度的1/4。更为严重的是，百元产值税率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急剧下降，只达1982年全年平均值的58%。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国家客观上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资料价格对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机械工业以初中级技术为主的低附加值产品结构，以及以小而全、重复分散为特征的生产体系结构，已经越来越难以承受原材料提价和工资增长的压力。要扭转经济效益低下的被动局面，单纯依靠发展速度，依靠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是不行的。要研究少投入，多产出的有效方法，力求用最少的劳动消耗、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具体地说，我们的目标是力争企业利税增长的速度快于产值的增长速度。这就必须确保能源和原材料利用效果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耗的增长速度，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工资总额的增长速度。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是紧缩的大环境：

第一，在紧缩的环境下，政府和企业都面临着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选择问题，在产业结构变动和需求结构变动的双重协调中，通过以资本存量调整为特征的产业结构改造，使供给在新的技术水平、新的结构上扩张，使其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结构，并使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从根本上扭转低效益增长的格局，使得以后的经济增长获得新的推动力。

第二，由于资源对经济的制约将会随着供给的增长而有所缓和，某些产品过剩可能会增加，从而市场对生产扩张的制约会日益明显，新兴工业和企业迅速发展，

将会逐步代替原有工业企业产品输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第三，随着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和竞争机制的逐步建立，生产要素重组和淘汰将会成为可能，一些技术落后、产品质量差、产品无销路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被兼并、重组和淘汰。

上述说明，紧缩既对企业是个压力，也是企业迈向高效益运作的机会。因此，从机械行业看，当前应着重抓好如下各个方面：

第一，从实际出发，继续搞好规划调整工作，优化产品结构。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要按照市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审时度势，立足基础，选准目标，走新的路子。要贯彻以科技为先导，以质量为主线的方针，另辟蹊径，开发一代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效益好的产品出来。这就必须变粗犷型的经营为精细型的经营，不断提高集约化经营的比重，在优化产品结构和行业结构的时候，要避免搞得太杂太多。

第二，优化技术结构，推动技术进步，不失时机地抓紧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保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会产生一批批高新产品，如机电一体化产品。这些产品的出现对经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优化技术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对实现广东机械工业由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型扩大再生产转化，发挥现有企业潜力，减少投入，增加产出，具有特殊作用。（一）是可以通过提高工艺的装备水平，改善工艺装备的构成，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改善

以产品改工艺，以工艺促产品的技术设施，就能保证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年平均15%左右，如果能保持这个速度，到2000年广东机械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将会达到或接近先进国家的水平。（二）是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可以提高固定资产的利用率。现有设备，我们最高的利用率只有50—60%，平均只有30—40%。另外，设备老化严重，这就需要应用新技术，更新一部分，改造一部分，包括改革落后的维修体制，技术后方专业化等问题。把设备利用率提高1倍，就等于不增加投资，产量就可翻一番。（三）是可以降低消耗，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加速开发高效、低耗、高技术产品。改进工艺装置，应用先进工艺技术和新材料，是减少跑、冒、滴、漏现象，降低消耗的有效手段。我省机械行业近几年物耗指标有所下降，但按专业进行对比，还有一半产品物耗高于全国先进企业或是先进行业的水平。所以，潜力很大。降低物耗已经成为机械工业提高效益的当务之急。（四）是采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带动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提高，废品率下降，等于用较少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当前，工艺落后，技术陈旧，特别是试验装置，测试手段，计量条件落后，影响产品质量的提高，是普遍的问题。针对存在问题，一方面要推广工艺突破口工作，加紧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在产品开发中，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另一方面，提高装备的精度水平，尽量实现测试和计量手段的先进性；再就是要加强质量管理工作，强化质量意识，打好基础。检测工作关系产品的质量档次和企业的声誉，是质

量的外在表现。

第三，广泛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活动。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是缓解经济效益同生产速度不同步的重要手段。我主要强调的是，在双增双节中要注意资金的使用效果。这几年资金利税率逐年下降，它综合反映了固定资产、流动资金、

产品结构、生产周期以及流通环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隐患。我们要采取强有力的经营管理手段予以消除，使资金利税率不断提高。

作者单位：广东省机械工业厅

责任编辑：谭湛明

· 经济 ·

论优化产品结构在微观 经济整治中的意义

——湛江机械行业的实践与思考

魏剑辉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暴露了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矛盾。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消费基金膨胀，突出显示在财政支出膨胀和信贷膨胀上，这又是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的直接原因。目前存在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矛盾，市场紧俏商品的短缺和劣质滞销产品积压同时并存的现象，正是国家宏观调控严重失衡造成的。由此说明，在治理整顿中，之所以发生市场疲软，除国家压缩总需求外，还有就是产品脱离市场的需要，而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需求有一个基本的稳定态势，具体到某个企业，能否适应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如何以市场为导向，优化产品结构，搞活经营，保证整个工业经济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前进。近两年来，湛江

机械工业之所以能在整个机械工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未出现大的滑坡，并逐步走出低谷，主要就是坚决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狠抓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工作，使我市机械工业生产保持着产值、销售、税利三同步，持续稳定协调增长的良好势头。1989年全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635万元，占年计划的112.5%，比1988年增长31.7%，其中直属8个厂完成工业总产值4543万元，占年计划的105%，比1988年增长30%，实现利润351万元，完成年计划的107%，比1988年增长25%，其中，直属企业实现利润258万元，完成年计划的110%，比1988年增长30%。机电产品出口额879万元（折338万美元），完成年计划169%，比1988年增长122%。

湛江机械工业原来的基础较差，其中突出的矛盾是：“三低一少”。即：产品层次低、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低、方向性产品少。产品多年一贯制，企业缺乏生机和活力，不少厂处于找米下锅的被动局面，生产不稳定。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我们在狠抓领导班子更新观念、转变思想作风、积极主动为企业服务，强化管理、深入开展双增双节运动的同时，狠抓了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工作。我们进行调整优化产品结构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需求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出口创汇为突破口，推进技术进步、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发展适销对路产品，提高效益。调整的目标是：一个机电产品的出口基地（高压电器）、三个重点（多速和特种电机、流量仪表、汽车零部件）。围绕这一目标，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市场为导向，发展适销对路产品。

市场的优势，最终是产品的优势，开发新产品，首先要考虑适销对路。从1988年下半年起，我们通过市场调查和预测，掌握市场需求信息，对原有的老产品逐个进行筛选，对技术水平低、竞争能力差、消耗高、效益低、面临滞销的老产品，采取转（产）、压（缩）、改（造）等办法，转产、控制压缩和更新换代的产品有手扶机卡、农用拖卡、铸铁蜗轮流量计、混凝土搅拌机、打砖机等十多种产品。新开发的产品有不锈钢椭圆齿轮流量计、车用归零双速电动刮水器、晶闸管无换向器同步电机、10千伏SF₆柱上断路器、高压熔断器等40多种。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50%以上。湛江电机厂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电机年产量在10万千瓦左右徘徊，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1988年下半年开始边搞技术改造、边抓Y、YD系列电机新产品，结果1989年全年生产了21万千瓦，成为全国中小型电机行业规格较全、品种较多（400多种）、适应能力较强的国家定点企业。该厂在1989年还开发YDFB风机泵用多速电机和国家“八五”规划科技攻关项目的晶闸管无换向器同步电机，经用户试用，反映良好。1989年该厂完成总产值1250万元，销售2113万元，利润首次突破百万元（达到116万元），全面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其“七五”技术改造项目，预计

1990年上半年可完成，电机年产能力达40万千瓦，将成为我市重点企业之一。

我们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重视市场动态，强化管理，专门成立供销班子，加强供销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产品积压，加速资金周转。1989年前10个月全系统仅拿到流动资金100多万元，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各企业发动职工集资、搞活供销，狠抓资金回笼来渡过难关，全年销售产值近500万元，资金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124天降为98天，下降21.1%。一些原来较困难的厂如甘机厂、量具厂也因开发了适销对路的产品，使生产维持不滑坡，并完成承包的各项任务。

二、推行技术进步，发展高水平产品。

优化产品结构，最重要的是确保产品上质量、上水平，以优质价廉赢得市场。为此我们狠抓基础工作，强化各项管理，围绕产品创优，以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努力提高产品的可靠性、提高产品寿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和工艺突破口工作，加强检测试验，使产品的优质品率不断提高。目前60多种产品中，达到省优产品5个、市优6个、部优产品1个，80%以上产品按国际标准生产，大大地提高了产品竞争能力。在上水平方面，我们的出发点是：推行技术进步，努力发展具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水平的机电产品，技术起点要高、竞争能力要强，产品后劲要好。通过这些产品的批量投产，促进我市机械工业发展。一年多来我们开发和投产具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进水平产品有：铁路电气化配套的接地保护装置和火花间隙、高速离心机配套的晶闸管无换向器同步电机、不锈钢椭圆齿轮流量计、10千伏SF₆断路器和配套电脑装置的机电一体化重合器等。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采用国际标准，并填补了国家和省空白。特别是不锈钢椭圆齿轮流量计、铁路电气化保护装置、镇流器这三个产品，都是小商品、大市场的拳头产品，投产以来，已吸引很多用户。湛江阀门厂开发的仿丰田汽车双速归零刮水器，从立项、批准、设计、施工到试产，仅用半年时间。

在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选用具有先进技术水平检测设备，以保证产品质量和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如刮水器厂与机电部等科研院所合作消化研制了我省第一条汽车用直流微电机自动检测线。电机厂从丹麦引进了具有80年代

初技术水平的声频检测仪与电机噪声试验台配套,增强了电机性能检测水平。由于我们拥有了较先进的检测设备,吸引了外商合资生产汽车用直流微电机的兴趣,1989年11月底,我们已与外商正式签订了合作生产直流微电机的协议书,确定投资1000万元(其中外商投资200万美元),引进外国先进的微电机生产的关键设备和制造技术。计划1992年投产,生产能力达到80万台。现已初步列为熊猫汽车配套定点生产厂之一。预计产值超过1亿元,利润可达3000万元,创汇1000万美元。

三、抓好引进吸收消化,发展替代进口产品。

在实行产品结构调整过程中,我们对引进消化吸收外国高技术先进产品花大力气去抓,已初见成效。在开发的40多种新产品中,40%属这类产品。如铁路电气化保护装置、青饲料快速干燥生产线和制造三片罐的滚筋分切机等,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这些产品批量投产,以产顶进,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特别是铁路电气化接地保护装置和火花间隙,过去全靠进口解决,每台需外汇1万多美元,每年需进口500多台。湛江高压电器厂与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共同研制开发,仅用8个月时间试制成功,并通过了部级鉴定,已批量投产使用,效果很好。火花间隙亦已试产,也通过了型式试验,等待铁道部和机电部两部鉴定。最近,该厂已被列入国家铁路电气化配套设备定点生产厂之一。晶闸管无换向器同步电机属国家空白项目,过去靠日本进口配套。湛江电机厂仅用半年多试制攻关,已配套高速离心机投入安装试产,性能很好。又如湛江仪表厂在引进美国布鲁克斯公司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成功地开发了我国长期靠进口的不锈钢椭圆齿轮流量计。同时,根据用户的需要,吸收消化国外技术,又开发了耐高温流量计和高黏度流量计,既扩大应用范围,又提高了效益。1990年投产后,首批计划生产9100系列不锈钢椭圆齿轮流量计200台,产值可达500万多元,投产后能力达千台以上。可为国家节约大量外汇。

四、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创汇产品。

我们在优化产品结构中,面向国际市场,积极发展出口创汇产品。湛江高压电器总厂,为满

足国际市场的需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扩建了两条生产线,使镇流器的月产量从2万只提高到8万只,年底达到月产11万只,全年总产从1988年的36万只增到67万只,增长84%,1989年5月份,镇流器获得美国“UL”的认可,产品全部出口美国,产品质量符合要求。最近外商来厂洽谈,对产品十分满意,表示长期合作,并确定1990年订货150万只,仅此一项产值就达2600万元,创汇320万美元。他们在大抓镇流器出口的同时,又积极开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熔断器、SF₆断路器和重合器等创汇产品,1989年10月份,已向日本出口样机,拟1990年批量订货。最近国务院规划将该厂列入“八五”期间高压电器出口1000万美元基地。1989年该厂完成产值1744万元,实现利润89万元,出口创汇156万美元,超额完成各项指标。目前全市机电产品出口创汇前景较好。只要抓紧这方面工作,发展“一创三节两保证”的产品一定能踏上新的台阶。

五、加强横向联合,发展名优产品。

搞好机电产品优化调整工作,必须走联合的道路。通过外引内联,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和技术协作。我们在进行横向联合过程中,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产品新、起点高、投入少、销路好、见效快、后劲大、效益高。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在湛江市召开的第三、第四次经济洽谈会,我们洽谈签订的项目都较有成效。如1988年第三次洽谈会上签订的四项生产型项目:110千伏变压器、汽车转向机、高低压开关柜、300mm游标卡尺、刮水器模具,均是利用对方技术和设备,我们不花钱或少花钱便开发了的名优性产品。湛江量具厂借助桂林量具厂的技术和投资近40万元设备,只用48天便试产出高质量的300毫米游标卡尺,全年完成5000把投放市场。湛江甘机厂与郑州电控设备厂联合生产高低压电器开关柜,在郑州厂的全力支持下,仅一个月便试产成功,全年生产100台,深受用户欢迎。1989年市的第四次洽谈会,我们又签订了9个项目,除4个属新产品扩大销售项目外,生产型项目5个中,中外合资合作项目4个,总投资额人民币870万元、美元200万。这些项目目前正加紧落实。

作者单位:湛江机械工业总公司
责任编辑:谭湛明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新解

沈茂骏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变法运动参加者王照的见解，似亦可成立。他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中写道：

“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折显揭之，亦屡向南海劝以此旨。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坚持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为不可造就之物。”^①

王照说慈禧“绝无政见”，戊戌政变“纯为家务之争”，这不合乎事实；但他认为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只是注重权力，康有为没有把“主张变法”这项桂冠送给慈禧，而是在如何对待光绪与慈禧的问题上，“坚决扶此抑彼之策”，导致后来发生政变，则不无道理。走“君权变法”路线的维新派，没有积极去争取控制着朝政的慈禧对变法的支持，反而在光绪与慈禧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的漩涡，这应该说是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这里的问题是，慈禧有可能支持变法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须对慈禧向来的作为和当时对变法的态度作一简要考察。

慈禧自1861年“北京政变”至死，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的统治者。纵观她的一生，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消极作用是无疑问的。但也不能说，她死心塌地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中国永远停留在极端贫弱的地位上。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她统治时期，中国兴起了以“自强”、“富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和进行了几次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战争，以及20世纪初年实行“新政”，1906年清廷许诺“预备立宪”，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只是以有利于她权位的巩固为前提，或是权衡起来比较地有利于她权位的巩固而已。这样看来，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抗拒一切新事物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是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她是不会拒绝“变通”传统统治模式的。所以说，如果她认为维新变法不会损害甚至有利于她权势地位的巩固的话，她是不会反对的。

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对于康有为发动的变法运动，一开始并没有持反对的态度。孔祥吉同志已肯定了慈禧当时对变法持肯定态度，并认为标志百日维新开始的明定国是诏书，是经慈禧同意才得以颁布的。^②实际上，不少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

金梁《四朝佚闻》写道：“帝慑于积威，见太后辄战慄，虽亲政不敢自主。戊戌变法，亦事事请懿旨，太后方园居，厌其烦，遂谕帝但无违祖制，可自酌，帝稍稍得自行其志……”③这段记述结合当时变法实施情况，并与其它有关记载相印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慈禧并不反对变法。

《周馥年谱》写道：“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属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④这也说明慈禧不反对变法。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写道：“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⑤时任京官、与奕劻、荣禄关系密切的陈夔龙是反对变法的，但他竟明确说慈禧“无仇新法之意”，并说她之所以发动政变，乃是“利害切身”所引起的，这应该是可信的。

容闳《西学东渐记》有这样记述：“光绪当亲政后，颇思革新庶政，其一种励精图治之决心，足使京内外人士注意，如北斗之见于天空，人人咸为引领。惟慈禧之眼光，则为嫉妒心所蔽，乃视光绪之举动，大不以为然，甚且目之为痴人或狂夫，谓宜幽之冷宫，加以严酷之约束。……适维新潮流澎湃而来，侵入北京，光绪帝受此奇异势力之激动，遂奋起提倡维新之事业，全世界人见此，莫不惊奇，以为得未曾有。……迨一八九八年秋，遂有政变之事。”⑥容闳没有指责慈禧反对变法，只是说光绪决心励精图治而在国内声望日高时引起慈禧的嫉妒，遂有政变之事。说到底

慈禧发动政变是着眼于维护自己的权势。容闳1898年在北京参与变法活动，政变后逃至上海。象他这样的人，如果认为慈禧反对变法的话，是决不会轻易“疏忽”的。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从《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可以看到有关慈禧并不反对变法的记述：

“五月初五日，奉明旨废八股矣。先是，二十九日芝栋折上，上即令枢臣拟旨……刚毅请下部议。上曰：‘若下礼部，彼等必驳我矣。’刚又曰：‘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上厉声曰：‘汝欲阻挠我耶？’刚乃不敢言。及将散，刚毅又曰：‘此事重大，愿皇上请懿旨。’上乃不作声。既而曰：‘可请知。’故待初二日诣颐和园请太后懿旨，而至初五日乃降旨也。百事皆如此。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⑦

康有为这段记述是企图说明“西后”和“顽臣”对变法的阻挠，但我们从中却可看到：第一，变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废八股“上谕”，是经慈禧批准的，表明了慈禧赞同这项变法；第二，对于废八股，刚毅反对，慈禧赞同，说明慈禧与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态度并不一致；第三，康有为以废八股“上谕”的颁布为例，说“百事皆如此”，表明大量的变法“上谕”是经慈禧同意的。总的说，当时慈禧对整个变法运动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

康有为还写道：

“先是，自怀塔布既黜，李鸿章、敬信亦撤去总署差，旧臣惶骇，内务府人皆环跪后前，谓上妄变祖法，请训

政，后不许。立山等乃皆走天津，谒荣禄，荣禄请废立，旗人冠盖相望。御史杨崇伊，亦荣党也，草折请训政，出示荣禄，荣禄许之，令杨崇伊持折见庆邸而面商之。庆邸与李联（莲）英皆跪请西后训政，立山等至谓上派太监往各使馆请去西后，西后大怒。故上自八日还海，请开懋勤殿，都人士侧望，而密诏遽下。”^⑧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慈禧并不以光绪“妄变祖法”为非，因而拒绝后党官僚“请训政”的要求。但当后党官僚造谣说光绪“派太监往各使馆请去西后”时，慈禧大怒了，致使光绪感到帝位难保，因而向康有为等人下“设法相救”的密诏。这又一次表明慈禧不反对变法，她反对的是光绪要剥夺她的权势地位。

既然慈禧当时并不反对变法，而且持赞同态度，如果康有为等人以及光绪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乃至调整变法步伐，或依王照之见，“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策略地维护她的“权威”地位，以争取她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或许就不致于发生后来的政变，而且还可以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挠，使变法得以进行下去。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复杂的。在后党与帝党矛盾日深的情况下，有些帝党官僚虽然赞同变法，但他们主要目的却是企图乘机排斥后党势力。康有为等人满怀爱国激情要求变法图强，然而在这些官僚的影响下，不自觉地卷入了后党、帝党的争斗之中。

维新派是如何陷入后党、帝党之争的呢？王照说“南海为张荫桓所蔽”，是说康有为受帝党官僚张荫桓蒙蔽所致。康与张

系同乡，关系密切，康受张的影响不无可能；但笔者认为，使康有为陷入后党、帝党之争的主要人物，不是张荫桓而应是翁同和。因为当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送到光绪手中，并得到光绪重视，令抄4份，分呈慈禧，和存军机处、乾清宫、勤政殿时，几年前还拒绝代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一书》和拒见康之来访的翁同和竟“屈尊”主动访问康有为。初次见面，翁即告康：“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故我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这些出自军机大臣之口对慈禧极端不满的语言，对于不知宫廷内幕的康有为当会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光绪十分重视康的第三书的情况下，说慈禧“不许上见小臣”，话中有话，这定必使康对慈禧更加不满。这次会见后，康变法心切，“犹频以书责之”，“常熟令陈次亮来谢，其意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⑨翁同和的意思十分清楚：不搞掉慈禧就无从办新政。看来翁同和的主要目的是要搞掉慈禧，他主动与维新派接近，就是企望借助维新运动的声势，引导维新派把慈禧为矢的。但当时康有为等人并没有完全按照翁的意图行事，这当然不合翁的心意，因而使翁对康逐渐反感，在背后和光绪面前斥骂康有为。

尽管如此，翁对康的重要影响是无法抹煞的，特别是所谓“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再加上康等人对光绪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情，并受到光绪对

慈禧不满情绪的影响；而且反对变法的官僚多出自后党，等等这些，使得康有为等人看不到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以那拉氏为不可造就之物”。例如，〈翁文恭公日记〉载：“……是日本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事（是）未定，良是。……”^①即是说光绪之“明定国是”是得到慈禧批准的。但当光绪在召见康有为流露出受慈禧“掣肘”不满时，康竟引为同调，也把慈禧当作变法的对立面，而要光绪把她撇在一边，“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②又如上述提到的废八股，光绪五月初二“诣颐和园请懿旨”，初五很快就得批准，而康有为竟视此是“上扼于西后”，并为“百事皆如此”而深为感叹！

在一些问题上，维新派为了附和帝党，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原来的主见。这在裁切冗员问题上反映比较突出。虽然康有为向来主张裁除冗员，但态度还比较慎重，直到1898年8月29日，他在奏折中还写道：“窃闻朝议纷纭，多有议厘定官制并裁冗署者，臣以为言之是也，而今行之，非其时也。……统筹全局，改定官制，事体重大，不能速举也。”^③但光绪出于扩张帝党权势动机，拒绝康有为意见，而是“大裁冗散卿寺，及云南、广东、湖北三巡抚，及各道各局并及漕运……”^④仅京师被裁闲散衙门即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惊……”^⑤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可能是出于乘机排斥顽固势力的企图，同时也是为了迎合光绪的需要，因而变调了，他在9月5日为张元济撰写的奏折中竟如是强

调：“现在宜多裁旧衙门，增设新政衙门，有军机处，何必有内阁，有大学堂，何必有国子监……”^⑥仅过7天，前后却宛若两人。

上面所述情况表明，康有为等人已陷于帝党泥潭之中，而且已越陷越深。他们视慈禧为仇敌，最后竟企图借助袁世凯之力加以除掉，要做那张柬之尚没有做到的事情。帝党中的许多人敌视慈禧，系出于争权的需要，维新派却是不自觉的，但不管如何，其结果是招致了后来发生的扼杀变法运动的政变。

维新派积极争取到光绪对变法的支持，但却不去争取把持朝政大权的慈禧，还被卷入了后党、帝党之争，导致变法运动的失败。但这并不等于说，如争取到慈禧的支持和不卷入后党、帝党之争，变法就可以取得成功，因为要使变法最后成功，还要有其它种种条件。本文所论，只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重要原因之一。

①③④⑥⑦⑧⑨⑩⑬〈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59、221、211、226、147—148、160、132—133、145、158页。

②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初探〉第359—363页。

⑤⑩⑬〈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81、523、485页。

⑫〈为厘定官制，请分别官差以行新政折〉，载〈杰士上书汇录〉。

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历史系

责任编辑：林有能

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

郭润涛

清代，“自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幕宾。”^①这是清代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幕府由封疆大吏至州县“父母官”皆置，其结构与功能都有了新的变迁和扩展。尤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幕府成了地方行政机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州县一级行政机关，是官僚政治系统的“终端”，与民相接，直接处理社会基层事务，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其政治上的意义尤其重要。所以，州县衙署中的幕府也特别值得重视。正缘于此，本文把视点放到州县的幕府，试探讨其设置的原因，以求正于方家。

(一)

清代州县衙署由五种人组成：(1)官；(2)幕宾；(3)胥吏；(4)差役；(5)家人。^②清代州县的官，依《大清会典》，可分为四类：一为正印官，二为佐贰官，三为首领官，四为杂职。后三类官是正印官的属官，皆由正印官弹压。清沿明制，每州置知州一人，每县置知县一人，州佐贰官为州同、州判；县佐贰官为县丞、主簿，所管或粮、或捕、或水利。州县首领官即管狱官。州的首领官叫吏目，县的首领官叫典史，二者既管狱囚，又与巡检分管捕务。州的杂职有巡检、驿丞、库大使、闸官、仓大使、税库司大使；县的杂职有巡检、驿丞、闸官、税课大使、河泊所官。^③

通常说的州县官，就是指州县正印官，也即所谓的“地方官”或“父母官”。州县官掌一州县之事务，诸如政令、赋役、治讼、教化、风俗、养老、祀神、贡士、读法等事，“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④州县官的权力特征是权柄独揽，其实质即“专制”。汪辉祖《学治说赘》说：“天下治权，督抚以下莫重于牧令，虽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权专也。”

清代州县官的专权，突出地表现在佐贰官地位的降低。关于州县佐贰官的职掌，《清朝通典》载：州同、州判分掌各州粮马、巡捕之事；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巡捕之事。可见，它的职能是在地方最主要的政务即刑名和钱谷两方面佐理州县官。然而，清代在州县的佐贰官和其他杂职的设置上是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的。首先，清初定制、州县佐贰官因事增减，事繁则置，事简则削，无定员。^⑤《大清会典》卷五记：知县1303人，佐贰官400人（其中：县丞345人，主簿55人），知县与佐贰官的配比是3.3比1，换句话说，清代平均三个县有两个县没有佐贰官。清代州县佐贰官设置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方面朝命所寄独在州县官身上，另一方面佐贰官只不过是州县官手下的办事员而已，已经失去佐贰官本来具有的“辅佐”的意义。其次，由于制度和价值观上“重正印官而轻佐贰官”，导致了佐贰官素质的降低。尤其是康熙年间实行“捐纳”以后，仕途杂进，州县官的素质已难保证，何况佐贰杂职。据蒋伊《甄捐纳以恤人材疏》（康熙十八年）说：康熙九年至十八年，吏部应选者不下二千人。每遇铨除，捐纳者居十之六，应选者居十之四。^⑥可见，当时吏部铨除任官中，捐纳官的比重比较大。而且，“铨除率多白丁”，这班人“铜臭舞文、猥胥腐薪”，既为利来，又为利往，很少有具治理才能的人。针对这样的情况，蒋伊建议“行拣选之法，身官书判，实加考验，取其文理才干堪为民牧者，照次除授；如文义荒谬，出身下贱者，给以知县职衔，俾为佐贰以自效。”^⑦从中可以看到，州县佐贰官的地位已经无足轻重，成了国家敷衍那些捐了钱粮的人的虚职。

州县官的专权还表现在它的集权上。州县之事，与民切近，实在繁杂。但“地方之要，首在狱讼。”朝廷对州县官的考成也首责刑名。因此，

州县官的专权集中地表现在它“刑政权”上的大权独揽上。在我国封建时代，行政和司法不分，行政官兼理司法官。清初以降，人口剧增，社会矛盾日益复杂，户婚田土的讼争案件层出不穷，因此，州县官常常为刑名案件焦头烂额，应接不暇。其之所以如此，从刑政权来说，就是因为它集法官、检察官、警官、验尸官和典狱长于一身。《大清会典》卷52载：“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钦定吏部则例》卷42规定：“佐贰等官，凡词讼不许准理。如正印官批行事件，方许准理。如佐贰等官，擅准词状，降一级调用，正印官不行查服，罚俸一年。”朝廷从制度上严格限制佐贰官的权力。因此，佐贰官在“刑政权”上虽有“职分应管之事”，但实际上无权可言，其职权与杂职相等。

再看典史一职。清代县署中，常置的官员除知县外，“惟典史每县一人”。“典史掌监察狱囚，如无丞、簿，则兼领之。”在州署中，相当于典史的官叫“吏目”，也是每州置一人。^②从制度上看，典史是典狱官，并且与巡检分管捕务；而且，当县丞、主簿空缺时，则兼领其职。问题是当典史兼领丞、簿之职时，是否有全面兼理州县官的职能？答案也是否定的。明清两代，制度上都规定，在丞、簿空缺时则兼领其职，并都分管捕务。但是，两代典史的本职大不同。明代的典史“典文移出纳”，清代的典史则掌监察狱囚，是管狱官。这种职能的变迁是由刑名案件的增加相适应的，也与佐贰官降格为办事员的变迁相一致的。而且，典史为“流外官”，与正七品的县官差距更大。因此，典史在兼领丞、簿之职时，也只不过充当一办事员而已。

由此可见，一方面由于州县官的专权，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务的繁剧，州县的佐杂官员实际上成了州县官手下的办事员，而“为牧令者，吏户礼兵刑工之事无一不当办，无一不当知。”^③汪辉祖说：“其权专也，专则一，一则事事躬亲。”那么，州县官所要办理的政务包括哪些呢？陈宏谋在《谘询民情土俗》（乾隆十九年）中说，“地方官所必应办理之事”包括：田赋、地丁、粮米、田功、粮价、垦殖、物产、仓储、社谷、生计、钱法、杂税、食盐、街市、桥路、河海、垣垣、官署、防兵、坛庙、文风、民俗、乡约、氏族、命盗、词讼、军流、匪类、邪教等等。^④如此庶务，要州县官一人“知”“办”，而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官僚机构是不可能。然而，清代的州县衙门

虽然佐杂官的职能相应的有所调整，但毕竟只有几名官员。因此，州县官就不得不假事权于胥吏，从而导致吏员队伍的扩大。

（二）

郭嵩焘说：“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⑤可见，胥吏仕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极重要的。

清代胥吏队伍的扩大，其原因是由于官僚政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清代人口剧增，人口与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的土地关系日益紧张，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与此相应，国家治理社会的事务也大量增加。从理论上说，由于政务的繁剧，国家机构，尤其是州县一级行政机关的“治事之官”也要相应增加。然而，清承明制，州县衙署中的佐杂官员并未增加，也就是说，官僚体系本身并没有多大的调整。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全国共有州县官1448人，其属官3046人，平均每州或县，佐杂官只有3.1人。不管州县多么“地小事简”，用三、四人去办理刑名、钱谷诸事是不可能实现上级指令的，即使按照朝廷规定的所谓“经制”吏员人数去帮助办理公务，也已不能应付。因此，要扩大州县衙门中的办理具体公务的办事员队伍势所必然。要么扩展官这一层，要么扩大吏这一层。由于官僚体系本身无力承受扩展官僚人员来适应社会要求的任务，解决上述矛盾是通过扩大官僚体系的附着物——吏的队伍来实现的。雍正七年（1729），田文镜上疏说“书役不必定额”。他认为，各级衙门书役散处各属，分上下班轮流办事。如果按照“经制”吏额，即使再添一人，各衙门也不过寥寥数人，要做到办公无误是不可能的。^⑥清代州县的胥吏人数已难统计。游百川说：“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少三四百人。”^⑦其中包括经制吏额、贴写和挂名的胥吏。侯方域也说，吏胥有贰有副，“每县殆不止千人矣。”^⑧清代州县的胥吏，“经制吏额”是很少的，增多的吏员或名“贴写”、或名“掌案”；^⑨而“挂名”的吏员，那是一种流弊。

吏员队伍扩大的内在变迁是书吏机构的完善化。清代州县衙署中的书吏机构叫做“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房。这是与中央“六部”一脉相承的。清代州县的“六房”，其组织系统相当完备。“六房”的职掌有了详尽具体的划分；每

房的书吏在职责上又有正、副或贰之分。它上承正印官及其幕府，与签押房、用印处等正印官的办事处（由家人分理）在公务上有严格的程序上的规定，下与“三班”（隶役的办事处、即快、壮、皂三班）有严格的承充关系。^⑩因此，“六房”在清代州县衙署中是最大的也最繁重的行政部门。

书吏机构的扩大，给官僚政治带来了新的问题。州县衙署中的书吏皆为当地人，因此，切身利益所在，与地方事务的关系格外密切，因而在处理公务时，常常私心用事，多囿于情，少据以理，其结果往往与官方政策有距离，所以流弊甚多。王凤生说：“大凡吏之弊有三：一以乘间朦混，一以得贿捺延，一以藉端滋扰。”^⑪其之所以能如此，就在于它“世守法则，博通案情，又明于本处风俗。”^⑫书吏的这三个长处恰恰就是州县官的短处。就拿对法律的熟悉程度来说，刚刚由科举而做官的或因捐纳而做官的就不是那些老吏的对手。清代立法，“同一律也，有律中之例，同一例也，有例外之案。”^⑬顾炎武指出：“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以市于下。”^⑭李塨也说：“法案如牛毛，建官使守法，法孰习之？习之者，吏耳。官不得不听于吏。”^⑮吴铤论胥吏缘法作弊说：“胥吏者，据以往之成牍，为当今之要务。事合于格，虽舞文乱纲不奸；事不合格，虽兴利除害无所施。以虚文为应酬之端，以故事为飞诡之计，守令惟是俯仰惕息，奉行惟谨，胥吏乃可以操予夺之权，而无可如何。”^⑯于此，“为官者亦多方防闲之推辱之”，然而，“防之愈严，作弊愈巧，摧之愈甚，自爱之意愈微。”^⑰这样，官对于吏，在公务的处理上有一个约束、把关问题。这一任务需要内行的人来充当。

（三）

无论是制度上还是在实际上，州县官僚对政务的处理权限及其地位表明，州县政务的处理是长官负责制。既然州县官为民“父母”，一州一县的事你无一不当知、无一不当办，那么它又是怎样“知”和“办”的呢？

州县官是官僚体系的最低一级官员，督抚司道府都是它的“上司”。这些所谓的“治官之官”的职责，说到底就是督促地方官征赋召役，并维持好地方治安。因此，对于州县官来说，“治下”是其职责，“奉上”更是其首务。在传统的官僚政治

中，即使一个极具“公德心”、“事业心”的地方官，都必须谨慎地“奉上”，以“获上”而治民，更不是说那些只以保官食俸为能事的官蠹们。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说：“获上是治民第一义”，可以说是说透了做官的妙道。正因如此，“获上”一事也比治民难得多。在封建时代，“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官与官的关系总是充满极强的感情色彩，所以，在繁杂的政务中，往往公私不分，因而假公济私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地方官“奉上”之难，莫过于“大宪”过境，州县办差。上官本人且不说，一班左右随侍之人，就够难应酬的了。“稍不遂其所欲，辄相与百方挑剔，或于窗外布散流言，或于酒菜搀和盐醋，或将铺垫暗中撤去，或捏称灯烛夫马不齐，诡诈多端，总至激成宪怒而后已。”^⑱激成宪怒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地方官的仕途前程全操在那些“治官之官”手中，公事往来尚有成法可依，而那些似乎是公事之外的“小事”，却是料之有所不及的，是最容易“出事”的所在。所以赵吉士说：“簿书之烦，期会之繁，孝成文网之密，既已纷扰易堪，而事之难为者，其长必下于所司，所司以行于外大吏，外大吏又层累而下之，以至于郡县。盖至郡县而无可下矣。而又有诛求之不测，毁誉之无凭，瞻顾旁皇，救过不暇。”^⑲于是，州县官“皇皇然但知避罪而不肯立功；但知奉上而不肯恤下。”^⑳正如袁牧所说，其“精神在上不在下耳。”官场的这种情势，足以消磨州县官的精力，要求它尽心治理地方政务，实在勉为其难。

再看州县官本身的素质。清代的州县官，大抵出自三途：（1）科甲；（2）军功；（3）捐纳。这些人“未仕之先，吏治皆非所习。虽自好者，偶阅前人牧令成书，略窥门户。然而何者为切中肯綮，何者为杆格难行，何者为俗见所拘、不可复蹈，何者为出治本务、必欲力行，胸中固漫无定见也。”^㉑自科举为仕路正途，“天下之士，群趋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风俗随之。人才三高下，士风之醇漓，率由是出。”^㉒论及明清时代的科举，钱大昕有一段话深中肯綮。“科举之法行，士大夫习其业者，非孔孟之书不观，非程朱之说不用。国无异学，学无他事，真所谓一道德以同风俗者矣。然学者自就傅而后，粗涉章句，即从事于应举之文；父师所讲授，无过靡软骛骛之词，得其形似，便可以致功名。”^㉓所以，顾炎武说：“初释褐之书生，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

莫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③

清代的捐纳卖官，始自康熙十三年(1656)，其后屡有停开。雍正五年(1727)，令准捐纳道判、知州、知县等官。至咸丰九年(1859)，因军兴饷绌，所有的官衔都可以由捐纳而得。到了同治年间，给事中吕贤基说：“捐班之道、府、州、县，已居天下十分之半”。^④自然，捐纳开后，那些具有真才实学而又科举屡屡不中者可以由此而得到进用。但是，用钱或粮食等买官，其对官员的选拔就失去了标准。“朝为白丁，上一千七百两，而暮则堂堂县令矣；再上一千两而先用矣，再上一千两而即用矣。”^⑤其结果是庸庸碌碌或贪污营私的官员更多。

清代以军功授地方官的主要是咸丰年间困剿太平军而立有战功的人。行伍出身，也不乏才能之士，但多逞能使气，对于行政来说，缺的正是科举而仕的官员的那点稳重谨慎，所以，他们于战有为，于地方行政庶务则不利。而且他们也同样具有由科举和捐纳而仕的官员的欠缺。所以，其本身的素质很低，难以胜任日益繁剧的地方政务。

还有一个官场习气问题。陈虬论当时官场风气时说：“近日官场习气太深，嗜好太重，皆足为风俗人心之害。庸者视为传舍，贫者居为利藪，名为知州、知县，问以刑名、钱谷，则皆平、勃宰相才也。在任十年，有不识地方广轮之数，终年有不坐堂皇者，酣眠宴起，终日昏昏。”^⑥程含章指当日山东官场习气说：“寅僚之燕集，宾朋之间，谈不闻其谏诤治道，思作好官，惟计较某州某县孰肥孰瘠，日思得一美缺，便我私图。有于稠人广众中一谈吏治者，则曰彼迂且狂。车马欲其坚肥，衣服欲其丽都，妻妾欲其娇妍，童仆欲其俊美，寅僚钻利，探听风声，小不如意，怨谤上司，甚至播散谣言，希图挟制，转相效仿，习为风气，牢不可破。”^⑦正是一幅官场气景的典型写照。这些人一旦“印符”在手，民间之休戚安气便无关痛痒，呼吁惨付日益繁剧的地方政务已经不能，毋庸再说“事事躬亲”。

综上所述，清代州县行政机关中设置幕府，就州县吏治来说，有下列原因：(一)由于清代社会政治的日益繁复，客观上要求官僚政治体系作相应的调适。然而，这一要求是通过扩大书吏机构来满足的。书吏机构的扩大又给州县行政提

出了新的要求。(二)清代州县衙署中官员配置不完备，仅有几名佐杂官员。尤其是佐贰官失去了“辅佐”的功能。(三)清代州县官的素质相对比较低，而且由于官场奉上、趋利的风习，也无法应付地方政务；然而，朝廷对州县官的考成，关系到它的仕途前程，因此，私聘“左右手”、“专为本官计考成”，也成为必要。于是，一个既能辅助州县官全面地处理公务，又能代替州县官约束书吏，在公务上把关的机构应运而生。这就是清代州县幕府。

州县幕府是州县行政机关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不过，这一部门是“隐而不显”的。幕府的设置正如书吏机构的扩大相同，它只是官僚体系的附着物，而不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按照通常的眼光看，在政治上是官僚体系即幕宾的主官在起作用，而“幕府”及“六房”的作用则隐但之声便充耳不闻，加上州县官本身的低下素质，要应而不显。

- ① <钦颁州县事宜>“慎延幕宾”条。
- ②⑩⑪⑬⑮⑲⑳ 徐栋<牧令书>卷四、卷2、卷2、4卷23、卷8。
- ③④ <清朝通型>卷34。
- ⑤ <大清会典事例>卷28，30。
- ⑥⑦⑧⑨⑫⑭⑯⑰⑳㉑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17、卷21、卷20、卷24、卷15。
- ⑪ 徐珂<清稗类钞>胥役类“例吏利”条。
- ⑬⑭⑰⑲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8、卷26。
- ⑱ 郑观应<书吏>。
- ⑳㉑ 顾炎武<日知录>卷8。
- ㉒ 李塨<平书订>卷3。
- ㉓ 陈宏谋<在官法戒录·序>。
- ㉔ 刚毅<牧令须知>卷1。
- ㉕ 王鏊<制科议>·陈文壮<昭代经济言>。
- ㉖ 钱大昕<处士陈先生墓表>。王文濡<国朝文汇>乙集卷25。
- ㉗ 吕贤基<敬陈时政四事疏>·<道咸同光四朝奏议>册2。
- ㉘ 陈虬<严可州县以责成效>·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23。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历史所
责任编辑：凌峰

历史真实度的系统观

郑宏卫

宇宙万事万物皆可认识。但对它们的认识又是不可穷尽的，总是受着历史的限制，又在历史中不断地发展。绝对真理既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也是相对真理无限发展的极限，又以不同的程度存在于任何相对真理之中。于是，便有了认识真理性的界限问题和程度问题。

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有共性也有特性。作为科学真理，两者都是主体通过中介对客体的反映。其真理性同样取决于主体反映与客体实际相符合的程度。历史科学的特殊性在于：首先，从被认识的客体看，自然科学是自然界，历史科学是人类社会。宇宙万物唯有社会的人才能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这些在历史中活动着的个人，各自企图历史循着自己的目的运动，而予历史以大小、方向各异的作用力，结果是不断变动的总合力决定着历史运动的速度和轨迹。这样，就表现出历史运动的客观实在性，也表现出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决定性与概率性的相统一。历史是具有主体意志和实践能力的无数个人世代交替的社会活动的综合的客观过程。这个客观过程不断流逝，无法逆转，也不会重演。而自然

现象在类似的条件下，则可以大体上重现。其次，从认识的中介系统看，自然科学有观测和实验的仪器等物质性工具，以及掌握物质性工具的技能 and 一套自然科学思维方法。历史科学应该面对的客观历史过程已经消逝，无法运用物质性工具去观察或实验使其再现。即使是当代史，研究者直接接触的范围也极其有限。历史科学实际上所接触的，只能是史料，文字的史料和实物的史料。史料已不是客观历史实际本身，而只是它的种种信息，实质上也是一种中介系统。可以说，史料是第一层中介，研究史料的工具和方法是第二层中介。历史科学只能运用第二层中介对第一层中介进行探索和研究，而客观历史实际永远隐居于第一层中介的幕后。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已是反映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的史料和根据史料再现既往的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的反映，已不能等同于事实上的历史客观过程。而自然科学则可直接面对大自然本身，虽然它也要经过中介，但只经过一层中介。最后，从认识主体看，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但由于认识对象性质的不同，表现为主体对认识的过程和结果的极不相同的作用。历史科学的事实和真理无处不与人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人们

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阶级、社会集团或个人的利益，有意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屡见不鲜。即使是信史，其可信性也是有限度的。

鉴于历史科学的这些特殊性，在历史研究中引进历史真实度的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历史真实度是指对历史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的真实性与真理性的程度，也就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与客观历史过程相符合的程度。它将历史真实性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

二

历史真实度是对历史认识的精确度、深刻度和涵盖度的三维综合量度。精确度是指对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规模、发展过程的描述及其前因后果、内外关系、运动规律等等，在质与量的把握上的精确程度，也就是历史认识与客观历史过程在表现形态上相符合的程度。深刻度是指对各种历史运动的认识，从感性、知性到理性，从浅层本质到深层本质，从初级规律到高级规律的探索与把握上的深入程度，也就是历史认识与客观历史过程在内容实质上相符合的程度。涵盖度是指对历史规律和历史理论所概括的历史事实、所解释的历史现象和所预示的历史变化的涵盖空间大小的量度，也就是一种历史认识所得到的史料和史论的确证性的支持多寡的程度。

历史真实度的基础在于精确度。精确度的根本在于对史料的鉴别和组合。首先是史料的鉴别。需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做一番踏踏实实的考据工作。更需要循此继进，找出各个考证了的史实之间的内部联系，并加以组合，加以系统化，使

之尽可能还原为历史过程的本来面目。显然，愈符合历史过程的本来面目，历史真实度的精确度便愈高。

但历史科学并不于此止步。它要从历史运动的表现形态深入到内容实质。它要进一步探求历史的本质与规律，并且不懈地层层深入。于是便将历史真实度从精确引向深刻。这里，需要认识主体在思维上做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有一种质的飞跃。需要发挥主体能动性，作出必要的解释。这种解释，有两重性：有导致主观任意性扩张以致泛滥的较大可能，又是使历史认识深化的必由之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解释必须是科学的抽象和概括。如果人们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具体的历史现象作解释，那末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因为“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历史科学的任务，不仅在于历史运动再现性的描述，而更着重于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历史真实度的内涵，不仅要有精确性，更要有深刻性。精确度固然是深刻度的基础，而深刻度又反过来检验和提高精确度。因为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只有深刻地掌握了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更精确地描述历史运动的客观状貌。

历史真实度的涵盖度又是建筑在深刻度的基础之上。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②总是由假说发展成定律，那末历史科学的理论发展，则往往是一种假说为另一种更新的假说所代替。新的假说一般比旧的假说具有更大的历史真

实度，主要是涵盖度较大。新假说为更多的史料、史实所证明，能够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和规律，也就是更加接近客观历史过程，因而能够代替旧假说。显然，历史真实度的涵盖度从根本上离不开精确性，且更加依赖于深刻度。涵盖空间随着深刻度的加深而扩大。反过来，涵盖度的大小也检验、证明和影响深刻度和精确度的量值。

三

史实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历史事实的清洗和历史过程的复原。前者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着重探索历史认识的源与流、历史资料的钩沉与博采、鉴别与选择、历史事实的确证与核实等问题。后者属于历史认识的知性阶段，着重探索历史现象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历史过程横向结构的剖析与纵向系统的复原等问题。显然，在历史科学研究工作中，史实真实度极为重要。离开了史实真实度，历史科学便会成为海市蜃楼。

在尽可能复原客观历史过程的基础上，需要进行历史评价。这是对各种历史事实的价值判断系统，包括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评价和历史时期评价。决定史评真实度大体上有三个要素：（一）史实真实度；（二）评价方法的科学性；（三）正确的评价标准。第一个要素当然是史评的客观基础，而历史评价的标准，也属于广义的评价方法。相对于评价方法的多维交叉与层递深入，评价标准也应多元而统一。其根本标准应当是两条：一、人民本位，即以对该时该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本民族、全人类的长远利益相统一为衡量是非功过的最后标尺；二、超越前人，即着

重肯定在历史发展上有哪一方面哪一点的新贡献、新创造。两者似二实一，因为新贡献、新创造归根到底必定符合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利益，而其结果必然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史评标准是与史论、史观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有什么样的史观与史论，便有什么样的史评标准，而史论与史观又是在大量史实史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在充分而真实度很高的史实基础上，在正确的史观史论的指导下，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标准，才能使史评真实度尽可能提高。

史论与史观属于史学理论的不同层次，同为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历史规律的发掘，属于历史认识的理性阶段。这里所说的史观，是指人们对历史总体运动及其根本发展规律认识的哲学概括，以及史学研究的认识论和基本方法，是整个历史科学的最高层次。这里所说的史论，是指对各个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历史时期与阶段、各个具体的民族、国家与地域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认识。一般地说，史实真实度，史评真实度、史论真实度和史观真实度，犹如一座多级的宝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下层不稳固，上层便无法建筑。但是，它们又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宝塔。史观真实度的不同，可以造成史论真实度的极大差异。史观史论真实度的差异，又会给史评真实度以很大影响。连史实真实度，也会受到不同真实度的史观史论和史评的影响。对于同一史料，在不同的史学理论框架下，可以有极其不同的历史解释。

无论史实、史评、史论或史观的真实度，都是精确度、深刻度与涵盖度的三维统一。但在这三维中，又各有自己的侧重

点。一般说来，史实真实度侧重于精确度，史评真实度侧重于深刻度，史论和史观真实度则侧重于涵盖度。

四

历史真实度的系统观，实质上是一个关系到历史认识的学术价值评估的历史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它能有力地排除历史认识论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

从历史真实度的系统观看来，历史科学的真实性和真理性是可以通过社会实践予以检验的。其检验方法有两种，即起点检验与结果检验，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起点检验即史料检验。将文字的和实物的史料，逐一予以考证、分析、核实，包括使用现代科学的各种物质手段。许多简明的史实是完全能够确证的。结果检验可分为不同层次，有史评史论和史观的各种结果检验。史评结果检验主要是检验评价标准的正确与否。史论结果和史观

结果的检验，更可以用史学理论来指导各个方面的现实的社会实践，看它能否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从而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检验史观史论以致史评史料的真实度。将起点检验与各种层次的结果检验结合起来，我们便能比较有效地在历史科学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从历史真实度的系统观看来，历史科学的客观性虽然是相对的，但又是确凿无疑的。历史科学的真理是可以获得的，也是可以验证的，尽管它是不可穷尽的。历史科学虽然具有自己明显的特殊性，但是同任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它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一个无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历史地具体地相统一的理论体系。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作者单位：浙江台州地委党校

责任编辑：凌峰



广东近代金融的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曾 涛

广东近代金融的发展，同广东近代经济的发展一样，是一部充满艰难曲折、内忧外患、缓慢向前发展的历史。其间既有不少仁人志士为发展我省金融事业而不屈不挠、努力斗争的壮举，也有政客流氓、投机者们掀起的一场场金融风波；既有领金融风气之先于全国的大事件，也有顽固保守、反动落后、愚弄人民的不光彩一面。基于政治、经济、地理诸方面的因素，广东在许多方面与全国各省相较，有着鲜明的特色。本文试图通过对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广东金融发展的简要描述，揭示广东近代金融的基本特征。

一、广东近代金融的发展过程

广东近代金融的发展历史，可分为鸦片战争至民国成立前（1840—1911）和民国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1911—1949）两大时期。民国时期还可划分为民国成立至广州沦陷前时期、广州沦陷时期、抗战胜利后至广州解放前3个时期。现分述如下：

（一）鸦片战争至民国成立前时期（1840—1911）

中国近代金融史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组成部分，开始于鸦片战争，这是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广东也不例外。鸦片战争前，广东金融得商业繁盛之惠而得到发展，但所有金融机构如银号（也叫钱庄）、西号（山西票号分号）和“五家头”、“六家头”（相当于银炉）以及为数众多的当铺等均为旧式之金融机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入侵，其金融势力也接踵而至。英籍丽如银行最早侵入我国，1845年在广州设立分行，此后，英籍汇丰银行、麦加利（渣打）银行、美籍花旗银行、法籍东方汇理、德籍德华银行、日籍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等先后在广东设立分支机构，猛烈

冲击着广东金融业，使原有的旧式金融组织开始走向衰落，新的金融组织起而代之。光绪年间，广东新式机器造币厂成立，首铸机制新式银元。光绪三十年，设立广东官银钱局。光绪三十三年，中央系统的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广东设立分行，是为广东近代新式银行的开端。

（二）民国时期（1912—1949）

辛亥革命对我国金融组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引起了金融界的变动，和清政府勾结在一起的顽固守旧的票号逐渐消失，作为封建金融支柱的官银钱号被迫改组，钱庄经此风暴，倒闭了不少，幸存者也已削弱了力量，这些就为发展新式银行业提供了机会。可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新式银行的发展起了刺激作用。民国后，以国家银行、省市地方银行、商业银行和各种专业银行为代表的新式银行不断出现，并逐步取得了支配地位，尤以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央银行、1927年开业的广州市立银行、1931年改组、成立的广东省银行最为主要。1935年，交通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1930年广东还政中央后，中、中、农3家国家银行先后在广州设立分行。商业银行和各种专业银行特别兴盛，总分行有四五百家，较著名的就有20多家。进入20、30年代，在近代新式银行和各种金融风潮的打击下，广东的银号、典当等旧式金融组织进一步衰落。1929—1936年陈济棠治粤时期，是广东金融业比较稳定并有所发展的时期。综观民国以来至1937年以前广东设置的银行，虽然对广东的经济发展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连绵不绝的金融风潮却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灾难。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中、交、农4家国家银行及大部分商业银行迁往香港，市立银行结束，广东省银行迁往粤北，7家外商银行仍然留在广州，日籍台湾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则以

胜利者的姿态广设分支机构，控制了广东的金融命脉并强制人们使用军用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丰、麦加利、花旗、东方汇理等外商银行都被日军接管。1940年7月，伪广东省银行开办。1942年7月，伪中央储备银行广州支行成立并发行中储券。

日本投降后，财政部派员先后接收了伪中央储备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德华银行及伪广东省银行。同时，中、中、交、农4大国家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广东省银行以及各专业银行，外商银行先后复业。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后，法币、金圆券、银元券相继崩溃，通货膨胀势若奔马，金融市场风潮汹涌，人们遭受了巨大的劫难，是为广东近代金融史上最为混乱时期。与此同时，广东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金融事业一直也没有停止过，至解放前夕发展而为著名的南方人民银行。

二、广东近代金融的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广东近代金融的殖民地色彩比内地要浓、程度要深。

1. 外国银元最早侵入广东，而后侵入他省。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从明末起，外国银元即陆续流入中国，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外国银元主要集中流入广东。“洋钱来自外洋，流布广东，而后遍及他省”。（《中国近代货币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7页。）鸦片战争前后至清末，流入广东的外国银元约有4.7亿元，约占全国总数的40%。其在我省流通时间长、范围广、数量多，对我省经济影响很大。它不但助长了资本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扩大了中国币制的混乱，加速了我国白银危机，对我省金融经济也产生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它又是广东首先开铸银元的契机。银元是外国资本主义剥削中国人民最先使用的工具，是我省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金融的一个标志。

2. 外国银行最早侵入广东。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再也不满足于银元这一金融掠夺的工具，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开始在中国广设银行，发行钞票，揽收存款，垄断国际汇兑，控制我国财政、金融。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又名东方银行）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开了外国资本家在我省开设银行的先河。随后，汇隆银行、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德华银行、台湾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外国

银行先后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控制了广东的财政金融命脉。这是广东半殖民地性质金融的一个最显著特征。

3. 港币长期入侵广东，并一度成为本位货币。自晚清至解放前的一百多年间，广东人民长期生活于金融恐慌之中，对本国货币慢慢失去了信用，港币遂得以乘机而入。抗战结束后，接着内战又起，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无限制地发行法币、金圆券，造成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港币则进一步占领了广东的金融市场，成为本位货币。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949年8月止，港币发行额在13亿元以上，在我国流通量约7亿元，其中华东、华北占12%，华南占88%，而广东一省占华南90%，即5亿元左右。（见拙作《广东解放初期的外币斗争》，载《广东省金融志资料》1988年第2期。）大量港币在广东公开行使，实质上使货币发行权和外汇价格都掌握在外人手里，由人民承受外币贬值的巨大损失，这是广东近代半殖民地性质金融的又一个显著特征。

特征之二：广东近代金融在全国各省市中往往有领风气之先的壮举，一些引人注目、影响至深的金融大事均发轫于广东。

1. 首先机铸制钱、西式银元和铜元。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向外国购置铸钱机器，设厂铸钱。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广东钱局开始铸造制钱，于八月初三日开始行用。这是中国机铸制钱的开始。虽然不久制钱即停止铸造，但它是我国铸钱史上的一件大事，是铸钱技术上的一个进步。

中日甲午战争后，我国货币流通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由原来以银钱本位为主体的货币流通过渡到以银本位为主体的货币流通，行用数千年的铜铸币的本位币地位，逐渐为银铸币所取代。在银铸币中，银元逐步取代银两；在铜铸币中，铜元逐步取代制钱。这种趋势的形成，实肇端于广东。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初二日广东钱局开铸机制新式银元七二正版，率先投放流通领域。稍后，各省亦纷纷设厂自铸。自铸银元和银元制度的逐渐确立，在中国近代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革新意义。它采用比较先进的机器铸造，银元的模式、重量仿照西式，适应了货币发展的潮流，同时促使清末铸币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一次技术革命。随着国内自铸银元的增加和流通的扩

大，相对地削弱了外国银元在中国的行使，特别是后来成为我国确立银元本位制的基本典型规范，标志着我国货币制度朝前迈进了一步。

旧式制钱经过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的打击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影响，在变化了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已难振威风，取代制钱的铜元就成为客观的必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钱局以钱价日涨以及粤省地邻港澳，商民习用外洋铜仙为由，奏请自行仿造铜仙以救钱荒和挽利权。六月，广东首先创铸铜元。这种铜元每枚重二钱，“每百枚换一元”，制作十分精美，发行后“数月以来，行销无滞，军民称便”，颇受社会欢迎，价值日升。各省见有利可图，遂纷纷设厂铸造，到光绪三十一年，全国有12个省设局铸造，达到鼎盛时期。铜元形式上是模仿外国的铜辅币，实质上是清末大钱的继承和演变。但由制钱的方孔到铜元的无孔，则是我国钱币形制的一次改革。

2. 新的金融思想、新的金融主张也往往发源于广东。

在外国银元源源流入、充斥市场的形势下，当时我国一些有识之士议论纷纷，探求抵御办法。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首先提出自铸银元的主张，但未为清廷采纳。两广总督张之洞是我国第一位不但提出自铸银元的主张而且使之付诸实践的人。他在奏清清廷试铸银元片里，较全面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和主张：“广东华洋交错，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闽、台、浙、江、皖、鄂、烟台、天津，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长沙、湘潭、四川、打箭炉、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至利归外洋，漏卮无底。……窃维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为得体。”同时还就如何开铸银元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张之洞的金融思想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著名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提出富国之法有六，其中有“日钞法”、“日铸银”，认为中国要改革币制，自铸银钱，才能求得国家的中兴。

在我国，最早提出设立银行建议的，是洪仁玕。他在《资政新篇》这个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方案中主张兴办银行。

孙中山先生的金融思想和金融实践则闪耀着时代的光辉。191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钱币革命”通电，主张政府应实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困

难；国内的货币流通，元以上均用纸币，与金银脱钩，使金银不受进出口的影响；纸币发行以工农产品、劳动报酬为基础，以国家赋税作保证，并提出了一整套纸币发行、收回、销毁和防止流弊的办法。在实践中则于1924年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孙中山先生的金融货币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在中国近代金融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特征之三：广东近代金融与华侨（包括港澳同胞）关系十分密切，华侨对广东金融的支持和贡献特别大。

广东是全国华侨最多的省份。据统计，从1862—1949年，华侨在广东投资1268个企业，投资总额为3.8亿元，其中投资于金融业1005户，投资额为0.4亿元，分别占总数的5%和10.43%，在各行业中居于前列的位置。（《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1篇第5章。）此外，侨汇也是华侨对广东金融的一大贡献。如1911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发行“中华民国金圆券”，华侨认购达10余万元；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中央银行，筹集到外资（主要是侨资）1000万元。

民国后，广东的经济建设以及新式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原因，都得到华侨金融的帮助和促进。在广东近代三四十家主要的商办银行中，以侨资为主的银行占了将近一半。由于这些华侨金融资本家接触西方先进的金融思想，因而在开拓国内银行业务中，能采用当时比较先进的业务经营，带动了其他银行业务的发展。

特征之四：广东近代金融的革命性、割据性、复杂性也是很突出的。

旧中国的广东财政金融在支持民主革命尤其是护法、北伐等战争中曾做出过重要贡献。孙中山手创的中央银行，从它成立起，就全力支持大革命时期的各种革命斗争，积极为政府筹划军政费用，监督各方税收就地缴库，及时上解，促进军政财统一，使广东这块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得以巩固。中行又在北伐战争中全力以赴，担负起筹划财政金融支持战争及巩固胜利的重任。如果没有中行的财力和信誉作保证，要取得北伐胜利是不可思议的。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金融事业在广东也很突出。1928年2月20日，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海陆丰劳动银

行，发行纸币，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最早建立的银行。虽然它并不完善，存在时间也短，但它揭开了我国革命金融史上新的一页，为后来革命根据地的银行建设提供了初步经验。

与广东的割据情况一致，广东金融的割据性、地方性也存在较长一段时间。民国后，中国并没有出现安定的局面，而是军阀混战，各霸一方，至北伐战争胜利前，广东是为革命的中心，基本是自成体系的。及至1929年陈济棠上台后，掌握了广东的军政财大权，广东封建割据的局面得以形成。广东金融的割据性、地方性也随之出现，其标志是：1. 金融机构以省市地方银行为主。陈济棠说：“发展省立银行，使能为全省金融之重心，并藉省立银行之资本，发展种种建设事业。”（《军声》第四卷第四期。）2. 民国政府中、中、交、农4大国家银行在此时期未能在广东建立分支机构。1936年7月，陈济棠下野，广东归政中央，这种局面才告结束。但紧接着抗战事起，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广东金融旋被日本人控制。及至抗战胜利，内战又接踵而来，金融混乱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民国政府南迁广州后，外币市场（主要是港币市场）、黄金市场、银元市场甚旺，金融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广州成

了金融投机者们的天堂。这表明广东金融的复杂程度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特征之五：多姿多彩的货币文化。

广东近代货币是中国近代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著名的货币研究专家和收藏家吴筹中先生曾专门撰文，认为“广东近代货币甲天下”。笔者认为，广东近代货币虽不能称甲天下，但同其他省市比较，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其品种繁多，铸造技术上乘，既有清末机铸的银元、铜元，又有民国以来各个时期发行的各种票券，既有外国银行在广东发行的钞票，又有民间流通的各式货币，还有革命根据地发行的各种货币和流通券。各式各样的钱币，不但体现出多姿多彩的货币文化，如广东省银行和广州市立银行发行的30版钞票，版式多，均用中文签名，而不象其他省市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用英文签名；民间通用的“镞票”作为币名尚属创见。而且对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概况。此外，广东近代钱币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谋求金融和币制变革的追求，因而是中国近代货币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实证资料。

作者单位：广东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责任编辑：林有能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述评

王运熙

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选录了唐代安史乱后一段时期的诗歌，所选各家名下均缀有评语，其所选诗歌和评语，都反映了中唐大历年间的创作风尚和审美标准，值得我们注意。

高仲武，生平事迹不详。约生活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前后。《中兴间气集》卷首自署“渤海高仲武”。渤海似指其郡望而非籍贯。渤海为汉郡名，（在今河北省东南部）。后汉渤海太守高洪及其子孙世居蓑县，为名门望族，故后世高氏常自称为渤海人。他除编选《中兴间气集》外，尚著有文论《格律异门论》及《谱》两篇（见《中兴集》孟云卿评语），惜今不传。

本书题为《中兴间气集》。唐代肃宗、代宗两朝，戡平安史之乱，史称中兴。间气意谓杰出之人才。本书专选肃宗、代宗时期诗人作品，故题为《中兴间气集》。集前有编者自序，文不长，录如后：

诗人之作，本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由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

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涣，戎事纷论，业文之人，述作中废。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仲武不揆菲陋，辄罄搜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起自至德（肃宗年号，公元736—737）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作者数千，选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三十二（二一作四）首，分为两卷，七

言附之。略叙品汇人伦，命曰《中兴间气集》。

且夫微言虽绝，大制犹存，详其否臧，当可拟议。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竦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自郢以下，非所敢隶焉。凡百君子，幸详至公。

序文第一小段着重谈过去的诗歌选本。它批评了梁昭明太子萧统以下的四个选本。（一）《古今诗苑英华》三十卷，萧统编，《隋书·艺文志》著录，今佚。序文所谓“失于浮游”，不详其意。（二）《玉台新咏》十卷，陈徐陵编，今存。《玉台》专录有关男女情爱的篇章，故序文讥为“陷于淫靡”。（三）《珠英学士集》五卷，唐崔融编，今残佚。所谓珠英学士，是指武则天参与修撰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文人。崔融編集修书者四十七人之诗为《珠英学士集》，并为之序。（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此书专录修撰《三教珠英》文人之作，故序文称为“但纪朝士”。（四）《丹阳集》一卷，唐殷璠编，《新唐书·艺文志》等有著录，今佚。此集专录唐润州（古名丹阳郡）境内包融、储光羲等十八人的诗作，故序文称为“止录吴人”。按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各有一小段文字批评前此论文著作和总集的缺失，《中兴集》这段批评文字，当受其影响。序文最推重的为《正声集》（三卷），唐孙季良编。《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今佚。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谓“选初唐有《正声集》”，《中兴集》专选肃、代两朝之诗，在选录一段时期诗歌方面体例同于《正声集》，这当是他推重《正声集》的一个原因。

序文第二小段介绍了此书选诗界限和编选情

况。其时间界限为起自肃宗至德初，终于大历末年，前后共二十余年。文中“伏惟皇帝”云云，指当时在位的代宗，又苏涣评语中提到涣随哥舒晃反叛，按哥舒晃兵败被杀，在大历十年冬，可知此书当编集于大历十一至十四年间。高氏自称“博访词林，采察谣俗”，从数千作者中选录了二十六人之诗作。但大历时期颇有成就的诗人韦应物、严维、卢纶、李益等均未入选，杜甫晚年诗歌，均作于这段期间，也未入选，可识其搜录尚有未备。按此书实深受殷璠《河岳英灵集》的影响。一，从选诗时间界限上看，《河岳集》专选玄宗朝诗，迄于天宝十二载，《中兴集》起于肃宗至德初年，在时间上正相衔接，有继《河岳集》而续选之意。二，从体例规模看，《河岳集》于所选诗家下各缀评语，又摘录佳句加以品评，创选评结合之体；这一体例完全为《中兴集》所承袭。《河岳集》选二十四人，诗二百余首，分为上下卷，《中兴集》规模大体相近。三，从书名上看，“中兴间气”四字与“河岳英灵”四字互相对称。间气、英灵均指杰出之诗人。中兴以时代环境言，河岳以地理环境言，亦相称。四，从用语看，《中兴集》评皇甫冉有云：“发调新奇，远出情外。”当本于《河岳集》评王季友语：“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又《中兴集》评郎士元为“河岳英奇”，似更径受《河岳集》书名的启发。由此可见，《中兴集》是直接继承《河岳集》而编选唐代一段时期诗歌的总集，序文中仅提《正声集》而不提《河岳集》，殊令人费解。

序文第三小段主要说明此书的选录标准。其思想艺术标准是“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即体貌风格雅正（“风雅”意为像《诗经》的国风、大小雅那样雅正），理路思致清新，所强调的是体貌要雅，内容要有新意。按“体状”二句为对偶句，带有互文性质，即体状、理致都要风雅、清新。编者认为在这两方面表现得好，能使读者易心竦耳，便是可以入选的佳作。关于作者和诗歌样式，其标准是“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即兼采在朝在野人士之作，不像崔融《珠英学士集》的专取朝士；兼收格诗（古体诗）和律诗，不似元结《榷中集》那样专收古体诗。在论述前代作者时，编者指出古诗具有“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反映当时政治社会情状的积极内容，不苟为媚世之作。这种主张诗歌宜表现时事的见解，在《中兴集》的选材方面也有所反映。

《中兴集》在品评各家诗时，的确很重视雅和清新，常以这类词语赞美诗人，如：

评钱起：“体格新奇，理致清贍。……皆特出意表，标雅古今。”

评于良史：“侍御诗清雅，工于形似。”

评李希仲：“务为清逸。”

评郎士元：“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

评崔峒：“文彩炳然，意思方雅。”

评张继：“诗体清迥，有道者风。”

评皇甫曾：“体制清洁，华不胜文。”

要想了解雅、清评语的具体内涵，还得结合编者对作家作品的全面评价来考察。高仲武于所选二十多人中，最重钱起、郎士元两家，各选诗十二首，分别置于上下卷之首。其次则李嘉祐选八首，皇甫冉选十三首，刘长卿选九首，也是选录的重点所在。高氏对钱起、郎士元、皇甫冉三人的评语，最能表现出他的选录标准。他评钱起云：

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贍，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指王维），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芟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曼，迥然独立，莫之与群。且如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又牛羊上山小，烟火隔林疎；又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标雅古今。又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则礼义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长名流，为后楷式。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

认为钱起是王维以后最杰出的诗人，“迥然独立，莫之与群”，评价极高。高氏最欣赏的“鸟道挂疏雨”三联，都属写景工巧之语，可以窥见其审美趣味崇尚所在。当时士林把钱起、郎士元两人与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相比，是由于钱、郎与沈、宋一样长于律体诗（主要是五律）。

高氏评郎士元云：

员外河岳英奇，人伦秀异，自家形国，遂拥大名。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自丞相已下，更出作牧，二公无诗祖钱，时论鄙之。两君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又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去鸟不知倦，远帆生暮愁；又萧条夜静边风吹，独倚营门向秋月，可以齐衡古人，掩映时辈。又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古谓谢朓工于发端，比之于今，有惭沮矣。

认为郎士元可与钱起并驾齐驱，都是王维以后的杰出诗人。指出两人诗歌体调大致相同。所举五言“荒城背流水”等三联，均工于写景抒情，与钱起评语中所举佳句，风味亦相近。所举七言“萧条夜静”两句，则是写边塞风光与军人情绪。

高氏评皇甫冉云：

冉诗巧于文字，发调新奇，远出情外。然而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与闭门白日晚，倚杖青山暮；及远山重叠见，芳草浅深生；岸草知春晚，沙禽好夜惊；又燕知社日辞巢去，菊为重阳冒雨开，可以雄视潘、张，平揖沈、谢。又《巫山诗》终篇奇丽，自晋、宋、齐、梁、陈、隋以来，采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使前贤失步，后辈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长轡未骋，芳兰早凋，悲夫！

高氏评钱起为“体格新奇”，评皇甫冉为“发调新奇”，均以新奇许之。所举“云藏神女馆”等五联，均着重写景，文辞新巧。西晋潘岳、张协，南齐沈约、谢朓之诗，均长于写景抒情，故此处评为“可以雄视潘、张，平揖沈、谢。”《巫山高》原为乐府旧题，前人多有制作。高氏对皇甫冉的《巫山高》一诗特为推重，认为“终篇奇丽”，“独获骊珠”。全诗也着重写景：

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霄中。

高氏对李嘉祐、刘长卿两家的摘句，也重在写景：

评李嘉祐：“如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又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

评刘长卿：“如草色加湖绿，松声小雨寒，又沙鸥惊小吏，湖色上高枝；又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截长补短，盖丝之颢欬！”

其余各家评语中引用此类写景秀句，其例尚多，此处不备举。

从上面的引文和分析，结合《中兴集》选录的作品，大致上可以看出此书选录标准的主导倾向。

从选篇、摘句看，高仲武最欣赏、推重的是那些写景抒情构思新颖、语言清丽奇巧、对偶工致的诗篇。这类诗篇，《中兴集》选得数量最多、

摘句赞赏的也最多。大历时代的不少著名诗人，长于写景，蔚为风气。皎然《诗式》卷四有云：“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可知皇甫冉、刘长卿等诗人，以描摹江南秀丽的自然风光为能事。其实当时身处北方的诗人，也崇尚写景，许多动人的写景诗篇或秀句往往是在长安写的。大历诗人，写了许多亲朋好友间或朝廷社交活动中酬赠、送别的诗。上引《中兴集》郎士元评语中曾述及当时朝廷大臣出为地方长官，以有钱起、郎士元两人的祖饯诗为荣，即可见当时风尚。《中兴集》选录此类酬赠、送别诗颇多，对钱、郎两家诗人大力推崇，说明编者对这类题材的诗具有好感。再则，《中兴集》在评语中摘录的写景佳句，往往见于酬赠、送别诗篇。如钱起的“长乐钟声花外尽”一联，见于《阙下赠裴舍人》诗；郎士元的“暮蝉不可听”、“荒城背流水”二联，见于《别郑谿》诗；皇甫冉的“远山重叠见”一联，见于《酬袁补阙中天寺见寄》，又“岸草识春晚”一联，见于《送林员外往江南》；李嘉祐的“野渡花争发”一联，见于《送王牧吉州谒使君叔》，又“朝霞晴作雨”一联，见于《仲夏江阴官舍寄裴明府》；刘长卿的“细雨湿衣看不见”一联，见于《送郎士元》，等等。酬赠、送别诗的思想内容是广泛的，它们可以表现诗人对国事民生的看法和愤激情绪，李白、杜甫的一部分诗篇便是这样。《中兴集》所选的酬赠、送别诗，则大体上是从容闲雅的和平之音，于叙述友谊中描摹山水风光，故多写景佳句。高仲武就是欣赏这样的和平之音，他称赞郎士元诗“稍更闲雅”，道出了他审美趣味的关键。高氏在盛唐诗人中最推崇王维，誉为文章宗伯，认为王维死后钱起、郎士元两家最为特出。王维的诗，也多酬赠、送别题材，擅长写景，多从容闲雅之音。由此更可以看出高仲武特别欣赏的诗歌流派。按《诗经·小雅》首篇《鹿鸣》为燕乐嘉宾之诗，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诵后世。因此，《中兴集》所赞赏的那些从容闲雅的酬赠、送别诗，不但语言风格很清雅，从思想内容讲，也是符合于风雅之旨的。这类酬赠、送别篇章，多抒情写景内容，构思新颖，语言清丽工巧，多写景佳句，从高仲武看来，正是符合于他所标举的“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标准。

从诗歌样式看，高仲武最欣赏、重视五言律

诗。高氏在序文中自称选诗以五言为主，“七言附之”。在五言诗中，以五言律诗（包括一部分排律）选得最多，五古次之。评语中摘录的佳句，大抵出于五律。从大历多数人创作的实际情况看，也确是五言诗写得最多，中以五言八句的律诗写得最为工巧，五律可说是大历多数诗人得心应手、佳作最多的诗歌样式。五言诗句式较七言诗稍短，节奏比较安详，不似七言诗那样流畅奔放，它便于表现从容闲雅之情。大历诗人多采用五律这一诗歌样式，和他们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相当和谐吻合的。南朝中后期，诗歌因受声律论影响，有所发展变化，产生了新体诗，到初唐进一步调谐平仄，注意粘对，便完成了律诗（以五律为主）。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都是完成五律的能手。律诗崇尚对偶、辞藻、声律之美，深受当时士林欢迎，作者纷纷，盛唐时代的王维、孟浩然、杜甫等都擅长五言律诗。再加上唐朝以诗赋取士，应进士科考试的必须写作五言十二句的律诗；因此，五律更广泛受到士人们的重视，平时注意琢磨锻炼，谋求考场的胜利。从唐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也可以看出五律的盛行情况。前于《中兴集》的芮挺章的《国秀集》，后于《中兴集》的令狐楚的《御览诗》，姚合的《极玄集》，均以五律选得最多（《御览诗》七绝选得也多），这可以帮助说明五律风靡当时的情状。可以说，在唐代前期、中期，五律是最广泛流行的一种样式。《中兴集》不重视七言诗，所选少数七言诗处于附庸地位。《国秀集序》对“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的七言诗表示不满。这都说明从初唐到大历年间，人们更重视五言诗，五言诗较七言诗具有优势，在诗坛占据着主导地位。

王维的诗，在盛唐时享有盛名。《旧唐书·王维传》称他“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诗”。王维死后，代宗令其弟王缙进呈其诗文集，王缙奉命进呈后，代宗有批答手勅给王缙，有云：“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编，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对其诗作了高度赞扬。称王维为“天下文宗”，当即为《中兴集》中“文宗右丞”一语所本。殷璠《河岳英灵集叙》提及盛唐诗人，首推王维、王昌龄、储光羲三人。杜甫《解闷》诗称王维有“最传秀句囊区满”之句。王维五、七言诗都写得很好，但五言诗写得更多，更有代表性。他写了不少应

制、奉和、酬赠、送别的诗。擅长写景，描摹细致工巧。其少数诗作也相当雄壮，但大多数篇章则显得安详闲雅。殷璠评其诗云：“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道出了其诗格调高雅、构思新颖、语言秀美的特征。大历诗人钱起、郎士元等继承了王维诗的主要特征，可说形成了一个“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诗歌流派。这派诗人的作品，在构思造句的新巧秀美方面，成就突出，较之王维诗有所发展。其缺点则为风格偏于柔弱。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序例》论五律时有云：“大历诸子，实始争工字句，然隽不伤炼，巧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耐人吟讽。”这是称道其优点。明胡应麟《诗数》评排律有云：“钱（起）、刘（长卿）以降，篇什虽盛，气骨顿衰。”（《诗数》内编卷四）则是指出其诗风柔弱而缺少俊爽刚健的风骨。《四库提要》评钱起诗有云：“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起与郎士元其称首也。然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钱仲文集提要》）这是兼具褒贬，而着重在贬抑的。要之，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历诗人，心理状态、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像盛唐不少诗人那样具有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而是像王维后期那样追求和平宁静。他们的作品，也缺少盛唐诗那种雄浑开阔的风貌，而趋向清雅婉丽，五言律正适宜表现此种风格特征。《中兴集》着重选录钱起、郎士元、皇甫冉诸人之诗，备加赞美，可说是这一流派的积极支持者和吹鼓手。至唐后期，姚合编《极玄集》，开头选盛唐王维、祖咏两家诗，以下所选十九人均为大历诗人，选篇多者（五首以上）为耿湓、司空曙、钱起、郎士元、皇甫冉、刘长卿、戴叔伦诸家。样式也以五律为主。它可说是继《中兴集》之后，着重选录该流派诗歌的总集。《极玄集》首列王维诗，也与高仲武认为钱、郎上继王维之见相同。

以上所介绍分析的，是以钱起、郎士元为代表的大历主要诗人的创作倾向和《中兴集》选录诗篇的主导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兴集》也选录了少量反映政治社会状况、对国事民生有所讽兴的作品。卷上选了苏涣的《变体律诗》三首，其一言天地不言成化，其二言锄奸困难，其三言世路艰难，对政治社会现象都有所讽喻。评

语称道苏涣《变体律》云：“其文意长于讽刺，亦有陈拾遗（陈子昂）一鳞片甲，故善之。”认为其诗继承了陈子昂的传统。苏涣后随岭南裨将哥舒晃叛乱被杀，高仲武为之辩解，认为可据“善恶必书”、“明言不废”的古训录其诗。在下卷，《中兴集》选录了张继、孟云卿、刘湾三人少数富有社会意义的诗作。于张继，选录了反映安史乱后社会动乱、民生残破的《送邹判官往陈留》诗，并摘句赞美云：“如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可谓事理双切。又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比兴深矣。”于孟云卿，选了其《伤时》诗，并评云：“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词意伤怨。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即出《伤时》），方于《七哀》‘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则云卿之句深矣。”于刘湾，选了反映战士痛苦和大量牺牲的《出塞曲》、《云南曲》，并评云：“性率多直，属文比事，尤得边塞之思。如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见《出塞曲》），悲而且许。”凡此，都可以见出高仲武对反映国事民生、富有社会意义的诗篇，给予一定的关心。这类诗篇，的确如《中兴间气集序》所说，可以“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但从选篇的数量看，从评语的分寸看，高仲武对这类诗篇的赞赏和肯定，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远远不能同对钱起、郎士元等人的选篇、评价相比。

高仲武论诗，还多次使用了比兴、讽兴、兴用等概念。它们有时与国事民生相关，如上引评张继“火燎原犹热”等诗句，誉为“比兴深矣”，即是。有些则属诗人结合生活遭遇，托物兴喻，与国事民生没有直接联系。如评张众甫云：“工于兴喻，如不随淮海变，空负稻粱恩，尽陈谢之源。”评朱湾云：“诗体幽远，兴用洪深。……于咏物尤工。如受气何曾异，开花独自迟，所谓哀而不伤，国风之深者也。”均是其例。大致高仲武所谓比兴，含义较广，不像后来白居易提倡美刺比兴那样与时政得失、社会利弊密切相关。

高仲武重视诗歌对皇帝的忠心和礼貌。他评钱起有云：“又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见所选《东皋早春寄郎四校书》诗），则礼义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长名流，为后楷式。”选了于良史的《冬日野望》诗，中有句云：“北阙驰心极，南图尚旅游。”选了皇甫冉的《同杜相公对山僧作》诗，中有句云：“远心驰北阙，春兴寄东山。”选了郑丹的《玄宗皇帝挽歌》、《肃宗挽歌》各一首，评语有云：“献二帝两后挽歌三十首，词旨哀楚，得臣子

之致。”选了李嘉祐的《送韦员外端公宣慰劝农毕赴洪州》诗，有句云：“圣主临前殿，殷忧遣使臣。气迎天诏喜，恩发土膏春。”对皇帝进行了歌颂。从以上诸例，都可以看出高仲武受传统诗教的影响是相当深的。

《中兴间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均为缀有评语的唐人选唐诗中的重要总集。后世对《河岳集》大抵持肯定态度，对《中兴集》则褒贬不一。晚唐郑谷《读前集》诗云：“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问气未公心。”郑谷没有说明《中兴集》品题不公的具体事例，但此书品评确有不公允处，较突出的例子是对刘长卿的评价。刘长卿在大历诗人中成就卓越，与钱起同为该时期诗坛的杰出代表。《中兴集》于刘氏贬语较多，有“诗体虽不新奇”、“思锐才窄”、“裁长补短、盖丝之颡”等语，评价在钱起、郎士元、皇甫冉之下，选篇数量也少于上述三家。《中兴集》于刘长卿人品亦表不满，评云：“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其后辛文房《唐才子传》改云：“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持论较合情合理。清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评《中兴集》云：“中兴高步属钱郎，拈得维摩一瓣香。不解雌黄高仲武，长城何意贬文房。”刘长卿字文房，曾自诩其诗为“五言长城”。王士禛此诗似是受郑谷《读前集》诗影响，沿袭其批评高仲武品题未公之论，而加以推阐说明者。《四库提要》卷一八六评《中兴集》有云：“其谓刘长卿十首以后，语意略同，落句尤甚，鉴别特精。”这说明《中兴集》评刘长卿有中肯处，但从总体看，它对刘长卿评价偏低，则是显然的。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六亦云：“且中唐虽称钱刘，而钱实逊刘。郎士元、皇甫诸君，抑又次之。仲武进钱、郎、皇甫而独抑刘，背戾滋甚。”可见对刘长卿的贬抑，实是《中兴集》评价失误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

陆游《跋中兴间气集》对高氏此书颇为不满，有云：“评品多妄，盖浅丈夫耳。”又讥其“议论凡鄙。”（见《渭南文集》卷二七）其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评为“议论文辞皆凡鄙”，当即是推衍陆游的看法。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则称道《中兴集》“每人冠以小序，鉴公衡平。”陆、陈讥斥，遵王褒扬，语皆笼统，毁誉均嫌过份。比较说来，还是明胡震亨的见解公允通达。胡氏《唐音癸签》卷三一论唐人选唐诗时云：

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声病为拘，独取风骨。高渤海历诋《英华》、《玉台》、《珠英》三选，并誉璠《丹阳》之狭于收，似又专主韵调。姚监（姚合）因之，颇与高合，大指并较殷为殊。详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矫前撰为之说者，然亦非其好为异若此。诗自萧氏选后，艳藻日富，律体因开，非专重风骨裁甄，将何净涤余疵，肇成一代雅体？逮乎肄习既一，多乃微贱，自复华硕谢旺，闲婉代兴，不得不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衡韵调为去取，此《间气》与《极玄》视《英灵》所载，各一选法，虽体气斤两，大难相追，亦时运为之，非高、姚两氏过也。观当日诡异寝盛，晚调将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变之中，先型仍复不失，则斤量殷氏律令，其相矫实用相教尔。……

胡震亨指出，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为了扭转梁陈以来藻艳的诗风，故提倡风骨。等到盛唐诗人崇尚风骨的诗风流行既久，作者又思有所创新变化，因此《中兴》、《极玄》二集，转而以闲婉、情致、韵调为品评选录标准。《中兴》、《极玄》二集与《河岳集》评选标准的不同，正是反映了两个时代文人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创作风尚。但它们都重视雅体，反对诡异诗风，则又是一致的。胡震亨一生搜集、研究唐诗，编有《唐音统签》，对唐诗流变非常熟悉，能结合诗坛创作风尚的变化来说明总集评选标准的变化，故持论深入通达而具有说服力。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斯翰

· 语言 ·

数百年来粤方言韵母的发展

李新魁

粤方言一般又称广州方言。它的语音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形成现代广州音系。广州音演变的确切年代，由于受材料限制，较难确指。但可以用反映中古汉语共同语的《切韵》或《广韵》音系作为参照点来考察它在中古以后的变化。当然，由于《切韵》音系不是粤语音系的直接祖先，粤语的某些语音特点可能比《切韵》音更早，但是，由于粤方言中古后受共同语影响相当巨大，所以通过与《切韵》音系比较，还是可以约略看出广州音的发展大势的。

粤语语音与现代汉语共同语及中古音的差异，表现在声、韵、调各方面。相对于其他方言来说，粤语的韵母系统更接近中古共同语的音系。但这并不是说，粤语的韵母系统变化不大。它的变化在各个次方言点还是相当大的，彼此的歧异也相当突出。只是对于其他方言来说，变化

稍为小一些、更接近中古音。有人认为，现代各方言中，吴方言在声母上较能反映中古音系，粤方言在韵母上较能反映中古音系。所以，在粤方言声、韵、调的历史研究中，韵母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 介音的演变

粤语的介音，与汉语共同语或其他方言有颇大差异。就粤语的标准音广州音来说，没有介音存在：既没*l*介音，也没*u*介音或*y*介音。我们认为，上古汉语本来也是没有介音的。中古的*l*介音和*u*介音是上古的舌面化声母（用*l*表示，如*pl*、*tj*、*kj*）和圆唇化声母（用*w*表示，如*pw*、*kw*等）促生来的（详细论述参阅拙著《汉语音韵学》）。广州的郊区如白云区许多村镇则多有*l*介音。可以说，从广州郊区的语音状况看，较早期的广州

话已产生了i介音,它也是舌面化声母促生来的。广州以外的其他县市,如台山、江门、恩平、开平、花县、三水、高明、从化、东莞等地,都有i介音。这些情况表明,唐宋以来的粤语已产生i介音。在中古以后的发展中,这个i介音有的保存,有的消失,有的则演变为主要元音。

中古以前的圆唇化声母,在粤语中,除某些地方演变为u介音之外,许多方言点仍处于圆唇化声母的阶段,元音性的u介音尚未出现。由于没有u介音,共同语中由l与u介音复合而成的y介音在粤语里也就不存在。当然,个别地方由于w已化为u,i介音也已形成,两者结合成y介音的情况也有,如鹤山“靴”念为hy⁰。

近代粤语i介音变化的结果是i介音失落和i介音主元音化,实际上是同一个演变过程的两种不同表现。

(一) i介音主元音化

较早期的粤语,由舌面化声母促生而来的i介音在三等韵中保存着,而且四等韵也从原来的不带i介音逐渐产生i介音而与三等韵合流。现代粤语各方言点,三等韵字与四等韵字绝大多数已混然无别,可知两者之混,在较早的年代(如宋元)便已发生。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三四等韵的i介音,促使后面的主元音发音逐渐高化,主元音的舌位与i介音逐渐接近,原来的主元音不断弱化,i介音不断加强,终于上升为主元音,原来的主元音被吞没。如宵萧韵ieu、仙元先韵ien/t(本文谈及阳声韵时,一般兼赅相应的入声韵,如仙韵兼赅薛韵iet,以斜线后的t表示)和盐严添韵iem/p等韵的挑、条、消、尿、聊、标、飘、朝、超、兆、骄、乔(宵萧)、仙、煎、浅、面、连、编、扁(仙元先)、敛、尖、歼、潜、渐、脸、严(盐严添)等字,在白云区的人和镇(鸦湖)念ieu、ien、iem,与人和相邻的、略近广州市区的龙归则念ieu、ien、iem,主元音的舌位变高了;而更加接近广州市区的石井、新市以及钟落潭、竹料、太和、江村等地,则念iu、in、im,中间的e元音消失,i上升为主要元音的地位。这些字读音的演变过程是:

ieu → ieu → i⁰u → iu

ien/t → ien/t → i⁰n/t → in/t

iem/p → iem/p → i⁰m/p → im/p

白云区各村镇这些韵母的差异,同样存在于粤语区较大范围的各县市之间。如宵萧韵字,台

山、江门等地念iau,i介音仍然存在,而且主元音舌位较低。其他地方则多念iu,主元音弱化以至消失,i上升为主元音。仙元先韵字在恩平话中念ian/t,而其他县市则多念in/t;台山把盐严添韵字占陕闪淹添等念为iam,开平念为em,恩平念为i⁰m,其他地方多念为im,这些不同读法也都反映了iem → i⁰m → im的过程。

上述情况显示,广州市区周围地域与老市区①的远近跟语音的渐变情况相一致:远端的方言点i介音比较明显,而近端的则逐渐消失。这种现象较合理的解释应是离广州老市区远一点的“乡下”话保存古音特点更多一些。在后代的发展中,越接近广州,其语音就越接近于老市区现时的状态。老市区以i为主元音的韵母,是由i介音逐渐演变来的。

(二) i介音的失落

粤语i介音消变的另一种情况,是i的失落,主元音仍然保存。这主要发生在麻三、庚三、清、青、蒸以及戈三、阳韵。

麻韵三等字在宋代的中原共同语中省读为ia,到南宋时已出现ia → ie的变化。因此,元代的《中原音韵》从家麻韵中分化出一个车遮韵,其韵值就是ie。粤语本韵字的演变,有与中原共同语相近的过程。麻三韵字有许多地方保持念ia,如开平、恩平、东莞、从化及白云区的人和等地姐、借、且、些、写、斜、者、车、蛇、射、社、野、夜等字都念ia,保存较古的读音;花县、三水、高明、台山及龙归等地则念ie;而广州老市区、江村、新市等地则和佛山、南海、增城等处一样念e。本韵读音的演变可以表示如下:

ia → ie → i⁰e → e

这个变化,是介音i不断弱化的结果。ie在变为e的过程中,i介音减弱以至消失,结果,主元音从a发展到e就停止前进了(普通话则再从e变到y)。广州市近郊的读音,从人和ia → 龙归ie → 江村e,正反映了这个韵母读音变化的一般过程。

庚三韵字与麻三是一个平行的韵,它在中古也读iaŋ,后来在i介音的影响下,主元音高化变为e而念成ieŋ。清韵在中古属三等,本来就念ieŋ,青韵属四等韵,在宋元时代便与清韵合流。当庚三韵字念ieŋ之后,遂与清韵同音。相应的入声韵陌三、昔、锡韵字也混读为iek,庚三清青及陌三昔锡诸韵字在广州近郊有与麻三平行

的变化:

韵部		地区		人和、太和、石井	黄埔(夏园)	钟落潭、江村、东圃、新滘
		例	字			
庚三	柄饼					
清	病顶			laŋ/ki	leŋ/k	ɛŋ/k
青	听艇					
	井郊					

麻三与庚三清青等韵字的变化, l 介音在整个音节中弱化以至消失, 使音节变成 ϵ 、 $\epsilon\eta/k$, 这与前述 l 介音上升为主元音的情况不同, 其变化产生两种分歧:

A: leu 、 len/t 、 iem/p → ieu 等 → $i'u$ 等
→ lu 等

B: le 、 $le\eta/k$ → ie 等 → ϵ 等

前者是主元音弱化的结果, 后者是 l 介音弱化的结果。

戈三韵及三等的阳药韵也是一组平行的韵。戈三在中古共同语一般可拟为 io , 阳药韵拟为 $io\eta/k$, 主元音都是圆唇元音。这些音也是粤语较早期的音, 但粤语在后来的发展中, l 介音促使 o 元音的舌位前移并略为高化念为 ϵ , 而 ϵ 是圆唇元音, l 受其影响成了圆唇的介音而融入 ϵ 音之中, 结果消失了。戈三韵字从 io 变成 $y\epsilon$ 再变成 ϵ , 阳药韵字从 $io\eta/k$ 变成 $y\epsilon\eta/k$ 再变成 $\epsilon\eta/k$ 。如人和、太和、钟落潭、江村等地和老市区把戈三韵的“靴”字念为 $h\epsilon$, 而龙归则念为 hy , 保持 o 元音不变, 但介音却受圆唇元音的影响而变成 y , 这是介音“融入”主元音的前奏, 再进一步发展, y 音消失而念成 ϵ (戈三的开口韵字“茄”在粤语中与麻三的变化一致, 念为 ϵ)。阳韵的章、精、知组字枪、墙、相、长、丈、章、昌、商、常等, 老市区与近郊各地读音的差异较大, 共有五种读法: 石井等地念 $io\eta$, 保存中古读音; 人和则读 $y\epsilon\eta$, 龙归读 $\epsilon\eta$, l 介音被主元音同化为圆唇介音; 文冲、新滘等地则失去介音读 $\epsilon\eta$; 钟落潭等地和老市区念 $\epsilon\eta$, 介音使主元音前移, 自身却失落。本韵的来母字, 在人和念 $uo\eta$, l 介音被主元音同化为圆唇的 u , 并且发音部位后移。 $uo\eta$ (来母字) 与 $y\epsilon\eta$ (章知组字) 是舌位两种不同方向的变化。本韵的庄组字, 人

和、江村各点都念 $uo\eta$, 失去 l 介音。喉、牙音字羌、强、香等除石井仍读 $io\eta$ 外, 人和、龙归都变成 $uo\eta$, l 介音已变为 u 了。戈三和阳韵字的变化过程, 可用公式表示为:

$$io/\eta \rightarrow y\epsilon/\eta \rightarrow y\epsilon\eta \rightarrow \epsilon\eta$$

$$\rightarrow uo/\eta \rightarrow u\epsilon\eta \rightarrow \epsilon\eta$$

$$\rightarrow \epsilon\epsilon/\eta$$

各地对这两韵的不同读法, 正反映了这些变化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结果。

总之, 粤语 l 介音的演变, 形成了两种情形: 介音主元音化, 这是 l 介音完全上升为主元音, 是变化的终极; 介音的失落, 则是发展的中间阶段, 由于 l 介音的弱化以至消失, 使主元音没能高化至 i 元音的地步, 在 ϵ 、 ϵ (或 o 、 ϵ) 元音的发音位置上停留下来。这两种情形在不同的方言点或相同方言点的相同韵母的变化中同时存在。不同方言点有的读 ieu 等, 有的读 eu 等; 同一方言点的同一韵母字有的字读 ieu 等, 有的读 eu 等。这便形成宵萧、仙元先、盐严添、麻三、庚三清青、戈三、阳等各韵 (及相应的入声韵) 的字有不同读音, 一是以 l 为主元音, 一是 l 介音失落而以 ϵ 、 ϵ 或 o 、 ϵ 为主元音。

二 主元音的发展

粤语主元音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三方面。

(一) 主元音高化

这方面的变化涉及麻三、哈灰和桓韵。麻韵三等字遮、车、奢、社等, 中古读 ia , 后来 a 在 l 介音影响下变成 ϵ 念 ie , ie 又进而失去 l 介音读成 ϵ 。

哈韵字台、待、耐、灾、菜、才、在等老市区念 oi , 可以说是中古这类韵母字的读音 (哈韵大概较早地从 δi → oi)。但有些粤方言点主元音高化, 产生了 oi → oi → ui 的过程。如上举这些哈韵字在文冲念 ui , 黄埔夏园则念 ui 。粤语区各县市读音与此相似。香港、澳门、番禺、花县、从化、增城、佛山、顺德、三水、中山、珠海、斗门、江门、台山、开平等地都与老市区一样念 oi , 而高明、新会、东莞等地则读 ui 。灰韵的唇音字杯、背、配、培、陪、裴、倍、佩、梅、媒、每、妹等, 老市区、近郊钟落潭、江村等地及许多县市都念 ui , 这是 oi 高化的结果。近郊的人和及台山、开平等地保存本音 oi , 这反映了那些读 ui 的方言点也是从 oi 变到 ui 的。

泰韵的唇音字贝、沛等也如此。近郊小洲念

ɔi, 人和读 oi, 广州市其他地方读 ui。泰韵的其他声母字蔡、盖、害等, 老市区及龙归、江村等地念ɔi, 而人和念 oi, 黄埔一些地方念 ui。这些歧异反映了 ɔi → oi → ui 的发展过程, 主元音呈高化趋势。

桓韵字与灰韵字有平行变化。其见组字官、棺、冠、观等在近郊人和、太和及从化、台山等地都保持中古音ɔn, 但老市区、钟落潭、竹料、太和、江村及一些县市则变为 un。从ɔn到un, 主元音舌位高化了。桓韵的唇音字般、盘、潘、瞞等, 人和、龙归及台山、江门、鹤山等地仍读ɔn, 而老市区、钟落潭、竹料、太和、江村和其他各县ɔn变成了 un。顺德则un、ɔn新旧音并存。

桓韵的舌齿音字断、短、段、团、暖、乱、钻、算等, 变化过程较唇、牙、喉音字复杂。这些字老市区念 yn, 是从较古的ɔn高化来的。台山、鹤山等地仍念ɔn, 广西毛难语的粤语老借词“乱算”等念on, 新会、斗门等县则进一步高化为un。有的地方元音前移并略高化成æn, 如人和; 有的再高化为θn, 如龙归; 有的则变为yn, 如钟落潭、竹料、太和、江村、新滘等地。其变化如公式:

$$\begin{array}{l} \text{ɔn} \longrightarrow \text{on} \longrightarrow \text{un} \\ \longrightarrow \text{æn} \longrightarrow \text{θn} \longrightarrow \text{yn} \end{array}$$

一是元音舌位一直在后部, 一是舌位前移, 而两者都有舌位高化现象。

(二) 主元音圆唇化

粤语语音系统的发展过程, 主元音圆唇化主要表现在一等韵泰、豪、寒诸韵。这些韵类在中古的主元音一般认为是后元音ɑ, 而在粤语的发展中, 圆唇化不断增强, 许多方言点今读圆唇元音。它们的演变路线相当一致:

$$\begin{array}{l} \text{泰韵} \quad \text{ai} \longrightarrow \text{ɔi} \longrightarrow \text{oi} \longrightarrow \text{ui} \\ \text{豪韵} \quad \text{au} \longrightarrow \text{ɔu} \longrightarrow \text{ou} \\ \text{寒韵} \quad \text{an} \longrightarrow \text{ɔn} \longrightarrow \text{on} \longrightarrow \text{un} \\ \longrightarrow \text{æn} \longrightarrow \text{yn} \end{array}$$

泰韵字蔡、盖、害等中古念ai, 现代粤语念ɔi, ɑ圆唇化为ɔ, 其唇音字贝、沛等高化为ui(人和、新滘保持读oi)。豪韵字保、袍、毛、刀、讨、桃、老、遭、曹、早、草等本读au, 今保留在近郊的人和、龙归、钟落潭及其他县市如花县、台山、江门、恩平、东莞等地, 老市区及佛山、南海、三水、顺德、增城等地则念ou, 是ou韵中ɑ圆唇化的结果。

广州近郊一些地方豪韵字有au与ou两读, 如

人和、龙归、太和、江村、钟落潭、竹料等地, 念au的多是说话音或老年人音, 念ou的多是读书音或青少年人音。看来ou是au后起的变化, au、ou两读, 表明本韵发展处于过渡状态。

寒韵本读an, 其舌齿音字丹、单、滩、坦等念an(或an), 而牙、喉音干、肝、看、刊等字在老市区、钟落潭、龙归、江村、石井等地变为ɔn, 近郊另一些地方如东圃、新滘及新会、斗门、东莞等县市读un, 人和读θn, 太和读yn。其演变公式是:

$$\begin{array}{l} \text{an} \longrightarrow \text{an} \longrightarrow \text{æn} \longrightarrow \text{en} \text{ (舌齿音)} \\ \longrightarrow \text{ɔn} \longrightarrow \text{on} \longrightarrow \text{un} \text{ (牙喉音)} \\ \longrightarrow \text{æn} \longrightarrow \text{θn} \longrightarrow \text{yn} \end{array}$$

舌齿音字因受声母制约, 仍为非圆唇元音, 而牙、喉音字因声母发音部位较后, 促使a元音发音部位后移并圆唇化。

(三) 主元音ɐ音化

央元音ɐ舌位较æ、e、a略后而较ə略低, 比ɔ舌位靠前。它在现代广州话形成与a相对的一组元音韵母。a的舌位较前较低, ɐ的舌位较后较高, ɐ较a为短, 因此有人认为广州音有长、短元音的对立, 主要是指a——ɐ而言的。

a与ɐ的对立, 就现代粤语来说, 当然是一个鲜明特点。但要进一步考查这个ɐ的历史, 则有赖于粤语区各方言点的对比研究, 从中推导出大致的结论。

我们认为, 粤语ɐ元音有较长历史, 宋代便已出现。如《通俗编》引《水东日记》说:“广东人相传: 宋嘉定中, 有房布衣者, ……广人口音称赖布衣云。”房字在《广韵》属祭韵字, 力制切, 宋时北方话已读为l韵母, 但当时广州人把它读成“赖”。现代粤语音“房”与“赖”很相近(赖lai, 房lei)。可以推知宋时房字已念lei(北方人听来与“赖”字音近), 主元音已经是ɐ。

但粤语在古代虽有以ɐ元音为韵母的音节, 为数却不多。现代粤语许多带ɐ元音的音节是后代从别的元音转化来的。现代粤语ɐ元音的来源, 可归纳为三个。

1. 从e元音变来, 这包括下列韵母:

$$\begin{array}{l} \text{齐祭韵} \quad \text{iei} \longrightarrow \text{ei} \longrightarrow \text{ɐi} \\ \text{支脂微(合口)韵} \quad \text{wiei} \longrightarrow \text{wei} \longrightarrow \text{wɐi} \\ \text{真殷韵} \quad \text{ien} \longrightarrow \text{ɐn} \\ \text{侵韵} \quad \text{iem} \longrightarrow \text{ɐm} \\ \text{庚三韵} \quad \text{ieŋ} \longrightarrow \text{ieŋ} \longrightarrow \text{ɐŋ} \end{array}$$

蒸韵 $leŋ \rightarrow \thetaŋ$

中古三等韵祭韵本读 lei ，四等齐韵读 $eɪ$ 。后来，四等韵产生 l 介音而与祭韵合流为 lei 。在广州音中， lei 韵母失去 l 介音变为 $eɪ$ ，人和、江村、钟落潭、竹料等地这两韵的蔽、厉、批、砌等念 $eɪ$ ，这个 $eɪ$ 又进一步变为 $\thetaɪ$ ，如例、祭、世、势、逝等和上举蔽、厉等字，老市区及其他一些地方都念成 $\thetaɪ$ 。 $eɪ$ 变为 $\thetaɪ$ ，年代起码在明中叶前。明人方以智《通雅》说：“广人呼蹄为台。”（卷三十四）表明祭齐韵字已近 $aɪ$ ，实为 $\thetaɪ$ 。

三等支脂之微韵，而较早的年代就念 $ɪ$ ，其合口字（之韵无合口）念 $ʷɪ$ 。粤语中 $ɪ$ 变为 $eɪ$ （这是韵尾“繁衍化”现象，说见下文）， $ʷɪ$ 变为 $ʷeɪ$ 。后来， $ʷeɪ$ 的喉、牙音字规、亏、跪、毁、龟、轨、愧、季、遑、柜等进而变为 $ʷ\thetaɪ$ ，也出现主元音 e 变为 θ 的现象。人和、龙归、新滘、东圃、文冲等地念 $ʷeɪ$ ，而钟落潭、竹料、太和、江村及老市区念 $ʷ\thetaɪ$ 。 $eɪ$ 比 $\thetaɪ$ 早。

真（臻）、殷、侵、蒸各韵字，中古可能念 len 、 lem 、 $leŋ$ 等。这些韵字在粤语较早失去 l 介音而变为 en 、 em 、 $eŋ$ ，后来进而变为 θn 、 θm 、 $\theta ŋ$ 。真（臻）韵字真、衬、诊、神、身、辰、巾、紧等字，恩平念 len （或 lan ），新会念 $\text{æ}n$ ，开平念 en ，其他各县市多念 θn 。侵韵字侵、心、寻、沈、针、甚、今、锦等，恩平念 lem （或 lam ），新会念 $\text{æ}m$ 和 $\text{æ}m$ ，开平念 em ，其他各地念 θm 。蒸韵字冰、陵、蒸、证、澄、称、乘、绳等本念 $leŋ$ ，后代 l 介音消失变为 $eŋ$ ，如钟落潭、竹料、江村、新市及老市区；有的地方如人和、太和、龙归、石井、东圃、文冲、新滘、小洲等地变为 $\theta ŋ$ 。庚三韵字本念 $leŋ$ ，后来元音高化为 i 而 $leŋ$ 而与蒸韵字读音相同，这与蒸韵的变化过程相似。丙、平、明、京、卿、聘等字，老市区及其他一些方言点念 $eŋ$ ，而人和、太和、文冲、小洲各地变为 $\theta ŋ$ ，有的地方则 $eŋ$ 、 $\theta ŋ$ 两读。这几个韵都是从 e 变为 θ 。

2. 从 a 元音变来，这主要是一等的痕韵和登韵。它们在中古本读 an 和 $aŋ$ 。随着粤方言的发展， an 、 $aŋ$ 变成了 θn 、 $\theta ŋ$ 痕韵字根、恩、颀、很、恩等，人和读 en 或 θn ，其他地方多读 θn ；登韵字登、等、腾、邓、能、曾、层、赠、肯、恆等，花县、高明等县念 $aŋ$ ，表现了较早的读音，从化、东莞及近郊钟落潭、竹料、江村等地念 $eŋ$ ，而其他地方如人和、太和、龙归、石井、东圃、黄埔、新滘、小洲等地读 $\theta ŋ$ 。这两韵的演变公式是：

$an \rightarrow en (en) \rightarrow \theta n$

$aŋ \rightarrow eŋ (eŋ) \rightarrow \theta ŋ$

这个变化往往经过 e 的阶段，所以可与第1项合并。

3. 从圆唇元音 o 、 θ 、 u 等变来。这包括覃、谈韵的牙喉音字、侯尤韵字、魂文韵字、真淳韵字等。

一等覃谈韵中古读 am （覃、谈合流），但它们的牙喉音字甘、敢、酣、感、塔、坎、庵、暗等在粤语与寒韵字发生平行变化： $am \rightarrow om$ 。广州市近郊的芳村（龙溪）及佛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中山这些字都念 om 。虽然现代市区音这些字念 θm ，但一百年前东莞人王炳耀在《拼音字谱》描述的广州音，这些字仍标为 o^m 。可知现代的 θm 从 om 变来。

圆唇元音 o 变 θ 的还有侯、尤韵字。侯韵斗、透、头、豆、楼、走、勾、狗、口、寇、偶、侯、后、欧等本读 ou ，现代鹤山、江门此音没变，其他地方 ou 成了 θu 。尤韵纽、刘、酒、秋、修、秀、昼、丑、愁等字本带 l 介音念 lou 。有的地方失去 l 念 ou （如蚌湖、龙归），有的地方从 ou 再变为 θu （如钟落潭、竹料、太和、江村、黄埔、东圃、新滘及老市区）。

魂韵字本、盆、门等，多数地方保持本音念 un ，而舌齿音字敦、盾、嫩、论等，广州市及近郊区念 θn ，寸、存、孙、损等念 yn （这些都是舌位前移的结果），但这些字花县、从化等地念 θn 。圆唇的 u 或 θ 变为 θ 了。除舌齿音和唇音字外，本韵的喉牙音字为昆、滚、棍、困、昏、魂、温等，广州各地多念 θn ，这个 θ 也是 u 变来的。三等文韵字分、奋、芬、焚、文、闻、问、君、军、群、训、云、运等本带 l 介音，后介音消失，主元音从 u 变为 θ 而念 θn 或 θn 。

真韵字邻、秦、尽、信等舌齿音字，老市区念 θn ，是真韵本音 en 圆唇化的结果。市区之外各方言点多读 θn ，是圆唇元音 θ 的进一步变化。淳韵的伦、俊、荀、迅、准、春、盾、顺、纯等舌齿音字在广州各地也多念 θn ，如人和、钟落潭、太和、龙归、江村等地。这些字在竹料、小洲、黄埔、东圃等地主元音变为 θ ，中山、珠海、斗门、东莞等县市也如此。牙、喉音字均、匀、允、尹等，东莞、中山等地念 lun ，有的地方失去 l 介音念 un ，如台山、开平、恩平、鹤山等地，但更多方言点念 θn 。

这些字在中古为圆唇元音或声母有圆唇化作用，在近代粤语的发展中，多变成 θ 元音。其演变公式如下：

覃谈韵 $am \rightarrow om \rightarrow \theta m$ (牙、喉音)
侯韵 $ou \rightarrow \theta u$
尤韵 $iou \rightarrow \theta u$
魂韵 $un \rightarrow \theta n$ (唇、牙、喉音)
文韵 $iun \rightarrow \theta n$ (唇、牙、喉音)
真韵 $ien \rightarrow i\theta n \rightarrow \theta n$
諄韵 $i\theta n$ (iun) $\rightarrow \theta n$ (牙、喉音)

由此可知，现代粤方言许多带 θ 的韵母，相当一部分是圆唇元音变来的。这些从圆唇元音来的韵母中，也许有一些是经由 e 、 θ 再变为 θ 的。

三 韵尾的变化

韵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 -m韵尾的消变

中古汉语覃谈咸盐盐严凡侵添等韵类的-m韵尾在粤方言一直保持着。但现代粤语少数的古-m尾字，主要是凡韵的唇音字凡、泛、帆、范、犯等，由于唇音声母与韵尾的异化作用，-m变成了-n。在广西京语粤语老借词“帆”仍念 $bu\theta n$ 或 fam ，而广东境内只有东莞清溪、深圳沙头角这些受客家话影响较多的粤方言（或粤语化的客方言）仍为-m。至于东圃、文冲、黄埔（夏园）等地，这些字已从-n进一步变为-ŋ了。

(二) 韵尾的圆唇化

早期粤方言的阴声韵韵尾大概只有-i、-u两种，现代却出现了-y韵尾。这个圆唇的-y尾，是由-i尾变来的。它主要表现在灰韵、支脂祭韵合口字中。这些字本读 θi 、 ui 或 wi ，后来主元音变为 θ ，韵尾圆唇化为-y。如灰韵的堆、推、退、队、内、累、催、罪、碎、最等，人和、龙归、东圃、小洲等地念 θi ，保存较早期的读音；黄埔念 ui ，主元音高化。老市区及其他一些地方则变为 θy 。脂支韵合口音舌齿音字嘴、髓、吹、醉、类、帅等本念 $wie i$ ，后来主元音受合口的影响变成圆唇元音 θ ，而且介音消失，变为 $w\theta i$ ，新滘、东圃及花县、高明、合浦等地即如此。有的进而高化为 ui ，如黄埔及东莞、斗门、江门、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等地。但其他方言点则从 θi 、 ui 变成了 θy ，如老市区、人和、钟落潭、竹料、太和、江村、龙归及番禺、从化、佛山、顺德、三水、中山、珠海、香港、

澳门等地。祭韵的合口字脆、岁、缀、税、锐等与支脂韵字有相似的演变。

(三) 韵尾的繁衍

粤语的韵母有些是本念单元音不带韵尾的。但后来从单元音衍生出一个韵尾而变为双元音的复合韵母，有人也称之为单元音复元音化，即单元音韵母的两折化。这主要表现在三类韵母中：

1. $i \rightarrow ei$

这主要是支脂之微韵字，它们在较早的年代便念 i （中原共同语在宋代即念 i 音），广西毛难语的粤语老借词中，这些韵的某些字如里、比等念 i ，现代粤方言对 ts 组声母字紫、雌、此、斯、迟、师、子、慈等多念 i ，这是宋元以来读音的保留（共同语则从 $i \rightarrow i.ɿ$ ），但其声母字则从 $i \rightarrow ei$ ，产生了韵尾。这个韵尾的衍生，大概是因为 i 元音单念时，发音较长，舌位较低，导生出一个韵尾，念为复合元音 ie ，逐渐变成 ei 。臂、披、被、离、死、四、饥、寄、器、基、己、气、欺、其、技、你、理等字正是如此。老市区、人和、龙归、钟落潭、竹料、江村、石井、东圃及花县、增城、佛山、三水、斗门、江门、新会、开平、香港、澳门等地都读此音。但广州近郊的文冲、小洲及南海、顺德、中山、珠海、高明、鹤山、台山、恩平、东莞、合浦等地仍保持 i 不变。人和不但把这些字念 i ，连 ts 组字兹、子、字、司、思、似、寺、耻、持、士、事、使、史等也念 ei 了。

2. $u \rightarrow ou$

这主要表现在模韵字。本韵的布、普、蒲、步、捕、模、都、肚、土、吐、兔、徒、图、度、奴、卢、路、租、祖、醋、苏、素等字，中古之前念 θ ，后来变为 u 。早期粤语大概也念 u ，因为牙、喉音声母字姑、古、股、故、顾、枯、苦、虎、胡、户、护、乌、污、恶等字正念为 u ，而且从化、高明、中山、珠海、台山、开平、恩平、合浦、梧州、苍梧、贺县及广州近郊的文冲、小洲等地也把上举布、普等字念为 u ，而老市区及某些方言点却发生了元音的繁衍化，产生了-u韵尾，布、普等念 ou 。

3. $y \rightarrow \theta y$

这是三等鱼、虞韵字的变化。这两韵的徐、除、女、居、去、渠、巨、墟、取、区、具、趣、聚、须、拘、俱、句、驱等字本都念 y ，东圃、文冲、新滘、小洲等地读 y 正保留它的较早读

音，没有衍生出y韵尾。但老市区及人和、龙归、太和、钟落潭、竹料、江村、石井等地则念成θy，它是y音两折化的结果。鱼韵的知、章组字猪、诸、处、书、舒、暑、庶、汝等不发生这一变化，多数地方仍念y。

l→ei、u→ou、y→θy这三种变化，在各地方言中，大体是平行的。如广州近郊的东圃、文冲、小洲及其他的县市如中山、珠海、高明、鹤山、东莞、恩平、台山等地，不发生l→ei的变化，也就没有其它u→ou、y→θy的变化。相反，某些方言点有其中一种变化，也就有另外两种变化。这都是主元音两折化的结果，都是同一种形式的音变。

粤语韵母系统的发展，除上述各方面外，其他变化甚少。韵类系统中二等韵麻、皆、佳、犬、肴、山、删、庚、耕、江、衔、咸等韵，几乎没

什么变化。它们的主元音绝大多数是a，这是发音较稳定的元音。此外，一等韵的歌戈o、覃谈am、唐oŋ、东冬oŋ等，基本也没大的变化，它们的主元音a、o或o也较稳定。当然，有些地方这些韵母也有些变化，如东韵oŋ增城变为eŋ，但只是个别现象。可以说，中古的三等韵在粤方言变化较大，一、四等韵次之，二等韵变化最小。三等韵的变化，与i(和u)介音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①老市区指广州传统所辖的越秀、荔湾、东山、海珠四区。近年又将原郊区划归市区，增设白云、芳村、天河、黄埔四区称为近郊区。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语言 ·

一块闽方言的沃土

——从1988年泰华短篇小说金牌奖征文看到的

陈晓锦

1988年泰华短篇小说创作金牌奖征文初选入围的30篇文章，文辞独特，字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故土气息。作品中有大量地道的潮州方言词汇，潮州方言语法、修辞的表达方式。

先看词汇。词汇是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成份，语言的发展变化总是首先在词汇上反映出来，作品的潮州方言表达方式也集中表现在词汇上。其中，有一批表称呼的潮州话代词、名词，例如：

俺(咱们)⑤、医师(医生)、阿舍(少爷)、头家(老板)、红毛人(洋人)、红毛人大旅社(洋人开的旅店)、亚兄(阿哥)、大兄(大哥)、亚弟(阿弟)、细弟(小弟)、老姑(姑祖母)、老丈(姑祖父、姨祖父)孙仔(孙子)。

作品里有部分用品的叫法是潮州话：火船(轮船)、电单车(摩托车)、脚车(自行车)、车棚(车厢)、水布(潮汕地区男子干活时扎在腰间，可擦汗，又可作浴巾用的长布)、面巾(毛巾)、霜棚(电冰箱)。

某些食物的名称，包括颇有潮汕特色的食物，也是用潮州方言表示：功夫茶、大胜饼(豆沙和猪油做馅的饼)粿条(米粉条)，还有：青果(水果)、树茨(木薯)、葛兰菜(芥兰菜)、霜枝(冰棒)、霜糕(冰淇淋)。

作品里对一些身体各部位的叫法也是潮州话：命子(小命)、样相(样子、相貌)、声气(声音)、脚村(屁股)。

以上的潮州方言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人华侨身在海外，心系故土，保留着故乡的生活习俗，喝功夫茶，吃胜饼、粿条，扎水布，仍象

地道的潮汕人。另一方面，我们从中也可知泰国的气候水土。潮汕无冰雪，当地人冰霜不分，故有“霜枝、霜糕、霜榭”的叫法，泰国气候炎热，这些叫法当然也就依然在潮籍人大行其道。潮州人有称洋人为“红毛人”的习惯，就象北京人叫“老外”，广州人叫“鬼佬”一样，并不含恶意。华侨尽管出了国，照样以“红毛”称洋人，煞是有趣。

再看表示动作行为的潮州方言词语。“踏脚车”的“踏（踩）”，“做园圃”的“做（耕种）”，“出帖”的“出（发）”，“惊破胆”的“惊（吓）”，以及“积凑（蓄存、积存）、承顶（转让）、讨赚（赚钱）、过番（出国）、存有（剩下）、做便（做好）”等，都与普通话不相同。

在30篇入选征文里，还有一些生动形象的形容性潮州方言词语：真色水（真威风、真神气）、四散来（乱来）、哭父（糟糕，也表程度：很、极）、死绝（很、极、非常、十分）、激心（激气）、猛猛（赶快）、利息厚（利息多）、架势（派头、神气、威风）、俭生俭死（省吃俭用），等等。

只从字面上看，有时很难领悟这些词语丰富、幽默的内涵，我们不妨从话语中体会它们表现的意境。

小说《香饵》有这么一段话：“事体不好，听说信托公司要肿了，俺猛猛去支出来放进银行，王太太和珠姐早间已坐车去讨钱，我来通知你，俺二人猛猛来去呀。”信托公司“要肿了”（要完蛋了）一辈子辛苦换来的血汗钱眼看就要被呆吞了。文章连用两个“猛猛”（赶快），那种焦急的情状跃然纸上。《三代人的独白》里老唐伯说：“我来暹罗时，用二个‘龙银’坐火船，阿二来时，是坐小飞机，现在孙仔来过番，坐的是喷气机，真色水。”“真色水”三个字显示了老一辈辛劳换来的后代的神气。而《医不好的病》中患性病的那位老人的话：“常常流臭水，痒痒地，真哭父啊！”“真哭父”（真糟糕）三个字则把患者的痛苦焦虑显露无遗。

总结作品里的潮州话词汇，可知多是日常生活较常用的，也就是语言学上称之为“基本词汇”的那些词。基本词汇的生命力最强，使用频率也最高，所以华人、华侨虽然飘洋过海，有的已在海外繁衍了两、三代，但它们还是被继续沿袭使用。同时，也正因为它们离开祖国的时间有的已经相当长，故亦自然而然地保留了一些现在潮汕

地区的青年多已不讲，在老一辈人的口里才能听到的方言词，例如：火砵（碾米厂）、龙银（一种有龙纹的银元）、暹罗（泰国）、柴谷（卖谷子）、交书金（交书费）。再者，潮州话属于汉语闽方言，在30篇入选征文众多的潮语词里，有的就是通行于整个闽方言区的词语，“厝”（房子）、“火烧厝”（火灾），“劊”（杀）都是。看来，它们也通行于海外讲闽方言的华人、华侨中。

语言最稳固最本质的部分是语法，汉语各方言在语法上的差异相对于语音、词汇来说较小，但也有不少与普通话语法迥然不同的。30篇作品也有一些用潮州方言语法表情达意的情况，略举几例如下：

量词丰富是汉语语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潮州话有部分量词与普通话的不同，征文里也有：《咆哮森林》的“一撮甲良人”（一帮甲良人），《禁地之春》的“一枝口琴”和“驾车兜这山区果园一匝”（一次），《一个老华侨的故事》的“一条衬衫”，《理事长与大秘书》的“一支电风扇”，都很具特色。

普通话的量词通常不单独与名词结合，潮州话的量词却可以组成“量名结构”，例如《破梦》中的“只烤鸡腿二块饼糕”量词“只”前面省略了数词“一”。

普通话的状语一般置于谓语之前，潮州话有的却放在谓语之后，《破梦》“我要回去交待多一件事。”“多”就是置于动词“交待”后面的状语。

潮州话的比较句除了有和普通话一致的“甲+比+形容词”式外，还有“甲+谓词+过+乙”式，《破梦》：“价钱要便宜过上次才公道。”

普通话用助词“得”作为补语的标志，潮州话则以“到”为标志，《香饵》：“富到无人知”。

与语法相应，在修辞方面，30篇入选征文的作者也捻熟地运用了潮州方言去渲染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浓烈的“潮味”。

一、注意采用华人熟悉的事物、方言、土语打比方。例如《表叔》一文里表叔谦虚的自喻：“我是一个土哺鲁”。用潮州话“土哺鲁”自喻学识轻浅。

潮州有个远近闻名的开元寺，凡到潮州市的人总免不了去参观一下。但在有“佛教王国”美称的泰国，比开元寺更大，更金碧辉煌的寺庙一定不少，可是小说《香饵》里的泰国华人林叔说自己损失惨重时，却偏偏道：“哼！我去了一个开元。”比喻损失的程度，故乡的一切在海外赤子心

头的份量油然而见。

二，注意采用潮语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理事长与大秘书》一文两个反面人物章大舍和章大海都姓“章”，潮州话“章”与“张样张相”（装模作样）的“张”同音，“章大舍”就是装扮的、作假的公子哥儿，“章大海”则是打肿脸充胖子的骗人货色。这俩人的名字恰如他们的行径，作者独具匠心，叫人每读到这两个名字就忍俊不禁。

三，注意引用潮籍人士熟悉的谚语、顺口溜，用它们来形象地说明问题。如《杏林曲》：“一病配一药，跳蚤无涎捉不到。”《玩佛相的哀乐》“街市那里有这样大只田鸡满街跳！”

二

生活在泰语环境的华人一般都能讲泰语，以至这些中文作品亦时时夹杂着某些对国内读者很陌生，而写作者用起来却得心应手的泰语音译词。这是30篇入选征文的又一个语言特点。例如：

叻叻（菜市场）、銮富（对老年和尚的尊称）、坤菩（父亲）、庵甫（县长）、甘銮（乡长）、摩梭三（中学三年）、波四（小学四年）、大吞（泰式高脚屋的底下）、宋干节（泰国泼水节）等。至于兄功、伯清、叔亮、呖伦（伦哥）、巴田（田姆）、慕钟（钟医生）、丘莲（莲老师）等称呼在前、人名在后的构词方式，就更明显是受了泰语构词法的影响，而与汉语的构词习惯完全相反。这些词语令作品带上了一些“洋味”。

在30篇入选征文里，泰语音译词有的是用潮州方言词作注，和潮语词对照着列出来的，小说《小当家》就有这样的排列：“巴金概道（椰浆汤丸）、络冲（椰浆粉丝）、瓜钺妻（椰浆芎蕉）、扣东博呀（芎蕉裸）、拖喃别呀（椰浆乌豆）、开弯呀……开弯（甜卵）”。这些食物，除了开头的两样，其他的如不谙熟潮州话和泰语，就未必知道它们是指“椰浆香蕉”、“香蕉糕”、“椰浆黑豆”和“甜蛋”。

作品语言的这种“中外结合”的现象并不是写作者有意别出心裁，而是他们的语言实际的自然流露。下面二段话就是有力的说明：“八十年代的泰华侨社，是金融信托公司的天下。仅仅曼谷的唐人街，就拥有十多家信托公司。以洋名为号召的‘汤姆信托公司’，泰式名字的‘素拉猜信托公司’，但其中仍以中文名字占优势，例如‘财来’、‘和平’、‘大旺’、‘兴兴’、‘隆隆’、‘仁义’、‘发财’，还有……”（《香饵》）其商行的名字既有洋

名，也有泰名，更多的还是中文名。又，“他能流利操着四种语言：泰语、英语、中国普通话和潮语。”（《杏林曲》）这更直截地阐述了产生这种多语综合现象的原因。

三

旅泰华人作品语言的独特，乡音的浓郁，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故土的依恋，对保留汉文化的执着，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被千千万万海外华人带到国外，在海外延续、发展的汉语方言，由于脱离本土的时间已久，由于外族语言的影响，由于所在国经济、政治的情况与故土的不同，与国内的同一方言往往会有差异。去研究、区别这些特点，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88'泰华短篇小说金牌奖征文的语言分析告诉我们，在东南亚的近邻泰国，很可能就有一块闽方言文化的沃土等待我们开垦。

当然，语言接触的结果，不仅会产生外来词，也会产生“混合语”。本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汉语和英语接触时在上海、广州等中国沿海城市产生的“洋泾浜英语”就是一个例证。30篇入选征文亦不止一处描述了华人的泰籍家眷所讲的不纯正的潮语或华人所讲的不纯正的泰语。例如，《失落的心血》：“阿忠伯不愿见他太难堪，有些怆然地苦笑着，用半咸半淡的泰语代他说……”《禁地之春》：“她以潮佬混合语言，平和而柔静的语调说”。另外，上文提到的在作品里出现的泰语译音词——这些词有的是以潮州方言译的，有的是以普通话（国语）译的。例如，《音容宛在》：“丘莲（丘，音ku，泰语，即老师的意思）”一句里，作者为“丘”字所注的音与潮州话“丘”的发音相近。《把希望交给下一代》却有用普通话注音的例子：“她小的时候，长得又白又胖，看去宛如一个洋娃娃，因此，大家都喜欢叫她作‘独个大’（泰语洋娃娃，用国语发音）”。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以上这些泰语译音词是写作者根据自己周围的发音用汉语写下来的。我们不妨设想，在各个阶层的旅泰华人、华侨中，有可能存在一种中泰或潮泰语的混合语。

“世界上凡有炊烟之处便有华人的足迹”。据统计，地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说汉语的，华人遍布五大洲四大洋，汉语同样遍布五大洲四大洋。在世界上各华人聚居处都可能汉语或汉语的方言与当地语言相混杂的混合语言。考察这些语言，摸清海外华人、华侨中的双语或多语现

象,亦是开发汉语言资源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注:除引语外,正文中凡是圆括号里的是潮语或泰语的普通话相应说法。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专访 ·

文艺学方法成系统:多样而统一

——访著名文艺学家胡经之

本刊记者 关 仪

在广东省90'比较文学研讨会上,笔者有幸同著名文艺学家胡经之教授作过长谈。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执教,融合美学与文艺学于一炉,开拓文艺美学学科,甚有贡献,近年又来深圳大学创办国际文化系,拓展新兴学科,多有建树。在这三、四年间,陆续出版了《文艺美学》、《西方廿世纪文论史》、《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国现代美学丛编》,为国家教育委员会主编了《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及多种教学参考资料。先生对文艺学方法论尤多注意,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前不久完成了一个文科博士点科研项目,主编《文艺学方法论》一书,近40万言,即将出版。承先生回答了笔者有关文艺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特录于后,以飨读者。

问:文艺学方法论日益受到文艺批评、理论界的重视,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文艺学方法论日益受到重视,这是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现象。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它,不能只用一种方法,而需要涉及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种方法。近几年文艺研究、文艺批评的方法开始多样化起来,这是好现象。但多样化不应是多元化,我们需要对各种方法作系统的研究,比较各种方法的特长与局限,弄清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以便酌而用之。

问:这几年文论界新的,或者说新引入的方法论层出不穷,传统的方法论似乎受到了挑战。

您如何看待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之间的关系。

答:我认为,传统与现代方法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文艺学的传统方法,哲学思辨与现象实证交错更替,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更多是从艺术哲学转向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传记学等实证方法的运用,作品出现的时代、文化传统,作者的生平、经历、文献版本与考证等等,成为文艺学研究的中心。文艺学的这些传统研究方法至今仍未失去价值,它们将与现代方法相结合,继续保持其生命力。不能否定和抛弃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价值的传统方法。特别是,对于我国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各种文艺研究和评论方法(如考证作家生平,探索成书过程),应予以科学的总结。

所谓文艺学的现代方法则是泛指20世纪所用的多种多样的方法。20世纪西方是一个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十分活跃的时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用于研究和评论文学现象,就有各种各样的文艺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20世纪亦不断发展,不仅在苏联、东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日益为人重视。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各门学科相互渗透,文艺学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传统理论仍在继续发展,许多现代理论应运而生,相互排斥而又彼此补充。对于文艺学方法的这些变化,视而不见或粗暴否定都是愚蠢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方法的长处和短处,以及各种方法能够运用的范围。

问：怎样对现代文艺学五花八门的方法作一个简要的概括？

答：综观西方20世纪文艺理论，较为引人注目的约有四种类型。一是注重于“表现”的理论，包括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容格的神话原理论。它们的注意中心在作家的“心灵”。尽管浪漫主义者在19世纪已经看重作家的“内在心灵”，渴望了解创作的“内在意识”，甚至已有人意识到“无意识印象必然会和影响和反作用于意识现象”，但是，只有到了弗洛伊德才跨进无意识领域作了一些探索。二是突出“本体”的理论，包括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法国的结构主义。它们的注重中心在“形式”，如新批评派认为，诗歌并不表现感情，它之所以能激起读者的感情反应，是因为文学作品所用的语言本身的特点造成的。三是探索“接受”理论，包括现象美学、阐释美学和接受美学（审美反应理论），这类理论重视阅读活动和读者的反应，使之成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四是研究社会历史条件的理论，注重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运用上述四种类型的理论于文学研究和批评，其方法也大致有类似的四种类型。

问：事物总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的，你认为这多种文艺学方法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呢？

答：文艺学的方法，决定于研究对象的本性以及研究主体的目的，影响着研究的结果。马克思说得对，“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文艺学的不同部门的区分，既决定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又决定于研究方法的相异。如果把艺术活动作为一个过程来考察，那末，可以看到“社会——创作者——作品——欣赏者——社会”这个系统的主要环节。文艺学可以研究每一个环节，也可以把几个环节作为整体来研究，又可以把它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研究，这么一来，就产生了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等等。现代文艺学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分工的日益细密，深入专门领域的分析更为精致；另一方面则要求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作更高的综合。如何把各种具体方法综合为有机整体，正是现代文艺学应予关注的问题。

问：前几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其它自然科学的方法被引入到文艺学中。对此褒贬不一，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文艺学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应视具体的研究目的酌而用之。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文学艺术具有不同的质：社会的、心理的、符号的，等等。文艺学应该运用不同的方法来探索它的多样性，以助于揭示文学艺术不同方面的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向文艺学渗透，这是势所必然的。但是这些方法只有同美学方法相结合，才能揭示出文学艺术自身的系统质。把文学艺术的不同方面、层次、环节作为一个整体从美学上给予综合研究，把文学艺术的多样质，都综合到它的系统质——审美价值中来，这正是文艺学的历史使命。美学在吸取其它方法的时候，也将改变自己的形态，不是封闭体系，而是开放体系。苏联一些美学家（如卡冈）在把系统方法引入美学的时候，特别重视对文艺作美学的系统研究。这对我们不无启发。

问：这么说来，其他学科的方法是不能“移植”到文艺学的，对吗？

答：从其他学科中引进研究方法，如果只是将一般原理“移植”到文艺学，那末，这种研究方法只能揭示文学艺术与其它社会现象共有的一般规律。比如，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研究文学艺术，如果仅仅是囿于一般社会学的水平，它不过是以文学艺术作为例证，说明社会现象的一般规律。文艺社会学不仅需要揭示文学艺术同其他社会现象的共同规律，更要找出文学艺术所独有的特殊规律。总之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要转化成为文艺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定要揭示出对象的“一般——特殊——个别”的相互联结。

问：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文艺学方法中的地位？

答：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文艺学的根本方法。文学艺术，既要按照“自律”在运动，又制约于“他律”的运动。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握住它的“自律”与“他律”的辩证关系，从“他律”和“自律”的合力中去理解文学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要把握艺术辩证法，首先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然，根本方法不能代替具体方法，正如在运用具体方法时不能无视根本方法一样。我认为，两者的结合乃是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必然要求。

寻找中西文学的交汇点

——访饶芑子教授

本刊记者 刘斯翰

近年以来，暨南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异军突起，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注目。以1984年12月举办全国文学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为发端，1985年发起成立了广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创办了《文学比较研究通讯》，展开了与香港及海外的交流，最近，又以《中西戏剧比较教程》的出版受到广泛的重视、显示了新的实绩。为此，笔者访问了这支新军的领头人，暨南大学副校长饶芑子教授。

问：饶先生，听说由您主编的《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出版以后，即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和欢迎，您可以介绍一下情况吗？

答：这本书其实应叫“中西戏剧比较概论”，现在称为“教程”，是因为列入了国家教委1985—1990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之内的缘故。在教委组织的审稿会上，专家们的评价是：“此书是一部见解深刻独到、体系严整科学、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它的出版，在中西戏剧比较研究方面将具有开创意义，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大重要收获，同时也为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提供了一本急需的优秀教材。”本书出版后，《文艺研究》、《社会科学报》、《当代文坛报》、《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文科教育》等刊物，先后发表了评论文章向读者热情推荐，有的还选载本书的内容。泰国《新中原报》在今年1至2月，更以相当显著的篇幅对本书内容进行摘要连载。迄今为止，我们还陆续收到要求帮助购书的信件，影响还在扩大之中。

问：中西戏剧比较如专家们所说，是一件拓荒性的工作，您是否可以具体谈一谈。

答：中西戏剧比较这个选题，和《中西戏剧比较教程》这本书的写作，的确不是灵机一动的结果。我们学校的老教授黄轶球先生，早在1978年就强调应在系里开展中西文学比较研究，1982年，黄轶球教授的二位研究生和我们文艺理论教研室的一位助教在导师指导下撰写了三篇中西比较文学论文，适逢这年南开大学等单位在天津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研讨会。系里就派这三位年青同志去参加，他们的三篇论文在研讨会上反映很好，引起与会者对我们暨大的注意。由此作为契机，推动我们也重视起来，决定把我们中文系的文艺理论研究室定向为重点搞比较研究。1983年还派出二位青年教师到广西参加广西大学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李达三教授主讲的比较文学讲习班。1984年，我们又独家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文学比较研究研讨会。这次会议从筹备到召开，极大地推进了我们自身的建设。就我个人来说，为了准备和主持这次研讨会，一口气读了二百多篇国内发表的有关文章，好的坏的精深的浅薄的都看了，这就对国内学界研究比较文学的现状有了较全面了解，并且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意见。这次会议我们自己拿出了8篇论文，我代表暨大中文系致开幕词，提出我们对这一新兴学科建设的构想，谭志图同志代表研究室作了《关于文学比较研究学科的几点认识》的发言，其中提出的一些意见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研讨会开得很成功。这次会议以后，我们办起了《文学比较研究通讯》，建立了与香港方面的联系，进行了人员交流。影响扩大了，压力也大

了，形势迫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冷静地考虑，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寻找突破口。国外的比较文学研究机构，包括香港，都是设在外语系的，我们则主要力量在中文系，有汉学方面的优势，所以决定重点放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上，而国内的中西比较文学成果，主要是诗歌和小说方面比较多，戏剧方面完全未起步，这是一个空白。随着世界对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视，各国俗文学之间的比较也开始热起来。戏剧作为一种群众性的艺术，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民众的文化意识，应优先考虑。但是由于中国戏剧的许多特殊性，外国人不易掌握，所以起步较慢，未见有系统成果出来。而当时大陆与港、台方面，戏剧比较还未热起来。我因为对戏剧较为熟悉，深深感到如从文化学入手作中西戏剧比较，可研究的课题很多，也很有价值。恰巧遇上国家教委选题投标，我们便报上去了，随后我又把提纲写出，经一年半的摸索和准备，先后在助教班和研究生中开出专题课，在这一基础上，先和徐顺生同志合作撰写《中西戏剧比较概观》，后又主编和参加撰写了《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前者因订数不够，至今仍搁在出版社，后者得到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很快问世。

问：据我所知，您在确定这一填补空白的选题中起了主要作用，从某一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是您的个人选题。而您却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部专著来写，您是怎么考虑的？

答：确实有人提议我自己写这本书。而且这提议也不无道理的。我在中山大学念书的时候，念的是中文系，我从小就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在大学时又先后得到詹安泰、王季思两位老先生的悉心指导，所以对诗词和戏曲都下过一番功夫，尤其是留在大学任助教期间，王季思先生指导我进修元代戏曲，在这方面打下了一些基础。尔后，在暨大任教，讲授文艺理论的课程，因为工作关系，又研究过西方的戏剧理论，以及戏剧作品。所以发现中西戏剧比较这一空白，跟我原来的知识结构是有内在关系的。但我的想法是，如果把此书的撰写作为集体项目，不但成果出得快，对于暨大比较文学群体的建设是很有好处的。事实说明，此书问世后，确实为暨大带来一定的影响，它使暨大比较文学的研究向前迈了一步。

问：那么，您对于你们的研究、它的进一步发展有没什么计划？可以谈谈吗？

答：我们拟在暨大中文系设立比较文学的系列课程，即：《比较文学概论》、《中西戏剧比较》、《中西诗学比较》、《中西小说比较》、《中西诗歌比较》、《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现在已开出两门，今后打算每年开一门，五年内完成。至于我个人，目前在主编和参加撰写《中西小说比较》书稿，我把此书同已出版的《中西戏剧比较教程》看作是姐妹书。小说的比较不是一个空白领域了，我们力求在设立体系上显示新意，自有特点。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开展世界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早在1984年我们主办的那次研讨会上，无论是从要形成广东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做到既有连贯性又不断开拓新目标来说，还是从暨大校的性质、拥有的资料、业已形成的队伍，以及与港、台、海外的联系等优势来说，我对我们开展华文文学比较研究是充满信心的。

问：顺便想问一个题外的问题，您近年来还主编了一套《传统文学与当代意识丛书》，我看也应该算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业，关于这方面您能够谈点什么吗？

答：在我的思想中，上述的文学比较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寻找中西文学的交汇点。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只有放在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中才更能看清其特色；通过比较既可以认识自己，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别人的特点，看到彼此的异同；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够进行对话，才能彼此沟通，搭起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桥梁。而这正是合符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一大趋势，和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的。我又觉得，中西文学的比较、交流是一种横向的结构，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要有一种纵向的结构，这就是古今文学的交织、继承，所以，我们还应该寻找古今文学的交汇点。做到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当代意识的大厦。那套丛书，便是由这么一个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在确定丛书的选题和写作要求时，我们突出了“填补空白”和“因人命题”的原则，选题大都具有填补学术领域空白的特点，作者又都是多年来一直对选题进行研究的人。另外我还要求写作过程中注意这么几点：一是历史感要强，要用今天的观点反观历史，在研究今天时不忘历史；二是史论结合；三是要有比较意识，随时进行自觉的纵向横向比较；四是不搞纯思辨，要结合作家作品的细致研究，有骨有肉，具有可读性。这些原则和

要求，无非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使丛书在学术上真正有所建树，在读者中真正能发生影响。当然，我个人也还有一点小小的“野心”，就是想通过这套丛书，把广东中青年学者的形象推到国内外学界之前，扩大广东在外界的学术影响。

问：饶先生，谢谢您向我们介绍了暨南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情况，您所想和所做的事，我相信对广东学界同仁会很有启发的。祝您和暨大的比较文学研究有更大的成就！



高要县河台镇治理山区“四大隐患”调查

范步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的路子尚未明朗,联产承包责任制还不尽配套,一些农民因怕政策变更而产生短期行为,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只顾抓眼前经济发展而忽视整体大局,农村中人口膨胀、水土流失、耕地锐减、校舍濒危的隐患日趋明显。

地处高要县西北角最边远山区的河台镇,注意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结合本地实际,采取得力措施,在治理“四大隐患”工作中收到了良好效果。

抓好计划生育,治理人口膨胀

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家庭经营的结合,使农民的小农经济传统意识有所滋长,家庭劳动力的来源更依赖于生育,农村中抢生二胎、第三胎的现象日益加剧。仅1986年,河台镇就超生125人,比国家规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超出4个百分点。按此速度,到本世纪末,全镇人口将由现在的31000余人增至近4万人,人均耕地面积将由0.46亩减至0.36亩,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被人口膨胀的因素埋没。

河台镇委一班人认识到,要使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就必须从国家的大局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坚定不移地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从1988年起,镇委增加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委员专抓计划生育工作,建立起一支正常化、制度化的计划生育专业队。镇委、镇政府每月检查一次工作情况,每半年组织一次全镇突击大检查。同时,加强立法和宣传,制订本镇计划生育《实施办法》,组织干部深入每一个自然村,先后召开户主会议300多场次,使计划生育的战略意义家喻户晓,促使全镇大多数计生对象自觉落实计划生育措施。

经过上述努力,1988年、1989年,全镇分别完成计划生育“四术”措施920例、856例,其中16名专业队员每年完成达560多例;1989年,全镇人口出生率完全达到国家规定标准;按两年“四术”的完成推算,相当于全镇每年少出生计划外人口500人,人均收入增加10元、人均粮食增加20斤、人均住宅增加3平方米、人均占有耕地的需求缓减0.01亩。

抓好整体布局,治理水土流失

随着山区山林承包责任的落实,群众都重视对有林木和经济作物山地的经营管理,而不愿投资经营荒山、半荒山。对

有经济作物的山地，也有部分群众怕政策变而只收不种或只种短期可收作物，进行掠夺性经营，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影响着山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88年、1989年，河台镇三围区、河海区因暴雨和水土流失分别造成严重自然灾害，堤坝冲毁，房屋倒塌，农田失收，人畜伤亡，经济损失分别达118万元和167万元。

面对严峻的现实，镇委书记林达飞同志和镇委一班人决心抓好山地合理布局和山区经济整体长远发展规划，着重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完善山林承包责任制。使人民群众认识到一定50年不变的承包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和短期行为，实行短、中、长期结合的投资经营，开发山区经济，1988年至1990年春，全镇共种下投资大、生长期长的桂树13179亩。

引导农民调整山地布局。1988年至1990年春，全镇平均每年造林种果24570亩，其中松、杉等用材林占68%，桂、果、药等经济林占32%，形成了用材林与经济林相结合、短期效益与中远期效益相结合、造林绿化与水土保持相结合、山上林业经济与山下多种经营相结合的科学合理布局。过七、八年后经济林发生效益，全镇每亩山地价值将从现在的99元提高到220元。

狠抓消灭荒山扫尾工作。1988年以来，镇委采取了落实荒山承包责任人义务职责、贷款扶持耕山大户成片承包开发荒山、提供种苗营造工程林等一系列得力措施，到1990年春，全镇共补植更新疏残林43710亩，绿化荒山4300亩，完成了消灭荒山扫尾工作。

突击退耕还林。由于眼前经济利益所系，不少农民不愿退耕还林。1988年的特大水灾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河台镇委及时组织干部深入全镇主要水土流失区，召开大小群众会议，以灾害事件为镜子，细致发动、科学引导，争取了全镇80%以上农户自觉对木薯山、巴戟山间种和退耕还林。同时采取经济手段，对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众实行补助，对违反退耕还林命令的个别农户依法处理。到1990年春，全镇共退耕还林8900亩，间种林木3800亩，从根本上为绿化荒山、发展山区经济打下稳固基础。

抓好国土管理，治理乱占耕地

河台镇现有耕地16110亩，其中水田14580亩，旱地1580亩。过去由于没有国土管理专职人员，乱占耕地现象较为严重。所以，全镇人均耕地从1978年的0.7亩，降到1988年的0.6亩。按此速度递减，到2008年，全镇人均耕地将降为0.8亩，即使年亩产粮食达2000斤，人均粮食也只有600斤。

河台镇委清醒地意识到国土管理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从1988年起，进行了一系列综合治理。一是健全制度，成立国土管理所，配备专职干部，颁发有关文件和细则，使国土管理工作走上正轨。二是大力宣传《国土管理法》，使广大群众明白加强国土管理是一项国策，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乱占耕地是违法行为。三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9年7月，镇委发出文件，对全镇近年来占用耕地建房和作非农之用的现象进行全面清理，仅用两个月时间，共清理占水田建房的农户784户，总面积61540平方米，共有769户补办

了手续，722户交缴了罚款，47户主动拆除退耕。四是按村镇建设总体规划，严格审批手续，控制非农业用地，限制宅基地用地面积，提倡在山边地、荒弃旱地建设。仅此一项，就节约耕地82亩。

到目前为止，河台镇每年减少的耕地面积已由1987年前的25亩下降为6亩。

抓好集资办学，治理濒危校舍

河台镇现有中小学37间，其中中学1间，小学20间，教学点16间，学生3981人，教职工258人，校舍建筑面积17277平方米。1988年，全镇学校实现了“一无两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校舍已变成危校舍。据调查，目前全镇危校舍达15间，面积3201平方米，占校舍面积的18.5%，是全县危校舍最多的镇。镇委一班人意识到，如不及时清除危校舍隐患，全镇教学秩序受到影响，教育事业不能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无法提高，搞好山区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就会成为空话。

按照预算，清除全部危校舍隐患需总投资117.6万元，而全镇教育经费有限，有的管理区集体经济很薄弱，有的尚需扶持，加上分级办学的观念还未在群众中扎根，排危建校压力很大。针对这一情况，镇委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开展群众性的集资排危建校工作。

今年4月，镇委、镇政府和镇人民代表大会分别制定了在全镇集资建校的规定和决议，明确了集资的方法和标准。镇区两级成立了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领导机构，实行层级岗位负责制，分片、区、村、组、户包干落实。召开各种会议316场次，到会人员7286人次。采用广播、宣传车、黑板报等形式，造成强大宣传声势。镇干部深入乡村农户，做细致的发动工作。由于措施得力，全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分级负责是国情的需要，是国家的政策，办教育并不单纯是政府的事，集资排危建校办教育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同时也符合人民群众的长远切身利益，而绝不是“乱摊派”。

在集资过程中，全镇近2000名干部、教师、职工、党员带头交款，群众亦纷纷跟着交款，到今年5月初，全镇已筹集资金85万元，预计到8月底共可集资89万元，届时将有15间学校3200平方米的危校舍可以全部拆建完毕，并新增建校舍1300平方米。到年底，全镇将有80%以上的学校达到楼房化，师生的安全将得到保障，教学环境将焕然一新，河台镇的教育事业将面临新的飞跃。

责任编辑：有能

商办工业是发展经济的一条成功之路

——肇庆市商办工业开发区的情况调查

梁志强

肇庆市商办工业开发区位于肇庆市二塔路,占地面积24800平方米。它是市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开发的一个工业区。从1988年8月筹建至今仅两年时间,即建成了—个厂房规范整齐、产品畅销、效益颇佳的工业生产基地。这个商办工业区的建成,有两个问题引起我们思索:一是商办工业这条路子是否可以肯定;二是在治理整顿的环境中他们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此,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求得对问题的探讨。

一、商办工业的构思

社会分工,强化了专门性生产经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从而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从历史发展和理论上总体而言。而具体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以社会分工来说:一是分工必须以社会需要和可能为依据;二是分工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分化组合;三是各部类各专业生产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甚至互相矛盾着,或者吸收对方的长处而充实自己,或者共同融合而派生出新的东西。认识这些观点,对我们认识商办工业的产生大有好处。当商业部门提出要兴办商办工业时,有些同志提出疑问:商办工业路子对吗?是否有“捞过界”、不务正业

之嫌;流通行业办工业是否可行?现在工业部门搞工业尚且这样步履维艰,何况是隔行的商业部门。对此,市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陈民芳同志与其它领导经过冷静的分析和认真的研究,认为: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工业和商业,生产与销售,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工业部门生产出产品就一定要寻找销售市场,商业部门也要靠工业部门提供产品,否则无以销售。其结果就导致或者是进行工商联手,产销结合,共同进退;或者是工业部门加强自己的销售力量,以求产品出路,商业部门开拓自己的产品基地,以提供货源。这就是商办工业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至于商办工业的可行性,则应该视商业部门是否具备办工业的条件。我们认为,商业部门有“两优一劣”:一有资金优势,由于投入比例小,家底厚,再加上门路广,资金相对充裕;二有市场销售优势,线长面广网络多,更是工业部门无法比拟的。这两个优势是办工业必不可少的主要条件,而当前困扰着工业部门的也正是这资金和销售两个问题。至于—劣,就是工业技术、经营管理的人才和经验的贫乏。但这一点可以通过引进、培养和强化来解决。因此,商办工业不仅可行,而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明确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坚定了

信心。

二、创业者的慧眼与捷足

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的创业者们凭着科学的态度和艰苦奋斗、拼搏实干的精神，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1. 项目选择比较准确。商办工业到底搞些什么项目，项目选择得准确与否，事关今后企业的成败存亡。为此，他们认真分析研究了商业部门的特点和市场情况，认为食品工业比较适合于商业部门，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既是食品工业、又是省财办交给的任务的糖果项目，引进国际先进设备，生产高级糖果。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的领导针对一些人信心不足的情况，本着科学的态度决定向天津国际科技咨询公司进行咨询，获得了一份专项的情报资料报告。这份报告对国内高级水果糖的生产情况、销售情况、原材料供应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介绍，认为北京的红虾酥糖、上海的大白兔奶糖、海南岛的椰子糖、山东的高粱饴糖、广东的水果糖都是国家的传统名牌产品，而广东的水果糖近年生产几近空白。因此，引进新设备，改革旧工艺，生产出新口味的水果糖，必将大受欢迎。另外，咨询报告对引进外国生产线的各方面性能进行了比较介绍，认为英国的生产线比西德、意大利更具优点。于是，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决定，引进英国贝克——APV公司的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生产线，生产高级水果糖。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这个项目是独具慧眼的，是完全正确的。

2. 厂区厂房建设问题。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的创业者们因地制宜，利用一个51亩的破旧猪仓作为工业开发区的场地，以减少征地的诸多负担和困难，加快了开发

区的建设速度。同时，对厂房厂区进行精心设计，合理布局，既着眼于近期快速上项目，又着眼于今后长远的发展，进行分期分批的建设。由于从实际出发，加上工作上的高效率，使首期厂区厂房建设仅用几个月时间即建成投入使用。

3. 资金问题。按计划，整个工业开发区需投资2500万元，仅南方糖果厂引进设备就需170万美元。而当时正值国家收紧银根信贷。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领导不怕困难，多方活动，除了自有资金和集资外，积极争取区、市、省、部等各级支持，总经理陈民芳同志亲自上北京6次，主动向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办理进口设备的减免关税，节约投资560万元，为项目的上马奠定了资金的基础。

4. 加强技术力量和经营管理。商业部门多是做生意搞流通的，缺乏工业技术人员和工业经营管理的经验。他们就采取积极引进和加强自身培训的办法，以虚心学习和大胆实践的态度解决这些问题。现有的人员都经过送去外地学习和自行培训后才能上岗，对外面的人才更是求贤若渴，千方百计物色和挖掘，热情恳切地聘请，加上给予安排房子、浮动工资的优惠待遇，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工程技术人员前来为商办工业服务。

三、喜获成果，初具规模

1988年8月至今短短两年时间，肇庆市商办工业区从无到有，从一片破旧的猪仓中建立起来，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其效益成果是喜人的。仅以其中骨干企业南方糖果厂为例，该厂1989年3月基建完工，4月安装设备，5月试产成功，9月批量生产，11月产品就通过了省级技术鉴

定，12月产品荣获广东省“四新”产品优秀奖，被省商业厅推荐到全国展评。取得“当年进设备、当年装机、当年试产、当年获省优”的惊人成绩。在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的全体干部职工的努力下，两年来他们艰苦创业的成果是：

(一) 建设了一个初具现代化水平的厂区。整个开发区占地面积24800平方米，目前已新建厂房6幢，主体建筑面积及附属配套设施面积5600平方米，供电、供水、排污、通讯、道路、绿化等多功能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形成了发展生产和吸引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

(二) 办起了5间工厂：

1· 南方糖果厂，独资自办企业，总投资1850万元人民币，年产能力2500吨高级水果糖。

2· 台和电子有限公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年产能力1.2亿只硅整流二极管。

3· 台和电位器厂，三来一补企业，年产能力600万只电位器。

4· 金田电业有限公司，三来一补企业，主要产品为电热器皿电热管。

5· 东胜针织有限公司，合资企业，年产能力1500吨针织布，25万打针织成衣。

(三) 产品畅销，成为名牌。南方糖果厂生产的高级水果糖，由于设备先进，工艺技术先进，采取蒸汽薄膜熬糖浇注成型，电脑程序控制，自动配料，生产出各种不同形状，不同口味的高级夹心水果糖。这个被命名为七星果冰系列糖果，以糖体晶莹、夹心鲜艳、口感清香、营养丰富、有益健康的众多优点而受到有关部门专家以及广大顾客的青睐。继去年底获得省“四新”产品一等奖后，今年5月又获广

东省食品科技进步奖。6月在北京举行“全国40年妇女儿童优秀商品博览会”上获银奖。填补了广东高档水果糖生产的空白，重新把广东水果糖的生产优势夺回来。目前产品通过商业部门四通八达的销售渠道畅销于广州、北京、天津、哈尔滨等20多个省市120个销售点，并进入火车、飞机销售，另外还销往香港、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国际市场。还有一个成绩就是，本地商业部门由于自己手里有这个名牌产品，与外地交流贸易，丰富货源，提高本地知名度，增添了优势。

(四) 经济效益理想。从去年6月投产至今年6月一年时间：生产高级糖果781吨，出口二极管3847万只；整个商办工业开发区工业创产值1164万元，产品销售870万元，出口创汇40.7万美元，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投资贷款也可望如期偿还。

(五) 拥有了一支懂技术会经营的商办工业队伍。目前整个开发区共有干部工人300多人，具有中专以上文化和专业技术职称的占17%，其中助理师级以上职称的专业人员23人。目前他们在生产经营中，注意抓好提质降耗，内部挖潜，走内涵发展生产的路子，并着手搞三级计量，树立了产品要获部优、国优，企业创一流先进企业的宏伟目标。

四、几点启示和认识

肇庆市商办工业的成功，给我们三点启示：

1.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工商结合、工农结合、商农结合、校厂联营、产销联手等各种各样的联合体、附属体必将产生，而且应该产生。因此，我们搞经济工作需要要有纵横左右的目光和改革开拓的精神，

不拘一格，善于联合，善于取长补短，善于发挥各种优势去推进经济的发展。

2. 在治理整顿中求发展，首先必须选准适合市场的有生命力的项目；其次必须要有高效率的建设速度、高效益的生产经营。南方糖果厂的立项上马、生产经营就体现了这些精神，因而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8. 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产品要生存、发展、打开销路，一要凭产品质量创名牌产品，名牌优质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往往立于不败之地；二要挖潜降耗，降低成本；三要有灵活多样的销售渠道和方式。南方糖果厂和台和电子有限公司就能做到这些，创出了名牌优质的七星果冰和硅整流二极管，受到市场欢迎。

面对商办工业的成功，肇庆市商办工业开发总公司的领导者们没有满足，而是

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工作过程中，冷静地对商办工业进行深层次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

(1) 商办工业要“姓商”，要根据商业部门的特点优势去发展，它不会与工业部门办的工业完全一样，不能与正规工业比规模、比投入。因此它的性质应该是综合性的。为此下一步商办工业区的建设将搞成有厂房、商场、写字楼、综合大楼等具有多功能的综合经济实体。

(2) 商办工业要上科技型、智力型、效益型的项目，企业要上等级上水平。这除了经济效益的原因外，还有商办工业要辅助和影响商业的原因，先进的企业和精美的产品必将对商业部门的贸易和经营起到良好的影响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肇庆市委办公室

责任编辑：有能

(上接第97页)

学”的发展才刚刚起步，需要的是热情扶助和爱护，而不能把它扼杀在襁褓之中，以致于使得哲学缺乏通向现实生活的中介和桥梁，而造成哲学对现实生活的冷漠，现实生活则发出“哲学贫困”的抱怨。在这里，程家明同志事实上是把承认哲学应用学科的存在独立性和“应用哲学”是哲学这样两个问题相混淆了。笔者认为，当今时代，的确愈来愈要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实际相互勾通，哲学的触角只有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和生命力，社会生活只有接受科学哲学的指导和规范才能实现良性循环。正因为如

此，我们要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问题的研究，要努力建立起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学科，对那些热心于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同志要积极支持和鼓励，但这门学科具有中介性，它本身决不是哲学，而是哲学与具体科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程家明同志既然也认为“应用哲学”是哲学“通向现实生活的中介和桥梁”，而不是哲学之内的东西，这岂不是在逻辑上也承认了“应用哲学”不具有哲学性质吗？

作者单位：安徽省《学术界》编辑部

责任编辑：冯生

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到新水平

周燎刚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近半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更使我们认识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站在国际“大气候”的背景下，总结经验教训，用新的要求来做好工作，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到新水平。

全面认识党的领导

什么叫党的领导？在党政关系问题上怎样才能体现党的领导？这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国过去长期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制度，存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近两年，进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又出现放弃党的领导责任、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出现，集中表现在对执政党的领导缺乏全面的认识，没有摆正党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生活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这种执政地位，使党不仅具有一般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组织的属性，而且还具有执掌国家政权的国家属性。所谓国家属性，就是党执掌着国家政权，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意志，负责组织政府，建立权力机关（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行使统治权和管理权。简言之，国家属性就是执政权。列宁说：“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457页）斯大林说：“党是政权的核心。”（《斯大林选集》上卷，418页）这就是党的国家属性的表现。我们的党章所讲的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宪法所讲的党领导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也是指党的国家属性。

执政党的两种属性，决定了它具有两种领导职能。阶级的政治组织的属性决定了党对产生自己的阶级有领导职能。这种职能，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存在，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同样存在。只要有

党存在，就有这种职能。党的国家属性决定了党拥有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职能。这种职能，只有在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具有。这种职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党运用这种职能，管理国家，领导全国各方面的工作。

执政党具有上述两种领导职能。因此，所谓党的领导，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本阶级的领导，二是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如果只讲一个方面，看不到另一个方面，特别是看不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是对党的领导缺乏全面的认识。党的两种领导职能，与党章上所说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并不矛盾。党章所说是从党的领导的内容来讲的。两种领导职能是从对象、范围来讲的。我们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认识党的领导。过去对党的两种领导职能宣传不够，特别是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职能宣传不够，造成了人们对党的领导的片面理解。前段政治体制改革所以会出现削弱党的领导倾向，原因之一，就是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把党的领导片面化，没有充分认识到，党对国家政权领导也是党的领导，而且是执政党领导的主要方面。

党政分开要“适当”

明确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对于正确理解和处理党政关系、改善党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改善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实行党政分开。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改革实践上讲，党政分开的提法，有不够科学之处，需要完善。党政关系，一方面，它们不是同一个东西，性质不同、职能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因此，党政应该分开；另一方面，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生活具有领导职能，党政有重合的部分，不可能绝对分开。所以，必然形成这样的复杂格局，党政应

发展党内民主

发展党内民主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建国40年来，党内民主建设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有严重的教训。

从我党现状看，当前发展党内民主至少可在如下两方面作出突破性发展：

第一，党内必须实行言论自由。恩格斯、列宁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实行党内言论自由，认为“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5页）并且主张在党内办一个自由讨论的刊物，作为党内言论自由的阵地。恩格斯1892年11月致倍倍尔的信中说：“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另一半是遵照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7—518页）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后来列宁实现了。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倡议下，第九次党代会决定，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恩格斯、列宁上述思想是深刻的。原则上对我们都是适用的。广大党员都希望对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创办自由讨论的报刊作为党内民主的阵地，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国家大党员多的情况，可考虑中央和省级都办一个党内报刊，发至一定的范围。这样做，可以调动党员的主动精神，使党的决策少犯错误。

第二，建立强有力的党内监督新体制。我们党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滥用权力、腐败等问题，一直不能从根本上抑制，主要是党内监督无力。列宁十分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党内监督体制。其办法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它不受中央委员会决定的约束，而向代表大会负责；监察委员会应有权接受一切申诉和审理（经与中央委员会协商）一切申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省、区的监

分开又不能绝对分开。如果硬要绝对分开，势必出现削弱乃至取消党的领导的后果。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11月1日会见外宾时明确讲：“党政要适当分开”。这就是说，党政分开的程度，要掌握一定的度，不是绝对分开。这个提法，要比“党政分开”的提法科学。多了“适当”两个字，指导思想就不一样，实践上就会起到纠正削弱党的领导倾向。

为使党政做到适当分开，在人事和机构设置上宜采用既有分开又有灵活结合的“V”型模式。即党政分开的程度，不搞上下左右“一刀切”。上层分开的口子可大些，但也保留一定程度的灵活结合，一些负责干部可以有适当的兼任；越往下，分开的程度应越小，重合的程度应越大；到基层，任务比较具体，没有多少人，几乎可以不分了，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就行了。

发展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为了发展和完善这一政治制度，当前有两个问题需要认识和解决。一是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长期革命和建设形成的。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关系，不能颠倒，位置不能互易。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根本不同。但是，必须明确的是，这里讲的“领导”，与共产党对政权机关的领导，其涵义是有差别的。中共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不存在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问题。因此，中共各级党委对民主党派的领导，要注意区别领导内容和领导方式的不同，不要去干涉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二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问题，长期无章可循、无法可依，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中共中央在《意见》中提出了五条措施，这将走上有序可循的阶段。为了贯彻、执行五条措施，要注意划清在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中提反对意见与反对中共领导的界限。对中共某项具体决策提出反对意见，不等于反对中共领导。这方面，我们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切实保障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进行民主监督的权利。

察委员会由省、区党代表会选出，与同级党委平行。这种独立的监督体制无疑是强有力的。而现在在我党成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虽然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但要受同级党委领导，无法独立工作，不可能对同级党委进行有效的监督。我们应该效法列宁，把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变为与同级党委平行的独立监督机关。只有这样，党内监督才不会流于形式，才能有效地克服党内存在的歪风邪气。

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一方面具有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决定，要求全党上下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

要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重点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在制订路线方针政策时，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既要考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又要照顾眼前的、现实的利益。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强国富民之路。要维护和发展稳定的局面，这是进行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前提。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制订政策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高决策水平，加强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决不能少数人说了算。

其次，要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从已查处的腐败现象看，大多数案件都集中在有权无钱的政府官员和有钱无权的经营者之间的权钱交易上。因此，反腐倡廉的重点应放在约束权力、规范政府行为、堵塞权钱交易的渠道上。要进一步制定有关行政法规，规范政府行为。

再次，要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滥用权力的官僚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由1963年周恩来同志讲只是“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发展到1989年邓小平同志讲“广泛存在”，再发展到1989年江泽民同志讲“非常严重”。这种状况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官僚主义的存在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制度和干部主观的原因。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把长期的方针和近期的措施结合起来。长期的方针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近期的措施是，要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树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改革政治体制，加强行政立法，建立严格的责任制；精简机构，缩减编制，可考虑逐步实行机关经费承包、工资浮动的制度；加强检查、监督，依法制裁官僚主义犯罪。同时，要注意解决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如何能受到群众真心欢迎的问题。

作者单位：广东省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周华



简谈人事管理公开化

黄庆明

我国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及管理方法所存在的弊端，我看主要是缺乏民主和公开监督。因此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新的干部人事制度“要贯彻和体现注重实绩，鼓励竞争、民主监督、公开监督的原则”，提出要“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因而，搞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实现人事管理的公开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为此需要做好如下几件工作：

第一、录用干部公开化。要改变过去那种神秘性和主观随意性的选人用人方法，实行面向社会，广招人才。逐步建立一套健全的考试任用制度，实行公开报名、公开应招对象的条件、公开录取名额、公开考试成绩、公开录取名单的办法，择优录用，打破干部与群众、干部资历深浅、干部有无学历的界线，实行唯才是举的原则，给予每个人以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不单以学位或其它人为因素去论人才；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当中，实行优胜劣汰。力争在公开化的前提下更多地体现社会的公平和竞争。

第二、晋升干部公开化，这个问题关系到选人用人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和效能，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兴衰和各项事业的成败。

过去由于晋升工作的封闭性和神秘化，必然会产生许多不良的现象：一是任人唯亲，任用干部只在自己熟悉的人群中打圈圈，有的甚至在亲戚朋友中搞裙带关系，从而把党内关系搞得庸俗不堪；把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素质好能力强的人拒之于门外，严重挫伤不少干部的积极性。二是顺我者提，逆我者压，有的用人者考虑的只是所用者听不听话，顺不顺手，自己能不能驾驭，而不是考虑他的工作能力强不强，能否打开局面，

适不适应工作需要，致使一大批锐意进取，善于思考问题，敢于创新的人得不到重用。而一些才智一般，工作平庸，甚至工作能力很差但老实听话，在领导面前拉拉扯扯，阿谀奉承的人，反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三是晋升时没有科学考核，没有群众参与评定职务晋升的公开性的组织机构和措施，没有严格的科学的统一的客观标准，没有进行以工作实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考核。

晋升工作中的这些偏差和不正之风，必须以改革入手，将严格的科学管理和公开的民主监督结合起来，具体说，就是以工作实绩作为升降的基本原则。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对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要坚持公开、民主的考评原则，增加考评工作的“透明度”，把对干部的考核、评价、鉴定、任用、监督，由领导的单一活动变成由群众直接参与的民主活动，由秘密、封闭的活动变为公开的活动。根据这几年许多单位的实践经验表明，考评的法定程序应该是：个人述职，群众评议，领导和干部部门评价，写出评语，同干部本人见面并允许本人申辩，建卡入档。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考评者的全面情况，还应实行多层次、多角度、多阶段、多目标的考评方法。这样，可以开阔视野，拓宽选人的渠道，为任用、升降提供可靠依据，要使晋升有科学的标准和严格的制度，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决不能放松革命化的要求，这是任用干部的核心问题。

第三、实行人才流动公开化，保证人才得以“双向选择”。如果说录用是人事管理“进口”的大门，那么，人才流动的公开化则是“出口”的活塞。目前，人才难以流动，人才分布和需求失衡，致使人才缺乏和人才积压、浪费两种现象同时存

在,其根本原因是,人才管理上“统得多”,“管得死”和“单位所有制”这种封闭、僵化的人才管理体制。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统包统配为特征的人才管理体制未能从根本上被触动,传统的计划调配和人才集权式的管理体制仍占主导地位,人才按指令性计划统包统配,一次分配便定终身,用人单位没有选择的自主权,人才也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岗位的余地;二是产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尚未打破。由于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相当一部分领导者把人才当作自己的附庸,视为私有财产,宁可圈起来当“虫”,也不愿放走成“龙”,有的视人才流动为“自由化”,只强调个人服从组织,而组织不认真考虑个人专业特点,兴趣爱好,所以不管单位是否需要索性来个关死闸门,一个不放;三是人才自身因素。由于长期以来人才为单位、部门所有,使许多人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心理不敢轻言“调动”。因此,要实现人才流动公开化,提倡人才“双向选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封闭的管理体制,因而要在思想和行动上重视提倡和支持人才的合理流动,形成爱才、惜才、合理使用人才的社会大气候,为人才“双向选择”创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尊重人才的意愿,在专业对口和工作需要的前提下,给要求交流的人员以适当选择专业或工作单位的机会,以利于发挥其专长;要建立人才社会调节机制,发展人才市场,运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调节需求,逐步形成较完善的社会主义人才市场体系。通过人才市场,为单位和个人进行“双向选择”牵线搭桥,提供服务,是人才流动社会调节机制的一种好形式,也是打破人才单位、部门垄断,打破单一、封闭、集权式的传统人才管理体制模式,实现人才“双向选择”的好方法;要建立健全的人才法规,放宽人才政策,保证人才“双向流动”。当前应尽快通过法律规定,赋予专业人员应聘和辞职的权利;赋予单位聘用人员和辞退违纪和不称职人员的权利,通过各项法规的规定和实施,克服人才“双向选择”中由于“人治”形成的障碍,保障用人单位和专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涉及面相当广泛,情况十分复杂,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真正实现人事管理公开化,必然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首先,要转变思想,更新观念,这是实现人

事管理公开化的思想基础。由于人事管理长期执行的是一套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人事管理制度,在思想上难免保留着许多旧观念、旧习惯、旧框框,在当前提倡人事管理公开化的情况下,在思想上必须破除二个观念:一是破除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旧观念,树立重视人才的新观念。二是破除人治的旧观念,树立法治新观念;人事部门办事,一定要秉公依法,不能听命于个人,更不能掺上私心杂念,随心所欲,真正做到以法管人,以制度管人。

其次,要努力提高人事管理者的素质。人事政策是人事管理人才发挥最佳功能的基础,人事干部政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工作的好坏,因此,人事工作者必须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素质,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人事管理干部要有管理人才的综合性知识,成为人才管理的行家,掌握各种人才的特点、特征、各种岗位的职责与规范,这样才能做到因人择事,因事择人,人事相宜,产生最佳效益;人事干部要有开拓精神,站在改革的前列,改革人事工作中僵化、封闭的旧状态。要有敏锐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敢于闯出新路来,为人事工作中人与事的最佳组合,为领导者的正确决策作出贡献;人事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修养,树立服务的观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发扬民主,广纳民意,真正做到群众的“知音”。

第三,要建立一套比较科学的人事法规,这是实现人事管理公开化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业的权利,这就是说,国家各级管理机关要充分保证人民参政、议政、监督国家管理的权利。我们的干部是社会的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人民群众对于自己公仆不能评议和无权监督,就谈不上民主化、公开化。过去在人事管理上屡屡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人事法规。只有建立人事法规,人事管理的录用、调配、考核、监督、升降、奖惩等就有了统一的法律依据,某些人在用人上的以权谋私、拉帮结派的企图便不能实现,特别是各级领导层中,不正之风便可大大减少以至杜绝。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冯生

“应用哲学”是哲学吗？

——与程家明同志商榷

吴 忠

姜建强同志在《学术研究》1989年第2期发表了“‘应用哲学’即‘无哲学’”的观点后，程家明同志在该刊1990年第1期撰文，批评了姜的观点。笔者认为，程文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对姜文的反驳也是无力的。

程家明同志是在驳论中立论的。在他看来，哲学（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括基础理论部分，也包括应用理论部分，后者即是应用哲学，它也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反思，因而也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可惜作者只对反思概念作了一下自己的理解，而未能对上述观点展开论证。

哲学的应用理论即目前流行的所谓“应用哲学”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应用于具体科学和实践领域，其成果是哲学应用上的实践形态，所谓的“教育哲学”、“管理哲学”即是；二是关于哲学的应用观和方法论问题，即哲学应用学，其研究成果是哲学应用上的理论形态。我们认为，这门学科虽然其理论形态带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但它本身不具有哲学性质，因而不能归为哲学。程家明同志说，哲学是一门历史的发展着的科学，不同的时代人们对它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们今天谈哲学，应以今天人们对哲学的理解为依据。程同志的确看到

了分歧的症结在哲学观上，但今天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决不能是任意的，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它独自的规定性。所谓今天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实际上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那么，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怎样看待哲学的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来研究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因而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点想来程家明同志是不会否认的。“应用哲学”说避开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把哲学理论如何应用于实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对象在外延上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局部世界”，在内涵上不是整个世界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和规律”，而是一些特殊规律和浅层本质，那么“应用哲学”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驱除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历史哲学）和自然领域内的哲学（自然哲学），原来的哲学空间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应用哲学”说的主张是要将一些具体的实证性内容置于哲学之中，这实际上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作为知识总汇的旧哲学上去，这是哲学观上的大倒退。

程家明同志未能分析“应用哲学”何以

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我们看来，时代精神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对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的反映。许多思想意识形式如伦理学、法学等都能够反映时代精神，而哲学的反映则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对时代的反映之所以能成为“精华”取决于哲学思维的独特本性。哲学作为人类“最高的智慧”，具有极端的概括性、抽象性和综合性，它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具有多重中介的折射反映。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性。哲学以超越科学所提供的实证知识，追求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无限性，用反思和思辨的方式去构造完整的世界图景，去描绘理想王国的境界。因此哲学要站在现实生活之外和之上来透视和反观生活。哲学本身拒斥经验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当然具有这一思辨性特点，只不过这一哲学的思辨性是与其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所谓的“应用哲学”只不过是一般科学思维而不是哲学思维，它追求的是有限性的思维工具即“具体方法论”，因而它对时代的反映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针对姜建强同志提出的“哲学是反思”的观点，程家明同志认为，反思即对思想的思想。因此，反思既包括对思想过程和规律的探索，也包括对思想规律所赖以产生的客观对象的规律（及其产生过程的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如此看来，“应用哲学”运用的思维工具也是反思，因而它是哲学。程同志实际上是把不同层次的反思相混淆了。“反思”的概念在17世纪一开始被洛克和斯宾诺莎提出的时候，被看作是人类认识真理的最高形式。黑格尔把反思界定为思想对思想的反复思索，这种思

索是分层次的。在黑格尔看来，第一种反思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尚停留在抽象统一阶段，他称之为“设定的反思”；第二种反思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达到把握区别与对立，他称之为“外在的反思”；第三种反思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达到把握对立面的统一，他称之为“规定的反思”。这实际上是他试图对经验思维、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特点进行概括。显然，不是任何一种反思都是哲学思维，只有那“规定的反思”（最高层次的）才是哲学思维。因此，把任何一种反思都看成是哲学上的反思，这是对哲学思维水平的降低。从这个意义上看，姜建强同志提出“应用哲学”即“无哲学”是有道理的。

和其他一些同志一样，程家明同志之所以把哲学的应用理论也看成是哲学，也许是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演绎出来的，以为如果不承认“应用哲学”的哲学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就无从体现。我们认为，一切哲学的基本功能是解释功能（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和规范功能（回答应如何）。哲学的功能从其直接性上说在于使理性思维成为自觉并获得自由。哲学反思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提供知识和技术，而在于提供智慧，即在于提供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以控制理性思维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哲学本身是超功利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应从规范意义上来理解，不能把实践性理解为可操作性。

为了批驳姜建强同志论点的第二个论据，即“应用哲学”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简单化了，程家明同志指出，国外的“应用哲学”已处于长足发展之日，我国“应用哲

（下转第90页）

《胡汉民评传》读后

火 木

周聿峨、陈红民合著的《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作为建国以来第一本系统论述胡汉民生平与思想的著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填补了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点。

“广泛地收集和认真地审订有关资料,择取翔实的、典型的素材,展示历史的实貌,乃是本书的优点之一。”(见《序言》)这是历史学家张磊对该书特点最中肯的评价。著者是两位年轻的学者,他们十年磨一剑,坚持不懈地对胡汉民进行全面、客观和细致的研究。披读全书,颇见他们精于思辨、贵在求实的研究功力。

对胡汉民一生的评价,作者用阶段分析法,较为客观地剖析了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是非功过。作者以1925年孙中山逝世为时间断限,把胡一生大致分为两大时期(时期内分阶段),认为,此期之前,胡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孙中山最倚重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共和草创、讨袁、护法、改组中国国民党等历史阶段中,为革命做过重要贡献,不愧为“同盟会的杰出宣传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骨干”、“辛亥革命的功臣”、“组建中国国民党的元老”。此期之后,胡为维护国民党的领导权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转而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蒋介石同流,走上反人民的道路。“四·一二”以降,他成了蒋政权的头面人物,却又不满蒋的独裁统治而举旗“倒蒋”。“九·一八”事发,他激于民族危难的忧患感,在继续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与不抵抗路线的同时,又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主张“抗日重于剿共”,以至在中共提出的抗日宣言上签了名。直至去世之前,仍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作者指出: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使爱国主义成为一切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思潮的主题。尽管胡汉民后期的政治活动呈现多变性,“爱国”,则是胡汉民终其一生的一大精神支柱和思想特色。正是这种强烈、深沉、一贯的爱

国情感,激励他早年积极献身革命、建功立业,同时也激发他在步入歧途的晚年,失足失意不失节,矢志救国,有始有终。作者对胡汉民一生所作的阶段分析,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地勾勒出胡汉民毕生既有一贯性又有多变性、矛盾统一的政治轨迹,避免了以往学人以其某一阶段的功过成败涵盖其终生的偏颇。这对于研究政治阅历复杂的历史人物,不无启迪的意义。

对胡汉民思想的评价,作者在注重研究胡的政治思想主线的同时,兼析了其思想的多面性及矛盾性,颇费脑筋。如众所悉,作为书生出身的胡汉民,其思想养分博杂得很。他饱读经书,又崇拜西学。他中过举,又出过洋。很自然,他会恪守某些封建传统观念,又笃信西方救国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伊始,他曾研究、宣传过唯物史观,尔后却又成了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坚”。作者从考察社会历史氛围及社会思潮主流的影响入手,在分析“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胡汉民政治思想中所占的比重的基础上,指出:胡汉民在1904年间,由反满爱国到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再到全面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实现世界观的转变以后,就对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想始终十分执迷。这是他政治思想的主线。他同意“容共”,是为了拯救行将就木的国民党,他滑向反共,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以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他痛恨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却又热情为蒋政权制定法规,是幻想在蒋介石的枪杆下确立真正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以此慑伏枪杆的权威。他作风清廉、衣食不奢,为振兴国民党孜孜不倦,他无视潮流趋向,罔闻时代怒吼,为求资本主义政治理想执迷不悟,至死仍“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可谓成于斯亦毁于斯,可叹、可悲!鉴于胡汉民“不识时务”、未能“与时并进”的历史事实,作者探究其思想根源时

认为，胡汉民所处的时代，社会巨变来得急剧频繁，时代几乎是不间断地向人们提出全新的历史使命，不适应就得落伍。而胡汉民辈，他们刚刚在辛亥前后实现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并且创下了惊天动地、前人未有的大业，就在他们正孜孜以谋造就实施其政治蓝图的大气候之时，要求他们马上放弃原来未遂的抱负，转而又向一个新的世界观转变，未免有些苛求。当然，我们也犯不着为他们因囿于旧有的世界观而落入歧途开

脱。基于这种认识，作者以客观的态度，对不同政治色彩的人如胡汉民辈作了合乎公允的肯定。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十分可取和必要。

《胡汉民评传》以拓荒、善思、求实见长，以多种研究手法（诸如阶段分析法、系统论方法、个性心理分析法）见新，文笔清新可读。略感不足的是，关于胡汉民后期思想与政治生平的材料尚嫌单薄，胡汉民思想转折的关节点，还有待继续深化研究。

· 书评 ·

关学大厦的两块坚厚基石

——两种关汉卿全集的比较议

笃青梅

早在193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誉称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隆重举行关汉卿从事戏剧活动七百年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曾倡议建立和发展“关学”。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关学”大厦的工程进展却未如人意。1988年10月，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了吴国钦校注的《关汉卿全集》；紧接着，同年1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王学奇、吴振清、王静竹三人合编的《关汉卿全集校注》。这两种全集校注本的问世，给“关学”的兴盛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两种关全集我都有幸先睹为快，并不揣浅陋，对二书作了对照、比较，今将鄙见谨陈于后，算是推动“关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引玉之砖。

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以下简称“王本”）卷首编入常林炎教授的序文，全面评介了关汉卿其人其作，反映了常先生关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不乏真知卓见。吴国钦校注的《关汉卿全集》（以下简称“吴本”）卷首编入王季思先生颇有特色的“题曲”以及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关汉卿”条的原文作为序言，也全面分析、评价了关氏的为人及其作品。这样的做法，均对读者问津并深究“关学”极有帮助。

王本卷首辑有关著古本及其木刻插图的样子影印件，增强了读者对关氏艺术遗产的形象感知；卷末附有《关汉卿杂剧全目》和《关汉卿故里考察记》，分别反映了吴晓铃、常林炎等两位专家的“关学”见解，可资学人借鉴。吴本卷末附有元、明、清及近代有关关氏生平、剧作的评述资料摘编，大体上列举了关氏身后剧坛评论诸家对他的研究成果，例如其中有王国维的评论，颇具权威性，是今人继续深入研究“关学”的基础。

王本尽收关氏的残曲，包括散见于非关著的其他典籍中的一两句。吴本虽亦收杂剧的残本，但仅存一两句而又难于考定核实著作归属的散曲则弃之。依我之见，做法之小异无伤大体，两本均堪称“全集”。

古剧的整理出版，校勘和注释是两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关氏两全集出版之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分别出版过《关汉卿戏曲集》和《关汉卿戏剧集》（按：单收剧本，未收散曲，故不称“全集”），均无注释而有校记，校记颇详，适用于专家学者，至于一般读者，那就可能望而生畏了。现在关全集的两种校注本都出来了，这对关学的普及和提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王本虽没有专项的校记文字，但有少量的

校勘意见已融入注释之中，而且所附文章，对版本的流变考究已不乏孤诣，成为颇具参考价值的一家之言。吴本则在校勘方面着力下了功夫，并在每种剧曲的后面，除“注释”之外，设有专门的“校记”。不单吸取了《关汉卿戏曲集》和《关汉卿戏剧集》在校勘方面的积极成果，而且视野更加拓展，除参校元明清及解放后的各种版本之外，还参考了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5月出版刘靖之著《关汉卿三国故事杂剧研究》和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4月出版郑骞编《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等，所得版本优劣的己见，形之于校记中，这就使关学在版本研究方面向前推进了一步。

至于说到注释，王本的注条较多，每折戏文平均有六七十注；注文详尽，既注词语或典故的出处，又说明其在剧中的作用。例如《单刀会》第一折有“山东宰相山西将”一语，注〔7〕指出：“‘山东’，华山以东；‘山西’，华山以西，不是现在所说的山东省、山西省。《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元剧里，常用这两句话作为将相上场诗的一部分。这里也很切合鲁肃、关羽两人的籍贯和身份。”像这样注到要点上，善解读者疑团的注文不少，正是由于这样的优势，使王本显出比较通俗的特色，较受各层次读者的欢迎。但也有它的缺点，有些地方失于疏漏，例如该书第1页《单刀会》第一折舞台说明中有“冲末鲁肃上”一语，王本注文只注“鲁肃”，而对“冲末”这样的重要角色名，第一次出现，该注却未注。有些地方不必注的，却又注了，略嫌繁琐，例如关氏散曲〔正宫·白鹤子〕中有“澄澄水如蓝，灼灼花如绣”句，“澄澄”、“花如绣”等比较易懂的词语也注了，大可不必。吴本注释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文化水准较低的读者可能觉得未尽解渴，但对于学者专家，会是比较欢迎的。因为它既说明典故的出处，又兼顾到所注词语在剧中的作用、位置及格律方面的特别情况，例如，《窦娥冤》第一折〔天下乐〕曲有云：“今也波生招祸尤？”吴本注道：“今也波生，即今生。‘也波’是〔天下乐〕第二句行腔时习惯加上去的，是一种腔格，无义。如《玉镜台》第一折〔天下乐〕曲：‘朝也波翔，在那天子旁。’《救风尘》第一折〔天下乐〕曲：‘容也波仪，瘦似鬼。’”这样的注释，除上述长处之外，将书中各处性质相同的词语互为印证，显出了全书的整体联系。吴本还注意对剧本人物性格、动

作的变化作出提示，如《谢天香》一剧的第〔11〕注、第〔14〕注，对谢天香聪明绝顶、心细如发的性格的提示；《望江亭》第三折对〔圣药王〕曲“珠冠儿怎戴者……”注曰：“这支曲子提示了戴冠、挂帔、遮伞等身段与舞姿，表演做侍妾时洋洋得意的神态。”有些疑点，别人已有研究成果，吴本则有选择地加以援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单刀会》第四折第〔59〕注，提到元刊本此折戏有〔沽美酒〕、〔太平令〕等两文曲子，到底是剧中谁人唱的，由于失去了舞台表演说明文字，难于弄清，学术界有争论，摆出了孙楷第、刘知渐等两位学者的不同见解，并表明了注者自己的取舍及其理由。王本于此等处均不注。由此可见，吴本的注释功夫是显得比较到家的。当然也偶有疏忽而不及王本周全之处，如《单刀会》第一折的〔金盏儿〕曲有“剩穿上几层袍”一语，其中的“剩”即“多”的意思，与上句的“多”字互文。这里是应该注的，王本注了，吴本却忽略了。

在编写和编辑体例方面，王本与吴本也各有千秋。吴本所辑关汉卿的每一杂剧和散曲，都冠以剧前或曲前说明，行文通晓明畅，可读性强，短短几百字，却对剧、曲的故事来源、内容演化、思想艺术特色及历代演出情况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寓褒贬于叙述文字之中，对一般读者的阅读、领会和鉴赏无疑是有指导作用的，也为学者专家进一步深入研究铺垫了基石。这个可取的长处是王本所没有的。但王本于内文的每页左右两面的上方，都分别标明所载关作的体裁和剧名，为读者检阅提供了方便。这个优点却是吴本所没有的，从出版质量的角度看，这是美中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两种关全集各具特色，各有长短。学界和广大读者如果两相对比、参照使用，可以取长补短，摘瑜弃瑕。两全集恰如宏伟“关学”工程的两块坚厚的基石，在它们的上方，将矗立起一座与西方“莎学”比美的关学大厦，是可以预期的。

作者单位：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斯翰

廣州市電筒工業公司



廣州市電筒工業公司是我國生產手電筒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產銷量和出口量多的全民所有制大型企業。本公司生產的手電筒佔全國電筒行業總產量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出口電筒佔全國出口總量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經國務院機電產品出口辦公室批的全國第一批機電產品出口基地企業。一九八八年獲全國輕工業出口創匯先進企業金騰飛“金杯獎”。

“虎頭牌”電筒是本公司生產的傳統名牌產品，始創於一九二一年。數十年來以其品種規格齊全、外型美觀、結構嚴緊、質量穩定等優點，贏得廣大用戶的信譽，產品暢銷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遠銷世界五大洲八十六個國家和地區。一九七八年以來，全國電筒行業質量評比共進行過四次，“虎頭牌”電筒連續四次蟬聯第一名。一九七九年榮獲國家銀質獎章，一九八〇年獲得國家著名商標證書，一九八一年榮獲國家金質獎章，一九八四年獲外經部優質產品榮譽證書和全國金龍優秀新產品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再次榮獲國家金質獎章。一九八八年獲全國輕工業出口創匯優產品金牌獎。一九七八年本公司曾獲全國科學大會頒發的“電筒生產機械化”獎狀。

“虎頭牌”電筒品種規格齊全，有前校光型、固定光型等四個系列產品；有鐵質、銅質、塑料、活節、防水、防爆等電筒，共三十多種花色規格，產品射程最遠可達千五百呎，現正在向多功能產品的方向發展，以滿足消費者的不同需要。

從一九八五年起，本公司經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享有自營進出口權，可直接展對外業務，竭誠歡迎國內外客商來人來電洽談。

地址：中國廣州市中山七路恩龍里30號 電話：814971(總機) 電掛：98
電傳：44744 GZFLA CN 郵政編碼：510170

Guangzhou Flashlight Industry Corporation has the longest history in mass production of flashlights in China. It is an enterprise with the highest sale and export volumes. More than 50% of the total production in country and over 60% of the exported are the products by the corporation. It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machinery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export base enterprises approved by the office for machinery and electrical products ex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

Tiger Head brand flashlights are the famous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the corporation. First manufactured in 1921, Tiger Head brand flashlight, with a complete variety, good appearance, solid structure and stable quality, are now selling well throughout the 29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and over the five continents, more than 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enjoying a high reputation among the vast customers. Since the year of 1978, the Tiger Head Brand was successively awarded State silver medal, State gold medal, the title of the Country's Famous Trade Mark, Honourable Certificate issued by Ministry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and the "Gold Dragon prize" for excellent new products.

Being a complete variety, Tiger Head brand flashlights come in 4 series, over 30 specifications, including iron case, copper case, prefocusing type, fixed-centre focusing type, flexible type, plastic and water-proof, explosion-proof types, the longest range of which is 1500 feet. And now the products are being developed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multiple purposes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customers.

The corporation won an honour of "Mechanization of Flashlight Manufacture"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Conference in 1978.

From the year of 1985 on, the corporation has been authorized by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Guangdong Province to trade directly with foreign countries and regions. Foreign customers are sincerely welcomed by the corporation to hold talks on trading and request by telegraph is also received.



Mutual benefit through sincere cooperation
 — Guangzhou textile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full swing

開拓前進中的廣州紡織品進出口貿易

Guangzhou Textiles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 was set up in August of 1980. It specializes in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various textiles products to and from Guangzhou. Since its foundation, it has firmly adhered to the 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Enlivening the home economy; and Persisting in Reform." In 1985, the export volume of the corporation was US\$20 million. In 1987 the figure shot up to US\$110 mill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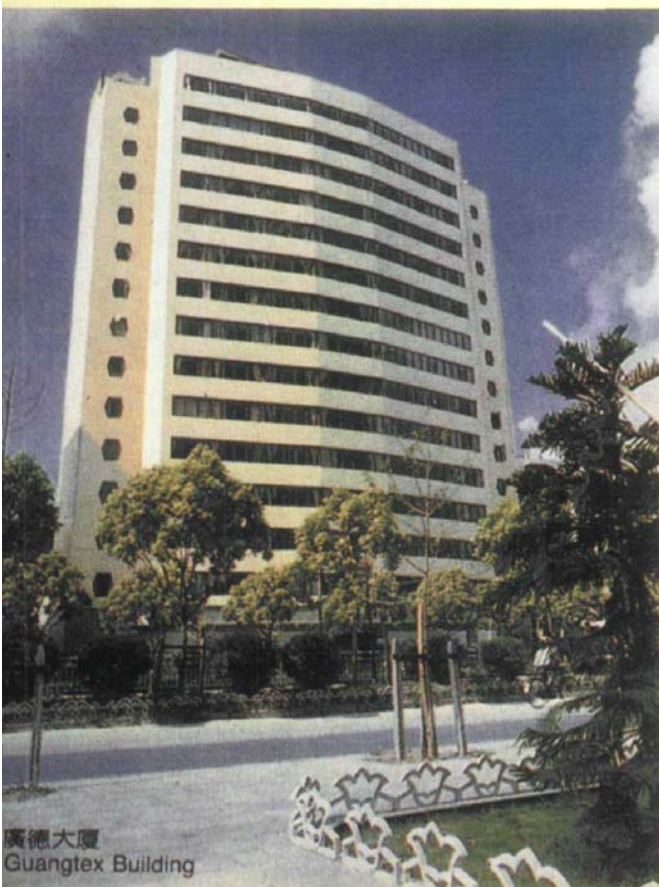
The Corporation has four major business departments handling various products, namely: cotton textiles department; knitwear department; yarns and fabrics department; and garments departments. We have a branch office in Panyu and six other offices in adjacent towns and district, namely, Conghua, Huaxian, Zhangcheng, Huangpu district, Tianhe district, and Baiyun district. Yue Xiu Textiles Co Ltd is our official branch in Hong Kong and Longlatex Trading Company and Willy Trading Company are the trading arms of our company.

To ensure stable supplies, we have set up 21 factories by means of self-investment or joint venture. These include spinning mills, dyeing and weaving mills, knitting mills, garment factories, cotton-weaving mills, and trademark labelling factories. Total investment comes to over RMB30 million. Furthermore, we have established connections with more than 100 factories around the country. Our corporation is now one of the PRC's major textiles exports.



WEN SHAO SHAN, General Manager

溫少山 (總經理)



廣德大廈
 Guangtex Building

廣州紡織品進出口公司成立於一九八〇年八月，經營紡織品進出口業務。近年來，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的做法，業務不斷發展，出口額已從一九八〇年的二千萬美元增至一九八七年的一億一千萬美元。

公司設有四個出口業務部門，分別主管棉織、針織、紗布、服裝的進出口業務。公司屬下有番禺縣支公司，還有從化、花縣、增城北黃埔區、白雲區、天河區等六個區公司。此外，還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越秀紡織品有限公司，以及香港經銷機構——經緯貿易公司和威穩公司。為了穩公司。為了穩定貨源供應渠道，本公司還投資與工廠聯合經營21間工廠，其中有紡紗廠、染織廠、針織廠、服裝廠、棉織廠、商標廠等，總投資達年3000多萬元。同時還與100多個工廠建立了長期供貨協議。目前，本公司已成為初具規模的對外貿易企業公司。



GUANGZHOU TEXTILE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廣州紡織品進出口公司

8-15/F, GUANGTEX BUILDING,
 438 DONG FENG ROAD (C),
 GUANGZHOU CHINA
 TEL: 348898-348828
 CABLE: "1159" OR "KWANGTEX"
 TELEY: 44452 GZTEX CN

廣州市東風中路438號廣德大廈8-15樓
 總機：348898轉電話：348828
 電掛：1159或KWANGTEX
 電傳：44452 GZTEX CN
 傳真：343898